# 新建設

第五卷 第一期

##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週年

兩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　宦鑫毅
新中國的人民檢察　周新民
論又聯合又鬥爭的經濟統一戰綫　千家駒
關於人民經濟的幾個基本範疇　陶大鏞
魯迅先生與編輯出版工作　臧克家
蘇聯地理學界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陳原

**學習毛澤東思想**　陳其瑗　嚴景耀　朱劍農　梁純夫

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馬特
一年來文藝批評的發展及其成就　王淑明
民間文藝學上的新收穫　鍾敬文
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馬克思原著　季羨林、曹葆華譯
馬列主義關於戰爭和軍隊的理論　蘇·赫魯斯多夫著　曹汀譯
介紹『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　蔣學模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 專著


兩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宦鑫毅（二）
新中國的人民檢察……周新民（八）
論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工作……陶　偉（一一）
論又聯合又鬥爭的經濟統一戰線……千家駒（一五）
關於人民經濟的幾個基本範疇……陶大鏞（一八）
魯迅先生與編輯出版工作……臧克家（二三）


### 學習毛澤東思想


從變革實踐中我對於『實踐論』的認識……陳其瑗（三一）
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一些體會……嚴景耀（三三）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讀後記……朱劍農（三五）
讀『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梁純夫（三七）
蘇聯地理學界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陳　原（三九）
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馬　特（四五）
一年來文藝批評的發展及其成就……王淑明（四九）
民間文藝學上的新收穫……鍾敬文（五一）

## 譯文

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原著　李羨林、曹葆華譯（五六）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和軍隊的理論……………………蘇·赫魯斯多夫著　曹汀譯（六〇）

## 書評

評栗著『新財政學教程』……………………趙靖（六三）

介紹『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新書介紹）……………………蔣學模（六五）

## 學術論文提要

讀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的四篇著作（李達）

毛澤東思想教導着我（柳青）

讀『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艾思奇）

論學習中國共產黨史的意義和方法（華崗）

斯大林同志論中國革命發展的道路（阿·弗·高爾尼洛夫著、徐堅等譯）

關於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改良主義（黎澍）

論人民經濟發展的規律性（陶大鏞）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法制底建立與發展（林景仁）

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傑出貢獻（П·尤金著、富瀾譯）

列寧是怎樣分析統計資料的（卡滋洛夫著、趙克成譯）

科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И、孔恩著、高銘、韓盧鋭譯）

東方史學家的目前任務（蘇聯『歷史問題』社論）　（六七）

從討論武訓問題我們學到些什麼（錢俊瑞）

克復藝術工作者忽視政治與思想懶惰的傾向（邵宇）

國外期刊重要學術論文介紹……………………（七一）

## 學術簡訊

蘇聯『眞理報』發表論文讚揚『人民中國』雜誌——蘇聯醫學科學學士院舉行第六次會議——全國各地準備紀念魯迅十五週年忌辰——蘇聯學術界批評『歷史唯物論』一書——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古代俄語辭典——蘇聯科學院出版介紹我國專刊

# 兩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

##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週年

宦　鑫　毅

一

最初並且最完整地闡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內對外政策的文件，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毛主席爲紀念中國共產黨廿八週年而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以及同年九月廿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所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兩個具有眞正歷史意義的文件，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代表作，其中包含着毛主席對外政策的卓越原則。在這些原則的指導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年來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站在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和平民主陣營裏面，爲保衛本國及亞洲各民族的獨立、自由及國家主權，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而開展了並正在繼續開展着正義的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是有着一貫而堅定的立場的。這就是『分清敵友』、『一邊倒』的立場。遠在一九四〇年的時候，毛主席就已指出：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份』，『這種革命，是澈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爲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爲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却爲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㈠。爲了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爲了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後，保衛革命的果實並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廿八年的經驗，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不但中國，全世界也是一樣』。㈡『三十一年的歷史難道還沒有證明：一切既不滿意帝國主義，又不滿意蘇聯的人們，一切企圖站在帝國主義者反革命戰綫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人們的革命戰綫之間的所謂『中間路綫』，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澈底虛僞和澈底破產嗎？』㈢這個『一邊倒』的立場，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是有着深刻的原則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全部政策中，證明了而且表示了，它所奉爲指針的只是一切大國與小國完全平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建國之始，就鄭重表示：『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各民族獨立與自由的擁護者。當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宣告成立的時候，中央人民政府主動地加以承認。毛主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華大使呈遞國書時所作的答辭中，曾經十分誠懇地表示『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影響下，不但早已脫離了中國的反動統治，建立了眞正的人民民主國家，而且正朝着經濟文化建設的發展道路前進，中國人民衷心地爲蒙古人民的這一成就慶賀。』㈤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受到美國帝國主義者侵略，許多居留在中國的朝鮮人民紛紛回去保衛他們自己的祖國，而美帝國主義者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妄加誹謗和指責時，中國人民就義正辭嚴地加以痛斥，並且聲明『這是他們的正當權利和責任，任何國家都找不到藉口可以干涉。中國人民對於他們參加保衛祖國、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英勇鬥爭，只有同情，只有擁護。』㈥這許許多多的事實都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是絕對忠實於各民族平等獨立的原則的，而且是一切民族奴役種族壓迫以及殖民地剝削制度的敵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是有着崇高的目的與任務的，這就是保衛世界持久和平、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與其對內政策是不可分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的目的、任務和方法，取決於中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民的利益，取決於人民大衆的利益。由人民大衆掌握政權的國家，在其對外政策方面，自然是與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對戰爭，中國人民也是一樣，因爲只有世界和遠東獲得了持久和平，中國纔能獲得順利條件來迅速進行並完成其人民所久已憧憬着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工程。爲了表示中國人民擁護和平的堅強意志和熱烈願望，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五日通過決議，接受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和平建議，並號召全國人民一致努力，促其實現。不僅如此，中國人民根據

自己親身的經驗，還懂得『絕不能等待和平，必須去爭取和平』的眞理。中國人民深知，帝國主義者是酷嗜戰爭的野獸，在這樣的野獸面前，決不是用祈禱和哀求能够得到和平的，也不是消極地躲避戰爭能够得到和平的。中國人民深切服膺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鬥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够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並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够制止的。』㈦中國人民與蘇聯人民一致，正積極地行動起來，揭露帝國主義的戰爭陰謀和欺騙宣傳，並在帝國主義者狼奔豕突的地方給予它們以迎頭痛擊，以使它們清醒。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的英勇戰鬥，就是保衛亞洲和平以及世界和平的最光榮的先鋒隊；中國人民支援朝鮮、反抗美國侵略的鬥爭，對於保衛並爭取亞洲及世界和平就是極重大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是立基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科學原則上，立基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知識上的。這四位社會科學的巨匠確定了帝國主義經濟與政治的規律性、兩個社會體系並存的特點，科學地樹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任務與方法。根據這些知識，作爲馬恩列斯的最優秀的學生之一的毛主席，在指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策的時候，總是能够看到國際舞台上在發生的一切事件後面所隱蔽的政治原動力，總是能够預見到事件朝着什麼方向發展着並將發展起來，總是比我們的敵人方面把現實環境估計得更加正確精密；這樣就給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以無比巨大的力量。毛主席一再教訓我們：『如果說，十月革命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就是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實的道路。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的意義估計不足，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㈧『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依賴，是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全世界各國反動勢力的共同特點。這件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予世界資本主義的打擊的嚴重性，反映了各國反動派力量的薄弱及其心理的恐慌與喪失信心，反映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强大，使得各國反動派除了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就感到毫無出路。但是……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優勢是在我們方面，不是在敵人方面。』㈨因爲『敵人的基礎是虛弱的，內部是分崩離析的，它脫離人民，它有無法解脫的經濟危機，因此，它是能够被戰勝的。對於敵人力量的過高估計和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㈩。在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教訓我們：帝國主義，從其本質和從其整體的方面來講，不過是一隻紙老虎，我們應該藐視它，鄙視它；但是對於每一個具體的鬥爭場合來講，却必須對於敵人的力量予以足够的估計，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全力以赴，以便一次一次地去取得具體鬥爭的勝利。(十一)這些寶貴的教訓，不僅是中國人民對外政策的圭臬，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南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是正直的，警惕性很高的，因而總是能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兩年來，不倦地敏銳地探索帝國主義者奴役亞洲獨霸世界的狂妄陰謀，並在全世界全亞洲人民面前毫不留情地揭發它們。反動的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和侵略計劃，無論它們穿上什麼漂亮的外衣，貼上什麼樣的彩色商標——『對日和約』也好，『太平洋安全公約』也好——都被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的聲明，到處加以揭發，到處加以戳穿。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讓帝國主義者不受懲罰地實行其奴役亞洲人民的政策。使帝國主義者及戰爭販子們大爲惱怒的，是它反對和平民主、準備新的戰爭、敵視中蘇和亞洲全體人民的眞實企圖與計劃，常常被中國人民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赤裸裸地、因而是非常不雅觀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人民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不採取消極防禦的立場，總是主動地積極地找尋各種合適的可靠的手段，來向和平的敵人、戰爭的煽動者、國際侵略者、謊言者與僞善者進攻，揭發它們的陰謀詭計，提出我們的正直主張，使一切都黑白分明，原形畢現；使帝國主義者狼狽周章，無法遮醜。這樣就大大地有利於世界和平及亞洲和平。顯然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的主動性、積極性和正直性，反映了社會主義和平陣營的鞏固及政治力量的强大，也暴露了帝國主義戰爭陣營的力量外强中乾、脆弱無力。正義和眞理在我們這一邊，所以我們能够理直氣壯、義正辭嚴地展開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雖然不忽視實際上掌握政權的各國政府，却同時面向各國人民，因爲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國政府與人民，永遠是互相離異的。面向人民，就可以促進他們的覺悟的提高，幫助他們來干預像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嚴重的問題，『推動他們爭取和平和民主、反對戰爭和壓迫的偉大鬥爭』(十二)。

## 二

###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親密聯系，以及對各國人民的

熱烈交往，是保證持久和平的最重要的因素。

中蘇同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的最重要的基石。這個『偉大同盟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兄弟同盟。』㈩㈢。『這一歷史性的結合變更了整個國際關係，這一歷史性的結合標誌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廣大土地和人民，包括蘇聯、中國和共他人民民主國家，已經在和平民主的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一歷史性的結合包括了蘇聯在過去三十三年來的驚人成就，與中國以及共他人民民主國家的近幾年內的迅速勃興。這一和平鬥爭的根本力量是舉世無匹的』㈩㈣。歷史將給我們證明：『中蘇兩大國人民間的團結是永久的、不可破壞的，沒有人能够分離的。』㈩㈤毛主席曾說：『中蘇兩國人民的團結極爲重要，這兩國人民團結一致了，世界人民的團結就不困難了。』所以，這個同盟『對於鞏固全世界的和平與民主的事業，是一個最重大的貢獻』㈩㈥。

兩年來，中蘇兩國之間簽訂了許多協定，在平等、互助、互利的基礎上，密切地展開了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大大地幫助了中國的經濟文化的建設。這些協定的簽訂和實施，證明了蘇聯人民對於中國人民的無限眞誠的國際主義的友愛。

帝國主義者以猜忌、憂疑和極端恐懼的眼光，看着中蘇兩國人民偉大友誼與合作的日益親密。在無可奈何之餘，他們就卑鄙地運用各種下流的方法，如造謠、挑撥、引誘、中傷等等，來破壞離間，妄圖引起我們兩國之間的分裂。但是，誠如蘇聯名作家愛倫堡所說，我們兩國之間的『同盟是建立在信任、眞實和誠實的基礎上的』㈩㈦，因而是經得起任何考驗的。事實證明：不管帝國主義者如何暴跳如雷，中蘇兩國偉大人民的友誼，兩年來是一天比一天更加親密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各人民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也通過各種經濟和文化協定的方式，而日趨密切。中朝、中波、中捷、中匈、中德之間的貿易、交通、文化關係，正在愈益發展和增進中。這樣，就對加强整個和平民主陣營的政治經濟力量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貢獻。

兩年來，中國與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人民間的相互訪問，是相當頻繁的。這種訪問的性質極爲廣泛；有觀禮性質的，如相互參加國慶紀念及五一勞動節紀念；有展覽性質的，如新中國展覽會，蘇聯諷刺畫及宣傳畫展覽會，亞洲工人、婦女生活與鬥爭展覽會，朝鮮人民解放鬥爭一週年展覽會等；有慰問訪問性質的，如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朝鮮人民訪華代表團，越南人民訪華代表團等；有表演和比賽性質的，如中華雜技團、電影比賽、蘇聯體育代表團等。這些友好活動增進了整個社會主義和平陣營中人民間的相互了解與感情，鞏固了我們的團結。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間，首先是與印度緬甸間的人民友誼和文化交流，也在逐步開展中。兩年來，這種人民訪問很有幾件：如印度和平大會副主席愛德華的來訪，以及中國兒童照片展覽會的在印舉行，即共較顯著的例子。最近中央人民政府應印緬兩國的邀請，特派遣一個由十五名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藝術家所組織的文化代表團前往該兩國訪問，隨帶大量文物、圖片、影片等。這是中國加强與東南亞各國人民間友好來往的很好的表現。此外，中國在印度糧荒時出售大批糧食給印度的行動，更增進了中印兩國的友好關係，並在亞洲其他國家中發生了良好的影響。

中國人民很願意同歐美各國的人民建立起友誼的來往關係。去年十月，中國人民訪英代表團曾爭取到去英國訪問了一次，受到英國人民熱烈的歡迎。同年五月，英中友協派遣的英國人民訪問團也到我國住了一個月，給英國人民帶回中國人民的深厚友誼和感情。但是，歐美各國的政府恐懼共本國人民與我國人民間的友誼來往，他們採取了種種辦法，在雙方之間放下了一道鐵幕，一方面無理拒絕我國人民去他們國內訪問（如英國），他方面也拒絕他們的人民來我國訪問（如美國）。

以世界和平大會爲核心的各個國際民主組織，包括世界和平大會、世界工聯、婦聯、青聯、學聯、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國際民主法學家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全部參加。其中，亞澳職工會議、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亞洲婦女代表會議、以及國際學聯執委會議等四個會議，還曾在中國召開。這就使得世界保衛和平的運動，有了更大的推動和開展。

以上這些，說明過去兩年來，中國人民已與以蘇聯爲首的一切國際革命力量緊密團結，爲爭取和平而努力鬥爭，並已獲得了巨大的成績。今後，我國當然仍將繼續遵循這一方向，大踏步地向前邁進！

## 三

忠實於國際主義原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決捍衛亞洲和平以及亞洲各國人民的民族利益以及他們的獨立自由，以實際行動來幫助亞洲人民反對他們最

强大兇惡的敵人——美國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戰爭政策。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號召：『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該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應該由美國來管。美國對亞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亞洲人民廣泛的和堅決的反抗。……美國這樣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國主義面目，這對於中國和亞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國對朝鮮、菲律賓、越南等國內政的干涉，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全中國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都將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決不會站在美帝國主義方面。……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份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者的任何挑釁。』(十八)這一正義的聲音，宛如洪鐘，它震動了亞洲十億人民的心弦，引起了一切被壓迫被奴役的人民的共鳴。

當美國帝國主義者侵略朝鮮，並且嚴重地威脅着中國的安全的時候，中國人民就向美國帝國主義者提出嚴正警告：『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爲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可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十九) 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者不顧這個警告，仍然冒險進犯，把侵略戰爭的火燄燒到了我國邊境的圖們江和鴨綠江上。中國人民爲了要『使帝國主義者獲得教訓』，並『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決朝鮮及其他地區的獨立和解放的問題』，也就是說，『以和平方式來解決朝鮮問題』(二十)，這纔組成志願部隊，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鬥爭，並把敵人趕回到三八綫去。這是挽救朝鮮危亡、爭取朝鮮民族解放的鬥爭，是中國人民自己保衛革命果實的鬥爭；也是中國人民最有效地制止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亞洲以及世界民主和平的鬥爭；是爲朝鮮人民而戰，爲中國人民而戰；也是爲亞洲人民而戰，爲世界人民而戰。中國人民在國內和在朝鮮戰場上所表現的高度自我犧牲精神和革命的人道主義，爲全世界人民發揚了正義的威力，特別對於那些飽受帝國主義者壓榨侵略的亞洲人民起了無限的影響和動員的作用，使他們正確地認識到，帝國主義者並沒有什麼可怕，帝國主義的任何武裝侵略都是可以用人民的力量來加以擊敗的。這個高度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偉大鬥爭，正在深刻地改變着亞洲人民的心理，改變着亞洲人民反帝鬥爭的力量對比。

但是，中國人民是始終不會放棄爭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努力的。從朝鮮戰爭爆發以來，中國人民就一再表示，要求以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問題；只是由於美帝國主義的阻撓和破壞，這個要求纔沒能實現。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先生再一次提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中國人民對於這個建議是完全擁護的，並願爲其實現而努力。中國人民認爲：以『交戰雙方談判停火休戰，雙方軍隊撤離三八綫』來作爲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第一步，是合理的、公平的。現在朝鮮停戰談判已經進行了兩個月，而美國政府所表現的，却是利用各種藉口，製造各種事件，來阻撓並拖延談判的進行。中國人民正以堅定忍耐的態度，繼續爲實現停戰的這個第一步驟而嚴肅地奮鬥，並不斷地揭破美帝國主義者的拖延陰謀。在另一方面，則在前綫作戰的中朝部隊正嚴陣以待，準備在必要時使美帝侵略軍再度自食苦果。

美國帝國主義者侵略亞洲，準備新戰爭的另一惡毒陰謀，就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舊金山簽訂的對日單獨和約。這個舊金山會議顯然是違反亞洲人民的意願的。印度和緬甸的拒絕參加，就是證明。

中國人民兩年來一貫反對美帝國主義者脅迫其僕從國家單獨對日媾和的陰謀，現在更認爲美國政府强制簽訂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及美日雙邊安全條約，是美國政府正在亞洲和遠東準備更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的鐵證』；『美國政府這一造成亞洲和世界緊張局勢的備戰行動，正如它在朝鮮所進行的武裝干涉一樣，『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人民，首先是亞洲人民的堅決反對。中國人民願意與世界人民、全亞洲人民以及任何不贊成舊金山對日和約的國家，首先是亞洲的國家的政府，共同努力，制止由舊金山對日和約及美日雙邊安全條約所造成的擴大遠東戰爭的危機，以求亞洲的和平和世界和平獲得保障。』(二十一) 中國人民正確地指出，這個和約是『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爲美帝國主義服務的反動集團，妄想復活軍國主義，竟不惜出賣國家的獨立與主權』而簽訂的，其結果將把日本拖入新的侵略戰爭，陷日本於空前嚴重的危機；並號召日本各階層愛國人民爲反對舊金山賣國條約，爲爭取中日兩國迅速結束戰爭狀態和保障和平相處關係而努力鬥爭(二十二)。

中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捍衛亞洲和平以及亞洲各國民族獨立的鬥爭，決不是孤獨的。與中國携手並肩，共同担負起這個神聖事業的，還有蘇聯和歐亞兩洲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特別是中蘇友好同盟，乃是保障遠東和平的中流砥柱，是『壓在新戰爭煽動者脚下的重錘』。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週年，毛主席與斯大林大元帥交換的賀電中，誠如斯大林所說：『無庸置疑，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可摧毀的友誼，在現在和將來都是爲着保障遠東和平，反對一切侵略者及戰爭販子的事業的。』(二十三)

# 四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堅忍不拔地、不屈不撓地保衛着我們祖國的利益、其獨立與平等，其榮譽與尊嚴。這些，對於中央人民政府來說，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當着生命一般來保衛着的，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與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政府的政策——包括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的政策在內——的基本區別之一。

早在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就已警告『各國盟國政府，首先是英美兩國政府，對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任何外國政府如果要援助中國反動份子進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㈡㈩㈣後來，在一九四八年，中國人民又以鐵一般堅毅的聲音正告世人說：『中國的內戰不是任何別的東西造成的，這是由武裝到牙齒的中國萬惡反動派在美國侵略者大量援助之下所造成的。……中國的反動勢力不完全消滅，美國的侵略勢力不退出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完全實現，（中國）是不能有眞正的和平的』㈡㈩㈤。中國人民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的鋼鐵決心，是符合於保衛我們祖國的最高利益的。

在中國革命基本上獲得勝利之後，帝國主義者曾經嘗試着要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有時軟騙，有時恫嚇。但是，毛主席那樣堅定地表示：全中國人民『既不受帝國主義的利誘，也不怕帝國主義的威脅』㈡㈩㈥。這聲音粉碎了帝國主義者的一切陰謀詭計。帝國主義者在無可奈何之餘，只好撕破了它的假面具，拿出它的軍事侵略的眞面目，佔領我們的台灣。美國政府這一侵略罪行引起了我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中國人民一再宣示，它有堅强的決心，一定要從美國侵略者的手裏解放台灣。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伍修權代表在聯合國對於美國侵略台灣的嚴正控訴，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美國政府的侵略罪行和戰爭政策，並且重申了中國人民定要解放台灣的決心。

帝國主義者也曾經妄圖阻撓中國人民的解放西藏，但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之下，一切陰謀都告粉碎，西藏終於和平解放了。

中國人民早已『教訓』了各帝國主義國家，要他們必須如何對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很明確地告訴過一切帝國主義者：『很明顯中國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國土以後，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脅的環境下來恢復和發展自己的工農業生產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國侵略者如果以爲這是中國人民的軟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與國民黨反動派同樣嚴重的錯誤。』㈡㈩㈦所有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家，如果能經常把這個嚴正的警告牢牢記住，那倒是不壞的。可是，帝國主義者是不願這樣作的。相反地，他們曾屢次妄圖用武力行爲和經濟措施來威脅我們。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一一加以嚴重反擊。例如針對着美帝的所謂封鎖，我國政府就宣佈管制美國在華的財產。

中國人民曾平靜地、堅定地說明了中央人民政府與英國政府雖經長期談判，迄今仍無結果的原因。這就是：英國政府要弄着兩面派的手法，一面表示與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中英間外交關係的願望，另一方面又未能以實際行動表示它確已與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殘餘集團完全斷絕關係，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家產權及財產充分予以尊重，且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對待中國居民採取了極端不合理的非友好態度㈡㈩㈧。

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曾連續不斷地通知聯合國，要求立即取消所謂『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團』繼續代表中國人民參加聯合國的一切權利，將其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及其會議中驅逐出去，並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到聯合國的一切機構及其會議中來。但是在美國操縱下的聯合國竟拒絕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議。聯合國在美國扶持之下，甚至還『喪盡天良地』㈡㈩㈨通過議案誣衊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抗美援朝爲侵略，並通過對中國禁運的決議。這樣，聯合國在美國控制下就背叛了原來建立時的原則，而變成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的擴大戰爭的工具，同時也就自絕於中國人民了。

應當嚴正地指出：帝國主義集團的絕大多數國家有些是不願意在雙方眞正平等的基礎上來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關係的，有些是故意裝作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的。這對於它們是危險的；但對於我們呢，誠如偉大的智利詩人聶魯達所正確地指出的㈢㈩：

『他們也可以不承認地球的存在，　可是地球還是不停地旋轉運行。

『地球不會後退，只會前進。』

而對於世界人民呢：

『你去問問隨便那一個礦工、農民，教授和詩人，你去問問所有的青年和老人，

「從阿拉斯加直到南極，他們的回答是異口同聲：

『我們承認！我們承認！偉大的革命家毛澤東——我們尊敬！』

根據政協共同綱領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在過去兩年中基本上可說已經取消了帝國主義在華特權。憑藉特權所取得的各國兵營，已全部收回了。外國僑民商人在中國的特殊勢力和不受中國法權管轄的優越地位被取消了。先爲英日帝國主義、後來爲美帝國主義所控制的海關被完全收回，中國大門的鎖鑰已拿在中國人民自己手裏了。對外僑登記出入境和旅行的管理制度加强了。特別『長人民志氣、滅帝國主義威風』的，是兩年來曾經把若干慣於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帝國主義前使領館人員（如前美國駐瀋陽前領事瓦爾德、前英國駐迪化前領事何仁志、駐瀋陽前領事史蒂文頓，前法國駐昆明前領事館全體人員），加以驅逐出境的處分。這些嚴正的措施表示中國人民敢於行使自己的國家主權了。過慣了過去那種享有特權的生活的帝國主義份子們，當然是會大嚷大叫，對我們大肆誣衊的。讓他們去叫囂吧，世界人民是會了解我們的。

在過去長時期內帝國主義者曾經投下了一大筆所謂『宗教文化救濟事業』的資金，妄圖通過這些方式，來在精神上扼殺中國人民，使中國人民認敵爲友，而自願做它的奴隸。今天，肅淸帝國主義者——首先是美帝國主義者——的文化侵略的影響，就成了中國人民當前一個重大而迫切的任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年來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地進行了愛國主義的教育，中央人民政府頒佈了『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㈡㈩㈠；中國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愛國份子也紛紛起來，發動澈底割斷對美帝國主義的聯系的運動。這是代表了廣大人民正義要求的措施，也是一個尊嚴獨立的人民的國家所必須採取的措施。

## 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年來對外政策所走過的道路，是荊棘滿佈，困難重重的。國際帝國主義者曾經企圖，現在仍然企圖並使用各種各樣的陰謀，來在國際舞台上孤立中國人民，削弱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了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人民大衆面前喪失威信，國際帝國主義者曾經把無數惡毒的謊言和誹謗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上面。可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並沒有獲得成功。因爲在天才的毛澤東主席的指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是具有洞察力和革明預見的，是能够爲實現偉大的任務而堅决地順利地鬥爭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兩年來的勝利，依靠着國家的日益增長的有形的與無形的威力。兩年來，爲新愛國主義所鼓舞的、充滿着對毛主席的領導的無限信任和熱愛的中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政治道義的團結一致，是日益鞏固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威力與國際威力，是在逐日、逐月地、普遍不斷地在高漲。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優越性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爲不可動搖的堡壘，大大地提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威信以及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依靠着四億七千五百萬人民無限的與經常的擁護。兩年來，領導國家的黨與政府，經常使人民通曉對外政策方面一切相當重大的事件。報刊上經常發表最重要的外交文件，使人民大衆經常能够直接知道國家在外交方面的一切措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年來的政治教育下，中國人民的政治水平以及他們對於世界政治的理解，是空前地提高了。正因如此，所以兩年來，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對外政策總是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找到最熱烈的擁護和反響；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每一個外交行動後面，全世界總是聽到偉大的中國四億七千五百萬人民的堅定的聲音。中國人民知道，毛主席對外政策的成功，將使中國人民能够以和平努力來實現新中國的建設，但這個對外政策的成功，有賴於各階層人民的勞動成就，有賴於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威力的成長。因此，各階層人民都能忘我地努力工作，因爲他們明確地意識到，他們的工作成績愈高，毛主席對外政策在世界上所發出的優美聲音，就愈加響亮。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爲全世界人民首先是亞洲人民，所同情、感謝和信賴，因爲這些政策的目的是高尚的，純潔的；不僅僅是符合於中國各族人民的利益的，而且也是符合於亞洲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的。亞洲人民業已體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公無私，和隨時準備對於那些國家主權與安全處於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或威脅下的人民，給予以維護。

依靠着上面這些因素，毛主席思想指導下的對外政策，正引導着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向着『進步人類的事業戰勝帝國主義强盜力量的大道』上㈡㈩㈡走去！

一九五一年•九•二十一日，北京。

（註 一）『新民主主義論』第四節。

（註 二）『論人民民主專政』第十一節。

（註 三）毛主席爲『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紀念十月革命三十一週年紀念專號所寫論文：『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第二節。

（下轉第55頁）

# 新中國的人民檢察

## ——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週年而作——

周新民

## 一

新中國人民檢察的兩個基本組織法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已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並由毛主席於九月四日明令公佈施行，這對人民檢察工作的開展，革命法紀的建設，進一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護國家人民利益，是具有極重要的意義的。

新中國的人民檢察，是人民革命取得基本勝利建立自己的政權、『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司法制度、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共同綱領第十七條）這一新的情勢與要求所產生的新型的司法機關，是在澈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廢墟上重新建立爲人民服務的法律監督機關，它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及舊中國的檢察制度，也不盡同於社會主義蘇聯的檢察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和舊中國的檢察機關，是以鞏固反動政權，維護少數反動統治階級，壓迫廣大人民爲任務的。是爲買辦官僚、封建地主服務的。我們的人民檢察機關，則以保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及人民政府的各項法律、法令、政策之實施與鞏固人民革命政權、保護廣大人民利益爲任務的，是爲人民服務的。在本質上兩者是根本不同的。其次，由於蘇聯的國家建設已比我們前進了一個階段，它是社會主義國家，它國內已經消滅了階級，建立了堅强的革命法紀。而我們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聯合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中蘇兩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旣有不同，作爲國家統治工具的檢察機關，也就發生不同的任務和作用，所以，當我們研究新中國人民檢察問題時，必須首先從國家政權本質中了解新中國人民檢察的特質。

## 二

資本主義國家和舊中國的反人民的檢察機關，在組織上一般的是法院的附屬機關。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它爲維持其反動統治，原有的假民主已不適用了，就公開地採取野蠻殘暴的法西斯式的統治方式，檢察機關墮落成爲特務機構，專爲鎭壓人民民主運動的工具。這可從美國聯邦檢察長所領導的特種刑事調查局來看：該局專門從事迫害美國進步人士、破壞工人團結、進行恐怖、暗害等罪惡活動。至於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檢察機關，不只是極其反動，而且公開貪污，普遍腐化，成爲藏垢納汚的機關。因此這些檢察機關愈活動，人民受壓迫愈深，犯罪的事實也愈多。

而人民檢察機關，則是保衞人民的，與上述情形完全相反。人民檢察工作，在人民革命政權初建時即被重視，這可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所發佈的第一號開國文告及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的規定中，看出它是構成人民革命政權組成的一環，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主要武器之一。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第三條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第二條規定它的職權，除了『對反革命及其他刑事案件實行檢察，提起公訴』，『對各級審判機關之違法或不當裁判，提起抗訴』，『檢察（全國）監所及犯人勞動改造機構之違法措施』，『處理人民不服下級檢察署不起訴處分之聲請覆議事件』等職權外，主要在於檢察（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和全國國民是否嚴格遵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針與法律法令』，而『代表國家公益參與有關（全國）社會和勞動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訴訟』的規定，更是充分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註：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第三條有『全國』二字，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第二條無『全國』二字。）故新中國的檢察機關，眞能當得起人民檢察的稱號，也眞能發揮人民檢察的功能。

在人民檢察的主要作用中，應當說是保證共同綱領的澈底實施。因爲，共同綱領是中國人民革命經過長期艱苦鬥爭、犧牲無數的先烈頭顱而獲得的勝利果實，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各階層、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

各少數民族及其他愛國民主份子的意志而制定的建國藍圖，一切政策、法令、都是根據共同綱領的政治基礎而制訂的。所以，『檢察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和全國國民是否嚴格遵守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針與法律法令』，就成為人民檢察署的工作綱領。

人民檢察署的政治任務，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必須以鎮壓反革命為當前的重要工作。所以，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均明定：『對反革命及其他刑事案件，實行檢察，提起公訴』。並且把反革命案件規定在一般刑事案件的上面，充份表現人民檢察署在與反革命作長期鬥爭中，是站在政治保衛的最前綫。至所謂其他刑事案件，在這次頒行人民檢察署的兩個基本法案中，雖未加以明文的規定，但我們從這一年多人民檢察署的工作經驗來看，在一般刑事案件中，以貪污瀆職、違法亂紀、破壞財經建設及土地改革等案件為檢察中心，我們必須檢察貪污瀆職，才能保持人民政府的廉潔；檢察違法亂紀，才能保障革命社會的秩序；檢察破壞財經建設，才能保護國家的財產和生產事業的順利發展；檢察破壞土地改革，才能保證新區土地改革的順利完成及翻身農民的勝利果實。這些重大的刑事案件，與廣大人民的利益是分不開的，與共同綱領的澈底實施更是分不開的。總之，人民檢察機關是誠心誠意為人民服務的。

## 三

關於各級人民檢察署的領導問題，原有垂直領導與雙重領導兩種不同的主張，過去最高人民檢察署試行組織條例是採取垂直領導的，經過一年多的試行，深感不合目前中國的情況，為使檢察機關更能發揮作用，特將它改為雙重領導。所以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第六條，一方面規定：『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受上級人民檢察署的領導』，另一方面規定：『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包括最高人民檢察署分署）為同級人民政府的組成部份，同時受同級人民政府委員會之領導』，這是雙重領導的具體體現，它不僅與資本主義國家及舊中國完全不同，即與社會主義蘇聯也不完全一樣，這是適合中國時宜的。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李六如同志在其說明這個法案時已明確指出：『因為我國過去曾經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各地情況懸殊不一，地區遼闊，交通不便，而各級人民檢察署，目前又多不健全或尚未建立，因此暫時還只能在中央的政策方針下，授權於地方人民政府，使其發揮機動性與積極性。同時我們人民民主政權的發展過程，是由地方而中央，關於當地的一些具體問題，地方政權領導強，經驗多，易於指導處理，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是一個新設立的機構，幹部弱，經驗少，尚需當地政府機關，根據中央的方針計劃，就近予以指導和協助，故此時將垂直領導改為雙重領導，是切合目前實際情況的。』這就說明了雙重領導的主要意義。即就蘇聯的檢察機關來講，澈底實行單獨的垂直領導，也曾經過長期發展的過程。蘇聯最初的檢察機關，原也附設於司法人民委員部內，由司法部長兼任共和國檢察長，這種制度，一直維續到一九三六年， 檢察機關始成為一個具有極廣泛和極重要的職能的完全獨立機關。根據中國現在客觀的情形，並參照蘇聯以往的經驗，今天我們人民檢察署應採取雙重領導，已為歷史發展所必經的階段。

## 四

人民檢察署為有效的完成任務，其進行工作不僅得向各機關調閱有關於法律、法令、決議、命令等類的文書（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第十四條，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並須與各有關機關密切聯繫，最重要的是公安機關、人民法院、人民監察委員會。為明確這些機關關係，最高人民檢察署組織條例第十三條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特作簡要概括的規定，因為這些機關與人民檢察署的職權雖有不同，但它們總的政治任務，則同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與保障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政策法令的實施。現在把它們間的相互關係，約略說明如下：

自鎮壓反革命開始以來，各級人民檢察署與公安機關，均已進一步密切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民檢察署與公安機關在當前雖同以鎮壓反革命為工作重點，但人民檢察署除了鎮壓反革命以外，其他關於漢奸、戰犯、貪污瀆職、違法亂紀等案件的處理，也為其今後工作的重心，正如公安機關除了鎮壓反革命以外，還有很多重要業務是同樣的道理。目前關於反革命案件，在已設有人民檢察署的地區，固應由人民檢察署負責起訴；在未設人民檢察署的地區，則得由公安機關代行其職權。所以，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規定將關於『對反革命及其他刑事案件實行檢察，提起公訴』及『對各級審判機關之違法或不當裁判，提起抗訴』等職權委託於未建立檢察署地區的公安機關。為保證其能正確地行使檢察權，復另設但書之規定：『但其執行檢察業務時，須受上級檢察署的指導』。經上述的委託代行關係中，可見這兩個機關關係的密切。

其次說到人民檢察署與人民法院的關係：人民檢察署與人民法院同爲司法機關，但前者是司法律上的監督，後者是司法律上的審判。人民檢察署對於各級審判機關之違法裁判，固應提起抗訴，就是對於各級審判機關之不當裁判，也應提起抗訴。人民檢察署對於反革命及其他刑事案件，固有檢察起訴之權，就是對於有關社會和勞動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訴訟，人民檢察署亦有代表國家公益參與之權，這是進一步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發揮人民檢察署司法監督的作用，所以二者之間的關係，也是特別密切的（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第五章）。

最後，說到人民檢察署與人民監察委員會的關係：人民檢察署與人民監察委員會，對違法亂紀案件，雖可同時分別派員調查或組織聯合調查，並得向各機關調閱有關材料文件，然人民監察委員會着重於行政處分，不得涉及刑事處分，人民檢察署着重於刑事處分，不得干預行政處分，因此在處理具體案件過程中，人民監察委員會認爲有犯罪事實應受刑事處分者，即應將該案移送人民檢察署起訴；同樣地，人民檢察署認爲有意忽職責應受行政處分者，即應將該案移送人民監察委員會處理。這由於人民監察委員會是行政監督，其職責在於行政處分；人民檢察署是法律監督，其職責在於刑事處分。這兩個機關的職權既有同有不同，因而分工合作的關係也就更爲密切了。

綜上所述，可知人民檢察署與公安機關、人民法院、人民監察委員會，雖各有其隸屬的系統，各有其獨特的職權，但它們同爲完成總的政治任務，與一切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違法行爲作堅決的鬥爭，所以，在業務上必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高度地發揮有機聯繫的效能，才能完成偉大歷史性的總的政治任務——鞏固人民民主專政。

## 五

人民檢察署是新型的機關，它的職權是廣泛的，它的任務是艱巨的，在過去一年多的摸索過程中，雖已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績，獲得了一些工作經驗，但距離目標還是非常遠的。爲了建立革命的法紀，更好地保護國家人民的利益，必須充實檢察機構，加强檢察工作。所以，中央人民政府於最近頒行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例及各級地方人民檢察署組織通則，並同時頒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這三個司法機關的基本組織法案，每一司法工作者均應好好學習，深入鑽研，體會法案的整個精神和領導思想，使自己的認識和業務均能提高一步，爲建設人民司法而努力。

在建立充實人民檢察機構中，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幹部問題，由於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各方需要幹部甚多，就檢察工作來說，因其對幹部的政治品質要求較高，幹部問題就更形嚴重，有些機構因幹部缺少未能建立；即已建立的機構，幹部亦是少而弱。今後應訓練大批新的幹部來爲這一新興的人民事業服務。

人民檢察署既是爲人民服務的機關，不同於舊社會反動的官僚機構，所有工作幹部，必須緊密地聯系羣衆，依靠羣衆，才可使檢察工作爲人民服務。蘇聯把機關團體企業中的守法幹部、模範人物、和羣衆中的積極份子，在自覺地不脫離原來生產工作崗位，組成檢察小組，團結在檢察機關的週圍，作爲檢察機關的耳目和聯系廣大羣衆的橋樑，這個寶貴經驗，是值得我們學習採取的。

---

### 蘇聯『眞理報』發表論文 讚揚我國『人民中國』雜誌

『眞理報』於八月二十二日發表科瓦列夫所撰題爲『人民中國』一文，評介我國外文出版社發行的『人民中國』雜誌，並引證材料介紹新中國在工業、農業、對外貿易、文化和外交各方面的卓越成就。

### 蘇聯醫學科學學士院 舉行第六次會議

蘇聯醫學科學學士院第六次會議已於莫斯科召開。會議的參加者聽取了學士院主席團關於一九四七——一九五〇年的工作報告，並進行討論。

大會參照了巴甫洛夫學會的決議，對於學士院的工作，學士院各研究所的工作，學士院指導機關的工作都做了評定，檢查了科學機關的改善工作，並做出初步總結。

蘇聯醫學科學學士院執行着三種重要的任務：（一）研究醫學科學的主要問題，（二）承認科學的發明與發現，（三）培養資歷高深的科學幹部。

# 論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工作

陶偉

## 一 人民代表會議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經過長期堅苦卓絕的鬥爭，在中國的國土上，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勢力，粉碎了他們的國民黨反動派爲代表的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法西斯政權，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團結其他一切民主階級和愛國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這才在中國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絕大多數人統治絕對少數人的國家政權。『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列寧）。』這就是中國人民革命取得偉大的、根本的勝利的集中表現。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權最好的基本的組織形式』（劉副主席語）。因爲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能團結最大多數人民從事國家建設，最有效地孤立敵人並對他們實行專政的制度。又因爲在現階段，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主要的是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比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更能符合於上述要求，所以我們在目前人民民主政權建設工作上所採取的基本的與主要的組織形式，是普遍的建立人民代表會議，並在這一基礎上不斷提高、不斷發展而逐漸地過渡爲『完全能够代表人民行使各級政權的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劉副主席語）。

在目前，人民代表會議是代表最大多數人民意志的最高組織形式。一切經驗證明，凡是能够在召開人民代表會議時，密切地注意到代表的廣泛性，經過愼重的與放手的民主協商，並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選舉、推選、選派、邀請等各種方式產生代表，則各階層、各黨派、各界、各族就都會有他自己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我們各級的人民代表會議。這樣的代表會議，就必然地會成爲代表着、聯系着和團結着一切人民羣衆，而使他們眞正能够通過自己的代表行使國家政權的組織。這樣，就從組織上有效地保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共同綱領）這一莊嚴規定的實現。某些地區不合時宜地、過早地急於召開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僅是勞民傷財，而且也遠遠地離開了上述要求。延安縣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六十六個代表中，有五十九個共產黨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另一方面，建設人民民主政權又是領導與推動一切國家事業的最基本的一環。只有人民民主政權，才能保證與領導人民民主國家的國家事業順利推行。人民民主國家的一切國家事務與廣大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一切有關人民利益的事務，也就必然地成爲我們人民民主國家的國家事務。所有這些事務，都必然要依靠廣大人民羣衆的力量與智慧，才能很好地推行，而人民民主政權最基本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人民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則最能團結與組織廣大人民羣衆管理國家與自己的事務，廣大人民羣衆也只有掌握了國家政權，才能管理國家的和自己的事務。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權，就是爲了通過政權做好一切國家的事務和人民羣衆自己的事務。

基於上述理由，進一步建設與鞏固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顯然是當前國家建設中一項重要的任務。

## 二 人民代表會議是最群衆化的組織形式

自從蘇維埃政權鞏固地建立起來以後，就在國家政權史上寫下了新的一頁。正如列寧所說：『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的新篇章，即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就開始了。』因爲『蘇維埃政權是當還有階級存在時所有一切可能國家組織中最羣衆化和最民主的組織』，因爲它是『包括一切羣衆』、『直接的組織』，『是階級社會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其所以是『最國際性的』，就因爲它上述這些基本特點，應該成爲一切人民國家政權組織的基本原則。革命勝利了的中國人民，在組織自己國家政權時，必須是『實際的而不是形式的』組織起一個絕大多數人用以統治絕對少數人的國家政權，這個政權必須是『最羣衆化和最民主

的』、『包括一切羣衆的』、『直接的組織』。

我們過去各級各地的政權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全國人民團結合作、各級幹部的共同努力之下，已取得很大的成績。不僅使我們的政權制度建設在推動各種工作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即在我們政權組織的民主基礎上亦有很大的發展。但我們也絕不能忽視，在我們政權工作進一步發展、澈底走向民主化和羣衆化的道路上，還存在着很多的障礙與困難。某些幹部在思想上對我們政權制度的民主化與羣衆化這一特點認識不足，就是主要的障礙之一。

在政權建設工作中所存在的關門主義傾向，是錯誤的，因爲它不符合斯大林同志所教導我們的這些基本原則，因爲它違背了毛主席要我們組成『足以團結各界人士共同進行工作』的政權這一重要指示。由於我們某些幹部對這些基本道理認識不清，所以在他們領導之下召開的人民代表會議，就缺乏廣泛的代表性，缺乏足够的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參加，甚至某些地區的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大多數是幹部兼任的。這樣組織起來的政權，顯然是不够『羣衆化』和『民主化』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爲他們簡單地認爲憑着他們幾個人有一顆『爲人民服務』的忠心，就可以把一切工作都搞好了；甚至有的幹部更錯誤地認爲『天下是我們打出來的，代表有啥用』？他們不懂中國革命是廣大羣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經過長期的、英勇的奮鬥，發揮了無窮的智慧與力量，犧牲了無數的鮮血和頭臚而後取得的，絕不是少數人的功勞；而且今後的國家建設事業，仍必須處處依靠廣大羣衆的鬥爭精神和創造能力才能有所成就，離開了人民羣衆是什麼也得不到的。他們不懂爲了進一步鞏固與建設我們新的國家，必須發揚民主，『鼓舞人民起來作主人，把自己的和國家的命運操在自己手中，由他們自己來管理自己的事務和國家的事務』(劉副主席語)，他們也不懂『新政權所以能够保持得住並已經保持下去，純粹是靠廣大羣衆的信仰的；純粹是因爲它能够最自由地、最廣泛地、最有力地吸引整個羣衆去參政的緣故。』(列寧：『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和工黨的任務』)他們不懂廣大人民羣衆『有至高的責任與絕對的權利來做他們自己命運的主人翁，並把政權拿到自己的手裏。』(『法蘭西內戰』)

存在於政權建設中的形式主義偏向，也是必須糾正的，因爲它同樣也是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來就是並且永遠是從實際出發來攷慮問題的，他對待一切問題，首先是注意到問題的實質，爲了更好地、更全面而實際地解決本質問題，才創造更完整、切實而有效的形式。這和一切形式主義者攷慮問題的方法完全相反。我們在政權建設上所採取的基本態度，也應該是這樣的。

談到政權建設中的形式主義，我們必須談到一部分人不合時宜地、盲目地急於召開『完備』的『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爲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請讓我們引用劉副主席在北京市第三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一段講話：

『中國大多數人民、主要是勞動人民還不識字，過去沒有選舉的經驗，他們對於選舉的關心和積極性暫時也還不很充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就來普遍的登記選民，機械的劃定選區，按人口比例一律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來直接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根據我們過去在若干地區實行過的經驗，這樣的選舉反而是形式主義的。它給人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損害人民的積極性，在實際上並不能使這樣選舉產生的代表大會具有更多的代表人民的性質，因而也就不能用這種辦法使今天的人民政權更加民主化，更密切地聯系人民』。

過去，我們曾經在某些老區（如陝北、河北某些縣）、解放較早的城市（如石家莊等）實行過普選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那裏的羣衆一般說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是比較高的，但實行的結果，仍然是有一部分羣衆沒有能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參加政權，多數羣衆認爲這種做法過於麻煩。這樣的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缺乏着一部分羣衆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說，是使一部分人沒有能通過自己的代表參加政權，而在實際上失去了應享的民主權利。因此，我們不能認爲這樣的人民代表大會在實際上是更『民主化』、『羣衆化』一些，儘管他在形式上或手續上看來是比較『完備』的。

政權建設中一切形式主義的思想作風，都是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思想作風的殘餘，它與人民民主政權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完全背謬的。如果讓這種思想作風浸透在我們的政權建設工作裏，那只會使我們的政權日益脫離羣衆，而不是走向羣衆。

## 三　人民代表會議是推進國家建設事業的基本環節

取得勝利的革命人民建立起自己的政權，『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强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列寧語)從各方面看來，人民的政權是爲肅清一切舊社會殘餘，建設與鞏固新社會秩序，保障新社會建設的最基本的一環，是『在

人類活動的一切領域上成熟爲社會的指導者』，是『作爲經濟改造的槓桿』，是『提高文化的前提』，（『共產國際綱領』）只要把廣大人民羣衆緊密地團結在我們各級人民政權的周圍，『形成一個强大的統一的力量，去履行我們全國人民迫切需要履行的建設任務和國防任務』，『就沒有任何困難是不能克服的，也沒有任何任務不能完成。』（劉副主席語）

爲什麼這樣講呢？不通過健全的民主政權制度，一切國家機關，各級政府要辦的事，就得不到廣大羣衆積極的、熱情的、自覺的支持與協助，就不可能辦或辦不好；一切羣衆自己要辦的事，因爲自己沒有掌握政權，不能做主，也不能很好、很快地辦起來。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謝覺哉部長說過：『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鎭壓反革命、抗美援朝、生產建設、文教衞生建設等，都是有關人民利益的政。過去人民想辦，但沒有權……現在農民有權利……要辦得政很多，要辦得好，就必須開好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有些幹部，不明白這一淺顯的道理，把政與行使政權的機關對立起來，說什麼工作「忙」，不能開人民代表會議，而不知道人民要開代表會議，就是爲了討論與解決你所謂「忙」的那些工作，且只有經過人民代表會議，才有力量把所謂「忙」的那些工作解決得好和解決得有力。有許多例子，凡把重工作提交代表會議討論並做出決定的，會上大家議，議得十分週到；會後大家做，做得十分有效果。比那關起門，由少數幹部包辦的，不知好過多少倍』。這些幹部他們不僅不懂得這些淺顯的道理，也看不見日益發展的建政實踐，看不見我們的政權制度已經在實際工作中表現出來的無比的優越性，也看不見我們政權工作在推動各項國家事業上所發揮了的巨大作用。

各地經驗證明：抗美援朝運動一經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認眞與詳細地討論，立即通過各界代表的覺悟和積極的行動，就有力地教育與帶動了各階層的人民，迅速形成爲一個廣泛的、實際的羣衆運動；一切措施，一切號召均立即有效地貫徹到廣大羣衆中去，化成一種巨大的物質力量，發揮無比的效能。天津市某些幹部據說是因爲抗美援朝任務重、工作忙，而遲遲不願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但後來他們召開了代表會議討論了抗美援朝以後，就順利而有效地完成了他們這個『重』的任務和『忙』的工作，因此他們得到的教訓，只有一條：『人民代表會議開得太晚了。』

各地經驗又證明，在人民代表會議上討論鎭壓反革命，就有效地揭發了反革命份子的罪惡，使廣大人民羣衆進一步認清了反革命份子的反動本質，激發了他們對反革命份子的仇恨，貫徹了我們鎭壓反革命的政策，就使我們的鎭壓反革命的工作不再是僅僅局限在少數公安、司法人員的手裏，而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一個轟轟烈烈的羣衆運動，使反革命份子在羣衆當中，遭到空前的孤立，在國家權力與羣衆力量密切結合之下，受到嚴重的打擊，使我們的鎭壓反革命工作，獲得偉大的成績。

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對於推動國家經濟建設，同樣起着巨大的作用。劉副主席說過：『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必須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權來領導和保障。』新中國建立兩年以來，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是和我們兩年來在政權建設方面的成就分不開的。多少地區的人民代表會議不止一次地討論了經濟建設問題，不論是討論增加生產或佈置徵收或者其他經濟建設問題，經過代表會議上的認眞討論，經過代表會後代表們的積極帶動，就順利地完成了任務，並且有些地區不止一倍地超額地完成了任務。有一個縣，曾經有過這麼一件事，當該縣工商界代表在代表會議中眞正感到自己確是當了家做了主人的時候，他們就立即動員了全縣工商業戶，在一個半小時內，繳清了全部的稅款。

我們用不着舉出更多的事實，就僅僅在上述這些事實的面前，那些把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和其他中心工作對立起來，把召開代表會議當成上級交下的任務，看成額外負担等等的錯誤想法，還能不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嗎？

現在有一部份幹部，在事實的教育下，已不能不承認代表會議制度在推動各項工作的作用，因此他們說：人民代表會議確『是解決政府工作的最好方式，』顯然這種看法仍然是不够正確的。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國家的事情，人民的事情要人民來做主，『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政權的機關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會議）和各級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委員會向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會議）負責，並報告工作（共同綱領），』是人民代表會議決定的事情要由人民政府去做，而不是人民政府的幹部決定事情以後，交人民代表會議去做，因此，人民代表會議是國家的基本制度。

事實很清楚，道理也很明顯，但就是有些人還看不透、想不通，因此，我們必須再說一遍：開好人民代表會議是領導與推動一切國家事業和中心工作的最基本的一環。

## 四　爲建設與鞏固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而鬥爭

假使我們從組織上和工作上、形式上和實質上都經過分析以後，能够認清

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在當前確是能讓最大多數人民參加政權、行使政權、愛好自己和國家事務的制度，確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要進一步建設與鞏固我們國家基本制度的問題了。爲此，我們首先就必須使人民代表會議的制度成爲『我們國家從下至上的、系統的經常的鞏固的制度』（劉副主席語）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我們實際的政權建設工作當中，認眞地放手去發揚民主，克服與糾正存在於我們政權建設工作當中的關門主義、形式主義、任務觀點、利用觀點等等錯誤思想作風。按照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迭次關于加强人民民主政權建設指示的各種規定辦事。把一切應該交付人民的民主權利，都應毫無保留地交給人民，並老老實實地尊重他們這些權利，絲毫不許侵犯。凡是經過人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要辦的事情，政府就一定要辦；凡是經過人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不辦的事情，政府就一定不能辦。這樣，使人民代表在實際的民主生活當中，體驗到自己眞正是當了家做了主，體驗到掌握了民主政權的可貴，逐漸發揚他們主人翁的責任感與積極性，不僅僅是協助政府推動工作，貫澈政策，還要讓他們能自覺地、主動地起來監督政府尊重他們的民主權利，執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只有這樣，把我們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人民民主權利掌握在人民及人民代表的手裏，而不是掌握在少數政府幹部手裏的時候，才能算是眞正地、切實地把我們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形成爲『經常的』『鞏固的』制度。

當然，要做到上述這一點，並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這必須首先讓我們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從思想上澈底認識到人民的民主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做爲我們國家基本制度的人民代表會議制度是極端重要而絕對不容破壞的。一切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的、封建社會官僚主義的以及不正規的游擊主義的思想作風殘餘，均須堅決地予以肅清。一切革命的、爲人民服務的、走羣衆路綫的優良的思想作風傳統，均應在進一步制度化的基礎上切實深入地貫澈到我們的政權建設工作當中去。人民民主政權制度的日益鞏固與健全的過程，也就是我們廣大幹部和羣衆在實際的民主生活當中進行自我教育和組織起來的過程，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我們全體幹部和羣衆都必須對它有足够的重視，必須都以最高度的熱情、最積極的行動、最澈底的革命精神、最堅定的鬥爭意志，在人民民主政權建設的道路上，剷除一切舊的思想作風和制度，建立更好的新的思想作風制度。只有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廣大人民羣衆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才會迅速地提高，才能眞正發揮他們高度的主人翁感和參政的積極性。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由廣大的人民羣衆通過自己的代表，把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形成『經常的』、『鞏固的』制度。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把我們的人民民主政權制度再提高一步，從而直接的過渡到『完全能够代表人民行使各級政權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 新建設雜誌社招考
## 編輯出版工作人員啓事

本社因業務需要，擬招考編輯（大學程度）、及資料、校對各部門練習員（高中程度）數名，均爲薪給制。凡出身清白，有志從事出版工作者，請將親筆自傳一份，附照片一張，並開列志願及希望待遇，於十月十五日以前，寄交『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新建設雜誌社人事股』（不面洽）。合則函約面試，不合原件退還。（遠地應考不便，請勿來函。）

# 論又聯合又鬥爭的經濟統一戰綫

千家駒

毛主席曾經說過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個法寶之一。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政策，毛主席在一九三五年所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就天才地指出了它的重要性與可能性。陳伯達同志在『論毛澤東思想』一文中解釋這種『又聯合又鬥爭的廣泛統一戰綫』說：『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可能性，是聯合的政策；對於它的動搖性和妥協性，是批評的政策，也即是另一種鬥爭形式的批評政策。……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受蔣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限制和壓迫，同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被趕走之後，又來了美帝國主義的壓迫，這個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也損害了民族資產階級。這樣，就存在了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繼續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問題依然是：對於它的革命可能性，是聯合的政策，對於它的動搖性和妥協性是批評和鬥爭的政策。』『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毛澤東同志還指出了革命勝利後在經濟上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綫的必要性。』『當然，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明的：在經濟上的統一戰綫，也必須有又聯合又鬥爭兩方面的政策。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的發展工業生產的積極性，是聯合的政策；而對於資產階級的投機操縱和破壞政府法令與經濟計劃的行爲，則又是鬥爭的政策。』

陳伯達同志的這段話，明確地指出了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以及中國革命勝利以後，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所應該採取的統一戰綫政策是什麼，這種統一戰綫不是單純地聯合，而同時還有批評與鬥爭。鬥爭是爲了團結，同時還是爲了進行更好的團結。我們可以說，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統一戰綫，自抗日戰爭起到現在，已經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抗日戰爭時期，我們要聯合他們抗戰，反對他們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第二個階段是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我們要聯合他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即反對蔣介石反動政權，批評或鬥爭他們對美蔣反動派的幻想與妥協。這兩個階段的統一戰綫主要都是政治意義大過經濟意義的，即對於他們的革命可能性，採取聯合政策，對於他們的動搖性與妥協性採取鬥爭或批評的政策。自人民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統一戰綫的主要內容變成了以經濟爲主的統一戰綫了。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由於我們要求在革命勝利後中國經濟有一個長足的發展，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生產的積極性，是我們應該爭取和發揚的。毛主席指出了：『爲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爲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與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共同奮鬥』。但另一方面，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帶有先天的盲目性與無政府性的，同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更具有濃厚的封建性、殖民地性與投機性，這些方面，我們必須堅決與它作無情的鬥爭。即我們對於他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一面，要加以發揚；對於他們投機操縱、封建性、殖民地性落後的一面，要加以反對。這種又聯合又鬥爭的經濟統一戰綫，主要地決定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特質。不了解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徵，不了解新民主主義經濟對于資本主義經濟成份所採取又保護又鬥爭的方針，我們就不能了解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採取統一戰綫的必然性與重要性，同樣也就不能了解這種統一戰線所要聯合的是什麼，和所要鬥爭的又是什麼？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帝國主義時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內所發生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毛主席）。因此，新民主主義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它不像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那樣是一個獨立的歷史階段，它是一個過渡的社會經濟形態。毛主席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何以它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呢？因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個敵人不僅是中國人民主要的敵人，同時也是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主要障礙。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因爲革命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不可避免的結果』。㈠但是發展資本主義的因素，僅是

中國革命勝利一方面的結果，而其更重要的結果，還是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即『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結果，避免資本主義前途，實現社會主義前途』。㈡實現社會主義前途的保證，便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一個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革命。這樣一個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是不可能走向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前途的。在經濟上，中國革命勝利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固然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代表社會主義成份的國營經濟却會發展得更迅速，更壯大。『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這是我們『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㈢國營經濟力量的發展與壯大，是新中國走向社會主義而不致走向資本主義的另一個重要保證。

正因爲如此，所以在新民主主義下的私人資本主義，是被允許存在並且還需要有適當發展的，『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㈣但它的發展是有一定限度的，資本主義經濟必須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地揚棄了它自己，而變成它的反對物——社會主義，不過這個轉變，不必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需要流血的革命。毛主席說過，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們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㈤新民主主義經濟既是一個過渡的社會經濟形態，因此，它既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同時也不同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其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是它不只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且還要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它是在以工人階級爲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之下發展其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其不同於社會主義的，就是它一般地不反對資本主義，並不廢除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度，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相反地，它還要使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有一個適當程度的發展。發展的目的，是要替社會主義創造有利的條件，使它自已有可能走入社會主義。毛主席說：『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爲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㈥

說明了新民主主義的這種過渡性質，對於我們了解與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完全有其必要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徵是什麼呢？

首先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堅强領導。新中國有五種經濟成份，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各種社會經濟成分都要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國家要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五種社會經濟成份。『接收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官僚資本的一切工廠，礦山，鐵路，輪船，銀行，把這些企業變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國營企業』，㈦這就是成爲我們今日國營經濟的基礎。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生產上所佔的比重，就今天說來還是很微小的。因爲佔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農業與手工業生產，整個的是私營的範圍。在百分之十左右的近代化工業中，國營經濟亦不過佔了將近一半左右（重工業中，國營經濟所佔比重較大，約爲百分之六、七十，甚或有達百分之百者（如石油）；輕工業中，國營經濟所佔比重甚小，一般僅佔百分之二、三十，或不到百分之二、三十㈧祇有極少數工業爲例外），但國營經濟都是些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儘管它所佔的比重不大，它對國民經濟所起的作用却是有決定意義的。例如在交通事業中，鐵路全由國家經營，航輪也有半數上下是國家經營的，同時在商業中國營經濟已掌握大部份的對外貿易，而若干民生日用必需品，如糧食、煤炭、紗布、鹽、食油、石油等政府亦有充分控制的力量。國營經濟並掌握着銀行存款、放款、匯兌、保險業務的絕大部份。再通過了加工、定貨、收購等等方式，國家今天不僅是市場上最主要的出賣者，同時亦爲市場上最重要的購買者。自然，就某些工業部門來說，國營經濟所佔的比重還是很小的，而且在兩三年內，國營經濟的力量還不可能超過私營經濟，但在主要的經濟部門中，國營經濟的領導權是完全建立起來了。國營經濟的領導權可從兩方面表現出來。第一表現在市場上；今天在重要商品市場上有發言權的，已不是私人經濟，而是國營經濟，這種發言權，當一九五〇年三月實行財經工作統一以前，是還不會有的，去年三月以後，國家已經取得了主要商品市場上的發言權，這是今天物價所以能够穩定而且今後也可以保證繼續穩定的一個主要的因素。第二是表現在某些私人企業已經適當地組織在國家的產銷計劃之內。這也就是說，某些重要部門的私營企業，已經適當地服從整個國家經濟生產計劃，已經減少了它們的無政府狀態與生產的盲目性　。這一工作，是通過一系列包括公私營企業參加的專業會議而完成的。從去年六月份起，人民政府主管部門曾經召開了一系列的包括公私營企業參加的專業會議，制定了某些產銷計劃，雖然這些產銷計劃有的由於我們對實際情況估計得不够正確，後來作了一些修改，但一般地說，它在調整產銷關係，逐步地走向計劃經濟上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新民主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不同的，也就在我們的經濟計劃性上，社會主義經濟是完全具備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則是逐步地走向計劃化，這種計劃性將隨着社會主義成分的國營經濟力量之壯大而日益增加。

所以，新民主主義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將不斷地改變其各種經濟成份的相互關係，社會主義成份國營經濟的比重將一天天地超過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成份，但就絕對數量來說，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規模與範圍還要比今天大得多，所以私人資本家今天正用不着害怕它的被國家經濟所替代與消滅。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着重指出：私營企業必須服從國家的經濟計劃，必須配合國家的整個經濟建設政策，同時私營企業在其發展過程中，必須進行改造，使它由過去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服務的性質轉變爲面向人民，面向農村，爲廣大的工農大衆服務的性質。祇有這樣，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才能按照新民主主義的軌道而不是按照資本主義的軌道發展，才能在發展過程中改造自己，並且揚棄了自己，才能配合着國家經濟建設而穩步地前進到社會主義。

其次，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另一個特徵，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這是我們有別於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也有別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所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切以資本家的利益爲出發點的，國家也就是壟斷的資本家集團利益的代表者，在資本主義國家，有時雖制定一些干涉私人資本活動的法令，那不過是要求個別資本家局部利益服從資本家集團的利益，因此資本主義國家有『私』而無『公』，『資』利而『勞』不利。至於社會主義的蘇聯，由於它已經廢除了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已經沒有所謂『資本家階級』，也就無所謂『兼顧』，也用不着『兩利』。而現階段的新中國，我們還容許私人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還容許民族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實行有限度的剝削，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公私兼顧』，一方面要『勞資兩利』。『公私兼顧』與『勞資兩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具體表現。所謂『公私兼顧』，就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讓私人資本主義有一個適當的發展，也就是國營經濟與各種經濟成份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所謂『勞資兩利』，就是在資方執行了合理的工資制度，勞動保險制度，安全衛生制度以及其他勞動法令之後，應該保障資方的合法利潤，即承認資方有權獲得盈餘的最大部分，作爲他們投資的報酬。亦即承認他們有對工人階級作有限度的剝削之權。毛主席會經說過：『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份有一個發展。』㈧這就是我 們要與民族資產階 級實行統一戰線的主要根據。

正如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有聯合又有鬥爭一樣，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因素亦是採取有保護而又有鬥爭的方針；保障他們的合法利潤，獎勵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部份有一個發展，這是一方面。所以要這樣做，無疑地是現階段中國經濟落後性所決定的。然而這決不意味着我們對資本主義經濟無條件地放任與無原則地妥協。反之，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經濟一般的盲目性，以及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所特有的買辦性、封建性以及投機性，必須進行不調和的堅決的鬥爭。這是社會主義經濟與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鬥爭，也是計劃化經濟與盲目性經濟的鬥爭，這種鬥爭是長期性的，直到中國進入到社會主義爲止，決不會停止。由於新民主主義國家掌握着全國的金融、交通運輸、以及有關國家命脈的大工業， 並且通過了徵收公糧，加工訂貨，收購土產，而掌握着最大部份糧食、原料、以及一部份輕工業品，國家就掌握了一切有利的條件，可以有把握地運用自由市場法則與價格政策，打擊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有害的傾向，而使之有利於國營經濟與合作社經濟的發展，使之有利於計劃經濟而不利於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因此，在鬥爭中我們有把握可以取得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勝利，終於最後勝利地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另一個矛盾，是現代化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大生產與落後的分散的農民小商品生產者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將隨着中國工業化的進展而日趨嚴重。現代化的大生產越發達，落後的、分散的、細小而無組織的小農生產就愈益顯得追不上大工業與大都市經濟的要求，愈益顯得大工業與小生產者間的脫節，落後的農村與前進的都市脫節，小商品經濟與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的脫節，這種脫節如不加以克服，就無法實現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毛主席說：『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㈨但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對農業小生產的鬥爭，與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鬥爭，性質上是不相同的。從階級關係上說，新民主主義國家對私人資本主義的關係，本質上是工人階級跟資產階級的關係，這種關係所存在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不到社會主義實現，這種矛盾就不會消滅，鬥爭也就不會停止。但新民主主義國營經濟對小農經濟的關係，本質上卻是工人與農民的關係，他們不論在革命過程中或是經

濟建設中，都是可能合作而且必須合作的，因此新民主主義國家對農民小生產者的鬥爭，主要的是通過合作社，通過收購、貸款、供應農具種籽以及其他一切有利於農民的價格政策，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向集體化生產的道路。通過這種種方式，來鞏固和擴大工人與農民的聯盟，改造小農經濟的落後性和散漫性。毛主席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十)我們必須把自由散漫的農民的小商品生產，也組織到計劃經濟的體系中去，這樣，社會主義的實現，才有了最後的保證。

對于民族資產階級又聯合又鬥爭的經濟統一戰綫，與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又保護又鬥爭的經濟政策，兩者互爲表裏，互爲影響。不過這種鬥爭有時採取了教育的方針，有時採取了改造的方式，有時通過了經濟政策，有時運用行政力量，但是用不到武裝鬥爭或流血革命。我們可以有把握地克服資本主義的生產盲目性與無政府性，改造民族資產階級的殖民地性、封建性與投機性，穩步前進，自覺地、有計劃地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去，這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最後的使命。

(一)毛主席：『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二)毛主席：同上文
(三)『共同綱領』第廿八條
(四)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
(五)毛主席：同上文
(六)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
(七)陳　雲：『中國共產黨領導着國家建設』
(八)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九)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
(十)毛主席：同上文

# 關於人民經濟的幾個基本範疇

陶大鏞

我們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在發展中，它逐步揚棄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而開始穩步地走向計劃化的道路。因此，表現在我們社會裏的各種經濟範疇，本質上是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範疇不同的，同時，我們也不能把它與社會主義的經濟範疇看成一樣的東西。在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中，我們雖不像社會主義社會那樣，把那些表現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的經濟範疇（如資本、剩餘價值、平均利潤等）都予以澈底地消滅了；可是，任何一個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經濟範疇，在我們的人民經濟中都將或多或少地採取改造過了的形態，才能發生作用。說得具體一些，就是：儘管在我們的人民經濟中，也存在着商品、貨幣、資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等經濟範疇，但它們的實質及其所體現的生產關係，絕不能再與資本主義社會混爲一談了。

爲什麼呢？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社會的經濟基礎不同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是我們國家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政權的性質不同了，（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政權是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經濟的發展規律不同了，因而在這個社會結構中所表現出來的經濟範疇，當然也就有所不同了。

以下，我們對於新民主主義人民經濟中的幾個基本範疇，試作一番初步的考察，這祇能作爲引論而已。

## 一．商品價値

新民主主義的商品形態，決定於新民主主義人民經濟的性質。我們的社會經濟既然包括着五種成份，因而，它的性質是多樣性的：它包括了小商品生產（個體經濟）、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生產（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社會主義性質和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國營經濟與合作社經濟），這樣，在我們的社會裏，就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商品。由於我們工業在全部的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只佔百分之十，而農業和手工業却佔到百分之九十，所以，在新民主主義的初期階段，特別在廣大地區剛剛進行了土地改革以後，投在

流通過程中的，仍以當作小商品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包括農業副產品）佔着最大的比重。這一年多來，各地土產交流的活躍和繁榮，就是一個顯著的事實。

儘管如此，這絕不是說，在我們的人民經濟中，這種小商品生產已經居於支配的地位了。基本上，由於我們國營經濟對於其他四種經濟成份，要經常發生商品關係（如通過收購、委託加工、訂貨等方式），所以，我們國營企業的生產物也要採取商品形態而在市場上出現，以發揮它的領導作用。爲什麼呢？因爲，一切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都已由國家統一經營了。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物資，對於主要的日用必需品如糧食、棉布、煤炭、煤油、食鹽等，都可充分地供應到市場上去。一年來全國物價基本上保持穩定，就正反映出來：國營經濟對商品市場的管理和領導，已經取得光輝的勝利了。

在這裏，我們必須指出：儘管在我們的人民經濟中還普遍地存在着商品的關係，然而，從本質上看，它與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是顯然不同的。這主要有下面三點根據：

第一，從社會生產的物質基礎來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斯大林語），因而，一切商品都是從資產階級私有的工廠或農場裏生產出來的。可是，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國營經濟的日益壯大及其領導作用的日益強化和鞏固、由於合作社經濟的迅速發展，由於個體經濟的不斷集體化，更由於『私人資本主義的工業和商業正在逐步地被引向服從國家經濟領導的軌道』（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所以，儘管在數量上我們今天的商品類型，仍以小商品性質的爲主，但是隨着人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和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商品，一定會從相對的優勢發展到絕對的優勢。即使在今天，我們社會生產的主要物質基礎，也絕不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或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而是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

第二，從勞動的性質來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是具有二重性的。這勞動的二重性就體現爲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以及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與抽象勞動（創造價值）之間的矛盾，因而，勞動的二重性就暴露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可是，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社會裏，由於商品關係的轉變，勞動的性質也跟着發生了變化。首先，在國營企業中，由於一切生產資料屬於全體人民所有，它可以有計劃地把具體勞動分配到各個生產部門裏去，所以，這裏的勞動都是社會所必需的，它已消滅了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合作社經濟基本上也是如此。至於其他三種經濟成份，正一步步從個體經營趨向於集體經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正通過勞動互助、生產合作等方式而趨於集體化；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正通過聯營和公私合營而趨於集體化。）因而，在這些經濟成份中的勞動，也逐漸成爲社會勞動總量中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了。這就是說，隨着人民經濟的發展，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是在不斷地削弱中和消滅中。具體勞動（私人勞動）和抽象勞動（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在歷史上既是作爲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結果而發展起來的，它自然要隨着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對立關係的削弱而削弱下去。由此可知，在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中，勞動的二重性基本上已經發生變化了，它已逐漸趨向於消滅而不再體現爲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了。（當然，我們社會裏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和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商品，在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以及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間，基本上已經消滅了矛盾。）

第三，從價值法則來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價值法則是商品生產的基本法則』（恩格斯：「反杜林論」），它自發地調整着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資料和勞動的分配，就必然會造成生產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而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由於國營經濟對全般國民經濟的堅強領導，由於經濟建設的計劃性不斷提高，價值法則的盲目作用，基本上已經受到嚴格的限制了，同時，在人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它的作用更將不斷地削弱下去。在這方面，國家能動地有計劃地實施價格政策，就是對於價值法則的一種具體運用。例如，爲了發展農業生產，國家就通過商品交換的合同制，來保證農產品的適當價格（如棉糧比價、蔴糧比價、藏糧比價等）；又如，爲了消滅商人投機和加強市場管理，國家又可通過現購（即按合理牌價進行現購）、換購（即以糧、煤、鹽、布、百貨等進行換購）、賒購（即以保本保值的條件進行賒購）等方式，來使市價很快地回復到牌價水平。這樣，就可使市場上的供需關係，不再受盲目的價值法則的支配。當然，國家所規定或領導的市場價格　，是可能與商品價值脫節的，但是，商品市場價格究竟應該高到什麼程度或低到什麼程度，仍不能不以商品的價值作爲調節伸縮的準繩。所以，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內，價值法則是存在的，不過，它像在社會主義社會那樣，是以被改造了的形態而存在着。也就是說，在我們的人民經濟中，價值法則基本上不再是一個自發的經濟法則，而是一個自覺的經濟法則了。

所以，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並不是商品盲目地統治着人（所謂「商品拜

物主義」），而是人開始自覺地控制着商品了。隨着我們人民經濟的發展，隨着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不斷壯大，勞動的性質發生變化了，價值法則被改造了，跟着，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即社會的生產與資本主義的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也必然地被消滅了。

## 二　貨幣與資本

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旣普遍地存在着商品關係，那末，作爲商品交換之介媒的貨幣，當然成爲發展國民經濟的有力工具之一。由於我們人民經濟的發展將穩步地走向計劃化，由於我們能動地運用國家的價格政策，所以，我們社會裏的價格變動，不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它不是一種自發的力量，它基本上已不爲盲目的價值法則所支配了。正因如此，我們人民幣的本質、機能及其運動規律，都表現了新的特徵，最根本的，就是因爲我們人民幣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首先，我們必須認淸：我們的人民幣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貨幣根本不同，它並不是一種階級的剝削工具，而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武器之一。我們的人民幣是爲廣大的人民利益服務的，它主要可從人民幣下鄉（過去貨幣集中都市，現在人民幣已深入農村。）這一現象上反映出來。而人民幣價値的穩定以及『重貨輕幣』心理之開始轉變，更足說明我們的人民幣已在廣大人民中建立了信用，它已成爲人民經濟生活的血液了。

爲什麼我們人民幣的價値會這樣穩定呢？爲什麼在這麼短的時期內我們竟能戰勝通貨膨脹呢？爲什麼這一年來我們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値已能提高百分之二十八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我們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的優越性。祇有在這樣一個社會基礎上，我們的人民幣才可能成爲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改善國民經濟生活的工具。

同時，必須指出：我們人民幣的基礎之所以這樣鞏固，主要地，並不是靠國家銀行裏所存儲的黃金和外匯準備，它像蘇聯貨幣一樣，而是靠『國家所支配的巨量商品，這些商品是按照穩定價格加入商品流通範圍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頁五二二——三）也就是說，我們國營經濟部門所掌握的大量物資，是保證人民幣穩定性的主要物質基礎。當然，這並不是說，金子在我們國家建設事業中，不再發生任何作用了。由於我們今天在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上還比較落後，我們還得向國外輸入各種新式的機器設備，所以，我們仍要用金子作爲國際淸算的手段，（但我們與蘇聯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差額，主要已不用金子來支付了。）因此，我們今天『還是應當愛惜金子』（列寧語）的。不管怎樣，金子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所具有的那種特性（貨幣拜物主義），在我國基本上是失去了。

我們對人民幣的本質旣有了這樣的認識，就不難理解：人民幣的基本機能，也同樣具有着它的特性和優越性。一般說來，我們的人民幣是具備着價値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儲蓄手段這四種機能的。然而，隨着我們人民經濟的發展，人民幣的機能也會跟着向前發展。第一，作爲價値尺度的人民幣，已經不是當作金子（或銀子）的代表，（在資本主義市場裏，各種商品的價値是表現在金子上面的。）而是當作基本生活資料的代表，從而，貨幣價値的變動，不再反映金銀價値的變動，而是反映基本生活資料的價値的變動。同時，隨着市場管理的日益加强（價値法則作用之日益削弱）與經濟建設之日益走向計劃化，它當作價値尺度的機能也就沒有當作計劃的計算手段（即作爲一切經濟活動的計劃的計算手段或當作計算生產和勞動的尺度）這個機能重要了。第二，作爲流通手段的人民幣，也因加强貨幣管理，逐漸推行全面的劃撥淸算，實際上將會大大減少貨幣的流通量，因而，人民幣將在更有利於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活動範圍內發揮它的這一機能。第三，作爲支付手段的人民幣，今天也發揮了一定的機能。目前雖還沒有取消供給制，然而工資主要還是用貨幣來支付的。此外，公私借貸、繳付捐稅等，主要也是採取了貨幣形態。第四，說到人民幣當作儲蓄手段的這一機能，我們祇要從國家銀行存款（折實儲蓄存款和保本保値存款）的激增上，就可得到具體的說明了。

我們明白了人民幣的本質及其基本機能，就可進一步認識到：我們人民幣的運動規律是不同於資本主義貨幣的。由於我們人民幣的發行權完全爲人民自己的國家所掌握，由於我們實行了嚴格的貨幣管理，我們可以根據商品流通的實際需要來確定人民幣的流通量，因而，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發的貨幣流通法則，對我們的人民幣是不起作用的。資本主義貨幣運動規律的盲目性，將會破壞幣制的穩定性，而擴大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我們人民幣的運動規律剛剛相反，它是自覺地在國家銀行的指導和管理之下，國家將通過貨幣來調節商品的生產和交換，來加强城鄉的經濟聯繫，來促進經濟核算制和提高經濟建設的計劃性，來加快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工作，並爲過渡到社會主義準備物質條件。

講到這裏，我們必須把貨幣與資本的關係搞個明白。在資本主義社會裏，

貨幣主要不是當作貨幣來使用，而是當作資本來使用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運動規律（貨幣——商品——貨幣），就以貨幣作爲起點和終點，終點上的貨幣量比起點上的貨幣量愈大，就表示資本家獲利（剩餘價值）愈多，這就說明了爲什麼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貨幣變成了資本，它也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存在着剝削。然而，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貨幣是不是也會變成資本呢？從表象上看，我們似乎看不出什麼區別來。因爲，我們要『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要『穩步地變農業國爲工業國』，同樣需要資本也能大量而迅速地積累起來，因而，我們投資到生產事業上去（不論是公營還是私營的企業），經過一定生產時期和流通時期的周轉，總希望終點上的貨幣量要大於起點上的貨幣量，祇有這樣，我們才有擴大再生產的可能。可是，從社會本質上看，新民主主義的積累是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積累的。首先，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主要的生產資料已經成爲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勞動人民向國家提供的勞動力，一般當然不會再被當作剝削的對象。即使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場合，資本家還把勞動力當作商品來購買，但向他們出賣勞動力的，也同樣是國家的主人翁。這就指明出來：我們社會裏的資本家是在工人階級所領導的政權下發展生產事業的，所以，他們要想貫澈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剝削，是不可能了。因此，我們的人民幣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不同，後者主要是當作資本、當作階級的剝削工具來使用的；而人民幣却是用來發展國民經濟、用來爲國營經濟的資金積累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的。

## 三　『剩餘價值』與工資

在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中，既然存在着一部份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份，當然會有剝削的存在，但是，『剩餘價值』的剝削既非普遍地存在，也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同時，『剩餘價值』這一範疇的實質，在我們社會和在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一模一樣的。

對於國營經濟部門來說，由於一切生產資料已歸全體人民所有，國營企業中的工人，就是企業的主人，在這裏，勞動力不再是一種商品，勞動已完全擺脫了剝削，所以，『剩餘價值』的剝削在這裏基本上是不存在了。（這裏所有的，祇是剩餘生產物。）我們說『基本上』不存在，而不說『根本上』不存在，這是因爲我們的國營企業部門今天還要與私營企業部門經常發生關係（如委託加工、代銷等），這樣，就有一部份剩餘生產物會被資本家攫去而轉化爲『剩餘價值』。當然，這部份的剩餘生產物是極其有限的，隨着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日益壯大及其領導作用的日益增强（特別是國營貿易的發展），這一小部份剩餘生產物轉化爲『剩餘價值』的現象就將逐步趨於消滅。

其次，對於合作社經濟來說，由於生產經營的集體化，一般在按勞分配的情形下，基本上也沒有了剝削；祇有在按股來分配盈餘的場合，才有剝削的存在，這種剝削，自然是極輕微的，它也不能與資本主義性質的剝削相提並論。

再就個體經濟來說，由於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是獨立的小生產者，他們有自己的生產資料，他們用自己的勞動來進行生產，一般說來，他們不會剝削別人，也不會受到剝削。

至於私人資本主會經濟的場合，情形就不同了。由於我國經濟的落後性，我們今天不但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並且對於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私營經濟事業，還要鼓勵和扶助它們的發展。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第二十五條還特別規定資方有權利獲得股息、公積金、紅利和酬勞金。所有這些，都是由剩餘價值轉化得來的。所以，在私營企業的部門，勞動力還是被當作一種商品，剝削還是經常地存在着。不過，由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必須服從國營經濟的領導，由於民主的、平等的、兩利的、契約的新民主主義的勞資關係已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建立了起來，所以，私營企業內部的勞動者，一面受着資本家的有限度的剝削，一面在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上已獲得了確實的保障。這就是說，即使在私人資本主義的場合，由於正確地執行了『勞資兩利』的政策，也不致有資本主義社會裏的那種典型的『剩餘價值』剝削了。

最後，再從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來看：它既是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基本上當然還存在着『剩餘價值』的剝削，不用說，它的剝削率（剩餘價值率）一般將會低於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同時，在全部的『剩餘價值』中，祇有一部份眞正轉化爲資本家的利潤，另一部份交歸國家的價值當然會轉化爲剩餘生產物了。加以，在人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國家資本所佔的比重必然會一天天增高，因而，『剩餘價值』的剝削也將一天天跟着削弱下去。

由此可知：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剩餘價值』是存在着的，但它同樣也以一種改造過了的形態而存在着。它祇是一種有限度、有條件的剝削，它祇允許相對的剩餘價值剝削，它的剝削率和剝削量將隨着人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壯大而逐步削小，最後趨於消滅。

明白了『剩餘價值』所包含的實質，就容易理解新民主主義的工資形態了。在我們社會裏，主要也並存着兩種工資形態。在公營企業部門，勞動力既不是一種商品，工資就不再是勞動力的價格，它不再是必要勞動的體現物，因爲，在國營企業中，工人們的勞都都是必要勞動，他們雖也創造了剩餘生產物，但這都是屬於國家、屬於勞動人民自已所有的。基本上，我們國營企業部門已根據『按勞計酬』的原則來支付工資了。一般國營企業所採取的累進的計件工資制，就是這一分配原則的具體運用。

至於私營企業部門所採取的工資制度，基本上還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在那裏，勞動力既仍被當作一種商品，既容許剩餘價值的剝削，因而，工資仍不能不是勞動力價值之貨幣的表現，在它的背面也不能不隱藏着一種剝削關係。在前面已經說過，資方祇能對勞方進行有限度的剝削，所以，即使在私營企業內，工資也不致僅僅等於工人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隨着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一定也跟着提高。再加『勞資兩利』政策和勞動保險條例的推行，所以，工人的實際收入不但將會超過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並將與日俱增，那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基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就可明白：從本質上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剩餘價值』與工資這二個範疇也發生若干變化了。

## 四 利潤·利息與地租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剩餘價值一般可以分成利潤、利息和地租這三部份。現在我們先來看看利潤：利潤是剩餘價值的變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由於資本的自由移轉，通過盲目的市場法則，使各部門的利潤率趨於平均化。但是，在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裏，國家要加強對市場的管理，自由競爭、投機取巧的混亂現象是不容許存在的。同時，國家控制了銀行和其他重要的企業和貿易部門，有效地限制了資人資本的自由移動，因而，要在各經濟部門間形成平均利潤率是很困難的，自然更不可能發生壟斷利潤了。儘管『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上承認資方有權利獲得盈餘的大部分，作爲他們的合法利，但合法利潤並不就等於平均利潤。何況，今天國家興辦企業，決不光從利潤觀點着眼，爲了有計劃地發展某些重工業，即使獲不到利潤，國家還是要大力經營的。一般說來，國營企業的利潤率總比私營企業的爲低，隨着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壯大和經濟計劃性的提高，平均利潤率就愈益失去了它存在的可能性、而日益爲一種社會主義性質的計劃利潤所替代了。

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特別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爲了調劑城鄉間的物資交流，國家對於正當的（不帶投機性的）商業資本，必須予以扶助。因此，商業利潤同樣是存在着的。不過，在人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國營貿易（包括批發業和零售業）的領導將一天天推廣，這種商業利潤也將逐漸歸於人民的國家所有，它將逐漸失去原來的意義。

再來談一談利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利息是剩餘價值的一部份，利息率的高低，盲目地決定於借貸資本的供求關係。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社會裏，我們在全國範圍內雖已實行了減息政策，基本上消滅了封建性的高利貸剝削，但因我們還允許私人銀行錢莊的存在，所以，我們目前還不能完全消滅帶有剝削性的借貸關係。當然，今天國家銀行（人民銀行）與公私企業所發生的借貸關係，是不帶任何剝削性的，人民銀行所收的利息，祇是作爲一種服務的代價而已。但是私人資本之間所發生的借貸關係，不可避免地仍然帶着剝削性，由於國家銀行有意識地控制着市場上的利息率，因此，今天基本上不可能再發生高利盤剝的事情了。一般說來，在新民主主義的初期階段，利息率會較高，隨着國家銀行對私營行莊的領導與監督的加強，隨着銀行國有化政策的逐步推行，不但利息率會逐步下降，同時利息的實質也將不斷地發生變化，到最後，它就完全揚棄了利息的剝削性。

順帶地，也來提一提地租形態。在舊中國，地租可說是我們主要的剩餘價值形態。在最殘酷的封建剝削之下，地租不僅是指超平均利潤的那部分剩餘價值，並且是指農民的全部剩餘勞動的生產物。可是，經過土地改革以後，一切超經濟的剝削都被消滅了，耕者有其田了，地租大體上已變質爲一種農業稅而繳給國家了。隨着人民經濟的發展，國營農場和合作農場的規模也一天天擴大，最後從農業社會化進到土地國有化，於是，由土地私有權而形成的絕對地租是根本消滅了，級差地租形態也將引起變化了。

我們的人民經濟正在穩步地向前發展，上面所說的這一些範疇的具體內容，也不斷地在發展和充實中，我們現在所能指出的，祇是一個粗綫條的輪廓，不過，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範疇正逐步地發展、上昇和轉形爲社會主義的經濟範疇，那是必然的。

一九五一•九•廿二•於人民首都。

# 魯迅先生與編輯出版工作

臧克家

魯迅先生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今年十月十九日，是他逝世的十五週年紀念日，我們發表臧克家同志的這篇論文，一面爲了紀念這一位偉大的革命戰士，更主要的，是學習他對待工作的那種忘我的精神和對人民負責的嚴肅態度。

——編者

一個眞正的偉大的革命戰士，他的戰鬥精神必然會貫澈到他的每一個具體行動、每一件實際工作裏去的。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是一個新文化、新文藝的旗手和導師，他在許多方面所創造的業績，都是我們仰望的高峯，單就作爲編輯出版工作者的魯迅來看，他也是一個傑出的模範人物。他對待工作的那種忘我的精神，對人民負責的嚴肅態度，對惡劣的出版商和編輯人所作的堅決鬥爭，都值得我們向他致敬、學習。

魯迅先生，一方面對含有封建、反動各種毒素的、粗製濫造的文藝書刊施行猛烈的攻擊，使青年羣衆和廣大讀者的思想得到保衞；一方面把健康的、滋養的精神食糧供應出來。這是一種精神在兩個方面的表現。魯迅先生在編輯出版工作上的貢獻，是他戰鬥的爲人民的偉大業績的一個具體、重要的組成部分。只有這樣理解，我們才能够把他和一般從事編輯出版工作的人們區分開；才能够給他那在大事小節上表現出來的令人感動的精神找到淵源。

在反動時代烏烟瘴氣的社會裏，出版商掛着『爲文化服務』的金字招牌而實際上在爲金錢服務。書店老闆，他們並不關心出版物的有無價值，對讀者的利害若何，他們關心的是金錢，只要能够替他們賺錢的，他們就放手去印行。魯迅先生對這種情形最清楚也最痛心，他把『中國沒有好書』歸咎于『書坊專爲牟利』就是這個道理。

『蓋上海書店，無論其說話如何漂亮，而其實則出版之際，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化本錢，四欲大發其財，……』①

在『書的還魂和趕造』②中，魯迅先生對于用『大』、『多』、『廉』誘人其實是害人的『大部的叢書』的騙人伎倆予以揭穿：這類叢書『實際上却不過』是『一大堆廢物』，而出版商所以要出版它的惟一目的就是：賺錢。

爲了做生意，一家官商，在『四省不見，九島出脫』，『黃河出軌』，『岌岌不可終日』的時候，却影印起『四庫全書』的『珍本』來，這種『珍本』是『欽定』過的。

這類書商神通十分廣大，他們不但有拉攏作家的本領，還有『封定文豪』的大力，魯迅先生有一篇雜文，題名『「商定」文豪』③，『文豪』都要由『商』來『定』，可見出版商人氣餤的高漲。

除了專門圖利的出版商人，還有圖『利』更圖『名』的『作家』和編輯。

『……當文學家怎不馬上要名利，于是乎有術存焉。那術，是自己先決定自己是文學家，並且有點兒遺產或津貼。接着就自開書店，自辦雜誌，自登文章，自做廣告，自報消息，自想花樣……』④

常在魯迅先生筆下出現的『邵詩人』（洵美）就是『作家』兼『編輯』兼書店老闆的一個。他是鉅富『盛宮保』的孫壻，他辦了『十日談』雜誌，開着一個書店，他的『府上有惡辣的謀士』和『鷹犬』，他在讀者羣中散佈『唯美』，當魯迅先生碰着他爛瘡疤的時候，他便運用陰謀，滿懷『殺機』的來對付。

爲『名』如同爲『利』，是可以不擇手段的。『自收自己大名入辭典中，定爲「中國作家」，或自編自己的作品入叢集裏，名曰「現代傑作」』⑤或者在自己主編的『中國文藝年鑑』裏化名大捧自己，例如『蘇汶即杜衡』之類。

從這樣烏七八糟的出版商和編輯人手裏生產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偷工減料，惡劣、粗糙不堪的：

一家書店出版了『國學珍本叢書』，這部叢書，『誤用引號，錯點句子』

---

① 『魯迅書簡』265頁。
② 『且介亭雜文二集』19頁。
③ 『准風月談』203頁。
④ 同上37頁。
⑤ 『且介亭雜文二集』179頁。

，謬誤是很多的，經人在『國聞週報』上批評指出之後，主編先生在答覆的文章裏雖然承認了『養生主』並非『修兒孫福』，而末了却來了這樣一個解辯：『充其量還不過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書來，到底並沒有出賣了別人的靈魂與血肉來爲自己的「養生主」，如別的一些文人們也。』⑥魯迅先生很是氣憤，說他『洋場惡少』的嘴臉完全露出來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袁中郎全集』。魯迅先生『點句的難』⑦一文就是爲它而寫的。『有幾句點不斷，還有可原，但竟連極平常的句子也點了破句』，『調子有定的詞曲，句子相對的駢文，或並不艱深的明人小品，標點者又是名人學士，還要鬧出一些破句』：『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⑧眞是把一個袁中郎『借得一榻胡塗』，也把讀者們『借』得一榻胡塗。了草粗率竟到了這種程度，是令人大吃一驚的。看了以上這種種情形，就會理解魯迅先生的憤嘆：『看現在的出版物，「已」與「巳」，「戮」與「戳」，「剌」與「刺」，在很多的眼睛裏是沒有區別的。』⑨

『這些錯誤的書的出現，當然大抵是因爲看準了社會上的需要，忽忽的來投機，但一面也實在爲了勝任的人，不肯自貶聲價，來做這用力多而獲利少的工作的緣故。』⑩從這些話裏不但可以見出魯迅先生自己所以要編輯刊物出版書籍的一個原因，同時也可以了解，在這方面，他何以那樣熱心的鼓勵朋友或幫助朋友去做。

『北新書局』最初就是在魯迅先生的鼓勵、扶持之下在北京成立的。主持人李小峯當時就是追隨魯迅先生的一個文藝青年。雖然因爲他不發作者的稿費爲魯迅先生所不滿，但給他主編刊物，把書交給他出版，始終支持他。先生時常說：『某某書店亂七八糟，眞氣人，許多人固然受了他胡塗之累，可是他也時常胡裏胡塗地吃人家的虧（如幾次封門）。比起精明的來，不無可愛之處。』⑪魯迅先生對于肯出點像樣的書的書店是如何的愛護。

約莫和『朝華社』差不多同時，張友松主持了一個『春潮書店』，魯迅先生經常給他的刊物義務寫稿，爲了給書店打開僵局，還借給了他五百塊錢。

魯迅先生極力誇獎鼓勵肯印書的人，他說：『在唯利是圖的社會裏，多幾個呆子是好的。』

魯迅先生自己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呆子』。他在編輯出版事業上付出的精力和時間在他一生歲月中佔的比重是很大的。他主編，和朋友合編再加上贊助朋友們編的刊物，合起約計十餘種⑫。他和朋友們創辦了『未名社』、『朝華社』。他主編過『未名』、『烏合』、『奴隸』等叢書，他印行過：『鐵流』、『鐵流之圖』、『士敏土之圖』、『引玉集』、『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死魂靈百圖』等。有的刊物不拿編輯費，有的甚至自己貼上錢；有些書是和朋友合資出版的，有的則是完全自己掏腰包。他在給李秉中的信上就說過這樣的話：『我現在仍在印「莽原」，以及印些自己和別人的翻譯及創作。可惜沒有錢，印不多。』⑬這些情形，以及因出書刊受書店的磨難，受經濟的壓迫的情形，都可以從『書簡』和『日記』裏查得出來。在先生生活的後期，受到反動派的高壓，版稅來源又不暢，從窘艱生活的費用中擠出錢來印這些書，不了解先生的人一定要發生疑問：一種什麼力量促使他這麼幹？他這麼幹目的又是什麼？在上面我們說過他從事編輯出版工作的意義和目的，現在就用事實來證明它。

早在一九二六年六月間，魯迅先生在給李秉中的信上說：『……我近來忽然還想活下去了。……是自己還要發點議論，印點關于文學的書。』⑭他把『發議論』、『印文學書』作爲自己生命的支持力量——也就是戰鬥力量，這志願的意義是如何的重大！這印書目的是如何的莊嚴！這和他爲了醫治萎弱的民族精神而從事文藝活動的意義是一致的。

『……凡是爲中國大衆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總希望（並非爲了個人）能夠略有幫助。這是我常常自己印書的原因。』⑮

---

⑥『且介亭雜文末編』103頁。
⑦『花邊文學』161頁。
⑧同上172頁。
⑨『南腔北調集』131頁。
⑩同上132頁。
⑪『欣慰的紀念』73頁。
⑫『國民新報』副刊、『莽原』、『語絲』、『奔流』、『朝華』、『譯文』、『文藝研究』、『萌芽』、『十字街頭』、『前哨』、『作家』、『中流』、『海燕』。
⑬『魯迅書簡』9頁。
⑭同上。
⑮同上934頁。

他在一篇『通訊』裏說：『現在的各種小週刊，雖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⑯辦刊物、出書是爲了戰鬥、爲了大衆的。這可以作爲魯迅先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的一句簡單宣言。

編輯出版的意義既然這麽重大，那麽出版物的思想內容就得放在第一位上去。

我們檢查魯迅先生所編輯出版的書刊，按其內容的意義來區分，可以劃成三大類。一是發揚中國舊文化中優秀傳統的；二是紹介外國——特別是俄國古典文學和蘇聯進步藝術的；三是鼓勵當代文藝創作運動的——特別注意發現、培植、扶掖青年作家，而前二者又是爲了後者的。

現在我們分開來研究一下。

魯迅先生對待中國的舊文藝持着棄其糟粕、吸其精華的批判態度。經他校勘、編印的文集及作品有『嵇康集』、『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和他自己的著作『中國小說史略』、『中國文學史略』的一部份——『漢文學史綱要』等，從這些編著裏可以看出他對中國舊文學的研究的精湛，下的整理工夫之大！

他對于中國的版畫也很欣賞，他和鄭振鐸先生合資出版了『北京箋譜』，『十竹齋箋譜』等，他自己說：『我舊習甚多，也愛中國箋紙，當作花紙看，這回輯印了一部箋譜，算是舊法木刻的結賬。』⑰這個『結賬』工作很費了他一番心血。他對于這方面，本來研究有素，選擇的時候極爲嚴格。他印舊木刻並不是爲了復古，或迷戀骸骨，而目的是想『從中國的古代藝術裏尋找對于現代木刻有益的滋養料。』⑱

關于紹介外國進步的藝術，魯迅先生把它比作私運軍火給起義的奴隸，他又曾說過：『……從別國裏竊得火來，……煮自己的肉……』⑲，他總覺得『中國作家的新作，實在稀薄得很』，原因之一，是『沒有遺產』，『可見翻譯之不可緩』了。⑳

在藝術方面魯迅先生之所以選定、印行『一個人的受難』、『蘇聯版畫選集』、『引玉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等，固然是希望我們幼弱新進的木刻家從那裏學到一些表現手法——也就是技巧之類，但主要用意所在是學習外國那些木刻家們的把木刻和現實緊扣在一起而爲它服務的那種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戰鬥精神。因爲『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㉑

在文學方面，那情形也是一樣。魯迅先生所譯、所編、所出版的國外文學——特別是蘇聯的文藝理論與創作，對于中國的文藝思潮和創作，對于整個的文化界和社會，發生了很大的推動力量，起了極爲深刻的影響。

魯迅先生所編刊譯作的內容，也隨着時代、隨着他自己的前進而前進。在他的晚年，黑暗反動的勢力向他壓下來的時候，他編輯出版了『藝術論』、『文藝與批評』、『鐵流』、『海上述林』……這意義是十分清楚的。對于自己初期初版的翻譯，他後來也覺得多數『皆較舊，失了時效，或不足觀』㉒，一九三〇年他所翻譯的雅各武萊夫的長篇小說『十月』（他所主編，中途由于出版者——『神州國光社』的變卦而流產了的『現代文藝叢書』之一），三年之後，雖然他仍然肯定這本書『還可以作爲現在和將來的教訓』，但他也作了這樣的批判：『「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當然看不見全局』㉓

他負責編輯出版的書籍，都是在嚴密的計劃之下進行的。譬如要出一套翻譯叢書，不但注意原著的選擇，翻譯的人也是經過慎重考慮選定然後才分頭去約。從『未名叢刊』和『現代文藝叢書』的目錄和譯者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編輯的計劃性和嚴肅性。在這樣情況之下出版的書籍，在思想內容是健康的，譯文方面是認眞的、對讀者負責的。所以受到羣衆的歡迎，有着持久的生命力。魯迅先生對于他早年親手經營的『未名社』出版的作品， 後來就曾作了這樣的估價：

『……介紹了果戈里，……介紹了愛倫堡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的「四十一」。還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

---

⑯『華蓋集』26頁。
⑰『魯迅書簡』425頁。
⑱王士菁：『魯迅傳』510頁。
⑲『二心集』33頁。
⑳『魯迅書簡』835頁。
㉑『熱風』47頁。
㉒『魯迅書簡』984頁。
㉓『魯迅書簡』323頁。

事實不爲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却至今沒有枯死的。」㉑

以上我們對魯迅先生編輯、出版的方針、內容以及編輯出版的計劃性作了一個約略的介紹與分析，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他在編輯體例方面的一些創造和特點。

第一，把討論辯駁的對方的文章和書信作爲『備考』『來信』坿入集子。在『准風月談』『「感舊」以後(上)』之後，就坿有施蟄存的『「莊子」與「文選」』。在『僞自由書』『透底』之後坿了祝秀俠的來信(112頁)，這樣體例是舊傳統的優秀方面的一個承繼與發揚。『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裏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裏也有伏義的來信，……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爲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爲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爲什麼要說那些話……』㉕

第二，魯迅先生在他自己的著作裏，有許多是前有『序言』，後有『後記』。這個『後記』往往很長，很長，包羅萬象，有關的別人的文章，甚至報紙新聞也全引進去。有個惡劣的『批評家』在『社會新聞』上說他印書(指『准風月談』)的本意，完全爲了一條尾巴。『這其實是誤解的……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但畫上一條尾巴，却見得更加完全……』㉖在『准風月談』的『後記』上他又說：『用「後記」來補敘些因此而生的糾紛，同時也照見了時事』

我們之所以說作爲編輯出版家的魯迅先生是偉大的，就是因爲他在大小具體工作上——上至決定稿件，下至校對跑印刷廠，無不任勞任怨，拿出全副精力去做。

首先，作爲一個刊物的編輯，我們看看他如何對待投來的稿件。

魯迅先生在給黎烈文的信上說過這樣一個近乎笑話的事實：『我在北京見一編輯，亦新文人，積稿盈几，未嘗一看，罵信蝟集，亦不爲奇，久而久之，投稿者無法可想，遂皆大敗，怨恨之極，但有時寄一信，內畫生殖器，上題此公之名而已。』㉗這樣的編輯算得是一個『典型』，而魯迅先生却恰恰和他相反。他覆信的快是出名的。一九二九年，他在主編『奔流』，稿件往返十分頻繁。他收到稿件之後常是立即回一個信，使作者安心，例如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上寫着『得王余杞信並稿』，在第五天的『日記』上就有『復王余杞信』的記載。

如果不用的稿件，立即就退還：『十八日……得鄭泗水信』，第二天就記着：『下午復鄭泗水信並還稿』。

有時也許過一個短的時間，將積下的稿件整個清理一下，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日的『日記』上記着『寄還各種投「奔流」稿』就是這樣的。對于決定採用的稿子有缺陷的時候，也還要提出意見商請作者修正。從『兩地書』上就可以找到景宋向『莽原』投稿時的這種情況。魯迅先生看稿子十分認眞，一個字都不輕易放過，如有疑難，一定向作者詢問。他曾看過許欽文一篇題名『傳染病』的小說，寫着在屁股上打針，魯迅先生在給孫伏園先生的信上說：『據我所知，當在大腿上，改爲屁股，地位太有參差，豈現在針法已有改變乎？便中望一詢爲荷。』㉘他對于作者這樣尊重，但他對于讀者更爲負責。如果譯作有了錯誤時，他『以爲只好澈底的修改，本人高興與否，可以不管，因爲譯書是爲了讀者，其次是作者，只要于讀者有益，于作者還對得起，此外是都可以不管的。』㉙

現在，我們引景宋的一段話，看看魯迅先生對待投稿的整個情形吧：『先生初到滬時編「奔流」、「語絲」，投來的稿子，眞是繽紛萬狀：有寫了一次即不願復看一遍，叫先生細改的；有翻譯而錯誤很多不能登載，致招怨尤的；有一稿油印多份，分投各刊物的；有字甚小，糢糊難辨的；自然還有不少稍加修改，即可採用的。這些，如果是那原文先生能自己對照的，多給改正。其爲從英文譯來，遇有疑難，亦必多方向人打聽，修改妥善。……』㉚看稿，忙累之外還招怨受氣。但是『爲于讀者有所貢獻計，只得忍受。』㉛

魯迅先生對于自己主編的刊物，不但對來稿認眞，取捨嚴格，就是對于一

---

㉔『且介亭雜文』66頁。
㉕『且介亭雜文二集』211頁。
㉖『准風月談』210頁。
㉗『魯迅書簡』385頁。
㉘『魯迅書簡』23頁。
㉙同上868頁。
㉚『欣慰的紀念』75頁。
㉛『魯迅書簡』384頁。

篇『後記』，也毫不苟且，增錄在『集外集』裏的十一篇『奔流』的『編校後記』就是一個典型例證。那種對作品及原作者評介的切實負責精神，眞如楊霽雲在該書『後記』裏所說『任何雜誌是找不到這種編者負責表示的後記了。』

對於自已負責出版的書籍，那嚴肅認眞的精神也不是兩樣。爲了紀念被國民黨殘殺了的戰友——瞿秋白先生集貲出版了他的遺著：『海上述林』。在編輯、校對、出版上表現出的負責精神是少有的。把他翻譯的高爾基的早年創作找到原稿來校對，將一些注釋補了上去。

曹靖華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說：『「死魂靈」第三章中，有一句「近乎剛剛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先生知道眉提希的威奴斯爲克萊阿美納斯所雕刻，但沒有見過這雕刻的圖像，不知出浴者的姿勢，於是東翻西査，却遍査不得，又買了日本新出的「美術百科全書」來査，依然沒有，之後，花了更多的力氣，終於査出註明。』㉜

對于一本書籍的名字，他也煞費苦心。他曾經向李霽野建議把『聖經』分爲兩部，以『新約』、『舊約』的名稱出版，免得使讀者看了名字生反感。在當時反動統治之下，連起個書名也沒有自由，魯迅先生也就在書名上表現出他善於鬥爭的精神。有一次他想把自已的一本雜文定名爲『狗兒年雜文』，『但恐於郵寄有碍』終於拋棄了它。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上，他這樣說：『更不好的是內容並不怎樣有力，却只有一個可怕的外表，先將普通的讀者嚇退。例如這回無名木刻社的畫集，封面上是一張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買了。』㉝他自已的著作，例如『准風月談』、『花邊文學』……外表多麽漂亮，骨子裏多麽深刻。

校對工作也花費了他不少力量。我們看他的『日記』，從一九一二年起一直到他死前幾日止，幾乎經常在校對之中，類如『校苦悶的象徵印稿訖』，『通夜校奔流稿』……這樣的記載是信手翻去就可以發現的。他白天校，黑夜校，『吃着藥校』㉞，爲了校長虹的稿子竟『吐了血』。他這種偉大犧牲的精神，令人旣欽敬又感動！他的校稿，一個字不肯放鬆，名副其實的做到了『校讎』，如果是譯稿，『一定找原著來對照修改。比方是英文原本之外，再有其他國家譯本可以參考，他更願意周到些。設或還有懷疑之處，不是自已獨立能够了解的，他必定請敎比他更高明的，總之，決不肯含糊了事。』㉟對於曹靖華譯的『鐵流』就是對照德、日譯本校對過的，辛勞的結果是：『當然不能成爲定本，但完全實勝于德譯，而序跋、注解、地圖和插畫的周到，也是日譯本所不及的。』㊱

魯迅先生就這樣不顧個人健康的日夜埋頭把精神消耗在校對工作中。蕭紅在回憶裏記著：『瞿秋白「海上述林」，校樣，一九三五年冬，一九三六年春，魯迅先生不斷的校著，幾十萬字的校樣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樣來總是十頁八頁的，並不是統統一道送來，所以魯迅先生不斷的被這校樣催索着，魯迅先生說：

「看吧，一邊陪客，一邊看校樣，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聽……」

有時客人來了，一邊說着笑話，一邊魯迅先生放下了筆。有時候也說：『就剩幾個字了……請坐一坐。』㊲

在他死前的十八天，高燒過後，針藥之餘，寫下了這麽最後有關校對的一句：

『三十日（一九三六、九月）曇上午校海上述林畢。』

先生除了對自已編輯出版的書籍負校對責任之外，還替青年看稿，給許多作家校選書籍。青年們的稿子，『字那麽小，複寫的鉛筆字是那麽模糊，先生就夾心襯一張硬白紙，一看三歎，終於看完了。』㊳

先生自已著譯及編刊的書籍、雜誌，再加上替別人『選定』、『校訂』、『校刊』的作品將近一萬二一種，有的還一校再校三校，約計下來，總不下兩三千萬字！這是如何龐大的一個數目！先生把多少心血灌注了進去。一個黑字就是他的一滴紅血。他自已說：『即使校對別人的譯著，也眞是一個一個字看下去，決不肯隨便放過，敷衍作者和讀者的，並毫不懷着有所利用的意思。』㊴

他付出的心血的代價很大，收穫的結果也很大：『凡是經過他親手校正過

---

㉜曹靖華：『魯迅先生與譯文』
㉝『魯迅書簡』654頁。
㉞『兩地書』192頁
㉟『欣慰的紀念』96頁
㊱『三閒集』181頁
㊲『回憶魯迅先生』35頁
㊳『欣慰的紀念』96頁
㊴『三閒集』181頁

的書，沒有不博得堅强的信譽』的。㊵

一本書的好壞，固然決定於它的內容，但光有好的內容並不一定够上是一本完美的書。如果要求一本書是一個完美的藝術品，那就必須使它從內容到形式成爲一個統一的整體。魯迅先生對他自己所出版的每一本書，都極力講求，甚至使它成爲一個完美的藝術品。所以從插圖、封面、版式，到紙張、訂裝，甚至一個標點的位置，邊的切與不切，全在他嚴格的要求與注意之下。

我們知道，魯迅先生從小就喜圖畫，『搜集繪圖的書』㊶，到後來收集漢碑象圖，搜羅版畫木刻，『酷好美術』。㊷對『美』的感覺極爲敏銳。

爲了『增加讀者的興趣』，他提倡在書籍裏插圖，作爲『裝飾』，這，一方面是發展固有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是接受了外國的影響。

『歡迎插圖是一向如此的，記得十九世紀末，繪圖的『聊齋志異』出版，許多人都買來看，非常高興的……，我以爲插圖不但有趣而且有益……』㊸

『……到近幾年，才知道西洋還有一種由畫家一手造成的版畫，也就是原畫，倘用木版，便叫作「創作木刻」……現在我們要介紹的，便是這一種。』㊹魯迅先生的『朝華夕拾』裏就印著先生自繪的『曹娥投江尋父圖』和『活無常』、『死有分』的插圖。在他編刊的雜誌和譯作裏也插有很多寶貴的插圖。這種插圖固然是爲了『裝飾』，然而同時也含有戰鬥的意義。『譯文』終刊號第一張木刻是李卜克內西遇害的紀念，就是如此的。

對于版式、版權頁，他也很注意並有自己的創見：

『莽原』原是第一版上層之首印著刊名，同版下層末尾印著目錄的。景宋提意見將目錄和刊名放在一起。最後魯迅先生決定了『另一格式』，『則目錄既在上邊，容易檢查，又無隔斷本文之弊。』㊺這樣一個小小問題，他却要在上面煞費苦心，爲讀者的方便設想，畫了版式和景宋彼此一再研討。

在印『十竹齋箋譜』的時候，關于版權頁創造了新的式樣：

『我想這回不如出新樣，於書之最前面加一頁，大寫書名，更用小字寫明借書人及刻工等事，如所設「牌子」之狀，亦殊別致也。』㊻

『我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已暗暗地定下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與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㊼他在『華蓋集』『忽然想到』裏也有同樣的話，不過說得更透澈：

『我于書的形式上有一種偏見，就是在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後，總喜歡留些空白……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甚麼，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使人發生一種壓迫的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

魯迅先生反對書的每一行頂上，出現圈、點、虛線、或括弧的下半（』），因爲那樣不好看。他『先前做校對人的那時』想了個補救的辦法：在上一行裏分嵌四個『鉛閒』，就有一個字被擠到下一行裏去了。

關於書的毛邊，魯迅先生是極力主張的。一方面爲的美觀，『說光邊好似和尚頭似的』。㊽一方面也爲了實際——弄髒了可以切了去，在『集外集』付釘裝時，他叮囑『給我留十本不切邊的』。他早年出版的㊾『域外小說集』初印本就是『毛邊不切』，難怪他自稱是『十年前的老毛邊黨』了。

封面，是一本書的外表，它的美惡影響著人們對這書的印象，所以魯迅先生在這上面也大費心機。許多書刊的封面都是他親自設計，『面上印字之樣子』也自定款式。關于『出了象牙之塔』的封面，他給李霽野信特別提出來嫌上一次太印在中間了，下面應該不留空白，希望能得到更正。『商務館』承印的『苦悶的象徵』封面，『彩印五色』，魯迅先生把自己對于印刷辦法寫信去要求他照辦：『將無畫處之網目刻去，則畫是五色，而無畫處仍是空白，可以四圍沒有邊線』。㊿他這麼當行，又這麼精心，所以他所設計的書的封面有的藝術節十分美麗，如『城外小說集』初印本；有的則白紙黑字樸素大方，如

---

㊵欣慰的紀念　一三七——八頁
㊶朝華夕拾　二五頁
㊷蔡元培：『魯迅全集』序
㊸書簡　八六三頁
㊹南腔北調集　一九七頁
㊺兩地書　六七頁
㊻書簡　五七一頁
㊼而已集　八七頁
㊽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　一二三頁
㊾書簡　四七一頁
㊿同上　一四六頁

『且介亭雜文』等。

先生對于鋅版、紙張都十分內行。從他的『日記』裏，可以找到許多親自跑製版所去製鋅版的記載。景宋在一篇文章裏說：『有些製版所因爲他的生意相當忙，而且樣子又樸素，認爲是跑街之流的人物，特別給他一個九折……有時爲了便宜，就會多做幾個鋅版預存起來，總計大大小小不下一千多個，都是他自掏腰包，自去奔走得來的。』[51]

『蓋同是鋅版，亦大有優劣，其優劣由于照相師及浸蝕師之技術，浸蝕太久則過瘦，太暫則過肥，而書店則往往不察優劣……』[52]你看他對于鋅版的辨識是如何的精深！

對於紙，他的知識也是很豐富的，什麼羅紋紙、抄更紙、玉版宣或特別宣……。他印書一定要好紙，用壞紙，他寧可不出：『「勇敢的約翰」，……倘一任書坊用粗紙印刷，那是有出版之處的，但我不答應如此。』[53]『莽原』用好紙而減少頁數他認爲『甚好』。他以高價用『中國宣紙玻璃版』『印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54]，爲了力求紙張、印刷的精美，他把『引玉集』、『海上述林』拿到東京去印，使這些書成爲白玉無瑕的精美完整的藝術品。

從上面反對出版商及『作家』兼編輯的引文裏，我們看到魯迅先生對『自做廣告』大吹大擂的惡劣作風是深惡痛絕的。他是主張『不要貼大廣告，却不妨賣好貨色的』。[55]他說『「未名社」是一個實地勞作，不尙叫囂的小團體』。[56]他就是這樣一個實地勞作，不尙叫囂的人。

他對于在刊物上埘登些亂七八糟的廣告，極爲痛恨。爲了『醫生診例』、『襪廠廣告』、『立愈遺精藥品廣告』在『語絲』上出現，他大爲不滿，就在同一刊物上把一篇反對這情形的文章登了出來作爲抗議。

他對于一個雜誌先刊登『要目』和不徵得作者同意自行『預告』的作風也很起反感。我們引那個例子在下面：

『頃見申報，則「譯文」三卷一期目錄已經登出，上云『要目』，則刊物來後，比要目少不了多少，倒是很不好的』。[57]

『「文學社」』的不徵我同意而登廣告的辦法，我看是很不好的。這樣逼出來的成績，總不見得佳，而且作者要起反感』。[58]

他自己編輯出版的書刊也是登廣告的，但是，那是多麼誠實、別致的一種廣告：

『大志向是絲毫也沒有的。所願的：無非一、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從速買完，可以收回錢來再印第二種；二、對於讀者，是希望看了之後，不至於以爲受騙了。』[59]

以上是『「未名叢刊」與「烏烏叢書」廣告』的一部分。

下面是『「奔流」幾例五則』中的兩條：

『（2）本刊的翻譯及紹介，或爲現代的嬰兒，或爲嬰兒所從出的母親，但也許竟是更先的祖母，並不一定新頴。』

『（4）本刊亦選登來稿，凡有出自心裁，非奉命執策　，如明、淸八股者，極望惠寄，稿由「北新書局」轉。』

這些廣告，恰如許廣平在『集外集拾遺』『編後說明』中所說：『雖寥寥數語，頗費匠心』，『每于字裏行間，卓著風格』，『多爲讀者所揣摩愛好』。它們不但代表了他所出版的那些書籍雜誌，也代表了出版那些書籍雜誌的他的這個人！

魯迅先生對於作家的稿費版稅處理得極爲認眞。出版商在這些方面都是苛刻的，先生則替作家力爭。『譯文』爲了稿費辦法得不到協議，出了三期而稿費未付，累得先生對來討稿費的作者一一解釋。『奔流』，『因爲北新書局』在稿費上拆爛汚致使許多投稿者向他索取稿費，弄得他很窘，所以他要書局把稿費整個付出由他轉發，否則停編。結果是勝利了，然而從此增加了一個麻煩，他的『日記』上多出了一些寄稿費的紀錄，大都很零碎，這個十元，那個五塊幾角。

他自已的版稅，常是收不到，生活困窘，但對於自已經手的別人的書，有時還把版稅墊付出來，孫用譯的『勇敢的約翰』就是一個例子。『未名社』出版的書，有一些後來轉到『開明書店』出版，版稅都是先到先生的手裏，然後

---

[51] 欣慰的紀念　一二〇頁
[52] 書簡　二四六頁
[53] 同上　二三二頁
[54] 魯迅日記　十九册六頁
[55] 書簡　四六三頁
[56] 且介亭雜文末編　九二頁
[57] 書簡　七五五頁
[58] 同上　八六四頁
[59] 集外集拾遺　三三三頁

再轉給作者。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日記』裏，還看到代收『開明書店』送到的韋叢蕪的版稅。這種負責的精神是難得的。

書籍銷路的好壞，和推銷能力的大小是密切相關。這一點先生是看準了的。但是『可靠的書店，往往不善於推行，有推銷手段者，大抵連書款（打了折扣的）也不還。』[60]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方面只得找可靠的地方代售，例如『朝華社』代辦處的『合記』[61]，『廈門大學』裏那個『可靠』的『人』[62]；另外，他自己在廣州的時候，也曾開過『北新書屋』，專買『未名社』和『北新書局』出版的書刊，寄書、寄款、結賬的零星工作全堆在他一個人身上。快要離廣州的時候，他在景宋相助下把該屋所有的書籍點交給『共和書局』托他們代售。[63]就在這樣實際工作的磨鍊裏，先生精通許多業務上的技術，『包紮』的堅牢與齊楚，就令許景宋驚佩過。

魯迅先生在書的定價方面，也時時在爲讀者設想。他主張定價低，有些書於精印本之外，另印一種廉價的普及本。因爲他自己小的時候就吃過對歡喜的書沒有錢買的苦頭。在刊物上發表過的文章出單行本時，他提議給全年的訂戶以特價，倘預定者不滿百人，則每人贈書一本。你看他爲讀者設想多麼週到！

魯迅先生對待編輯出版工作之所以這樣全心全力、鞠躬盡瘁，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他把這個工作作爲爲人民的戰鬥的偉大事業，另外，青年們給他的鼓勵也是很大的。當年在北京及『語絲』的時候他對於『乳毛未乾的青年們』，自己跑印刷所、校對、疊報紙，還拿到大衆聚集處去兜售的精神大爲感動，使他覺得『這是青年們對於老人，學生對於先生的教訓……用一點心思，寫幾句文章，未免過於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64]

總之，魯迅先生在這方面遺留下來的光輝業績，是他革命的思想、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和他學習、實踐相結合的一個偉大結果。

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環境和魯迅先生當年迥然不同了。打倒了國民黨反動派，人民掌握了政權，我們有了自己的政府，有了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的文化、文藝政策，有了專門管理出版工作的機構，有了發展編輯出版事業的客觀條件。在物力人力方面，我們勝過魯迅先生千萬倍，但在工作成績的表現上，我們却落在他的後邊。有些私營書店，還脫不掉『商』的氣味，把金錢看得比文化事業更重，粗製濫造、責任心薄弱，把一些不健康的錯誤百出的東西隨手給它們披上一件『馬列主義』的外衣拿出去換錢，這種作風和當年魯迅先生與之鬥爭的那些出版商還有他的一脈相承之處。

公營的出版機構，雖然已經逐漸建立了嚴密分工專業化的制度，但，出版的書刊，無論在內容形式上，或對於稿件的處理上，都還擱不起檢查，遺留下許多錯誤和缺陷給事後的檢討。我們所以還不能把工作做好，是由於我們爲人民服務的心還不够强，沒有明確的意識到這份工作的革命意義如同魯迅先生那樣。一個出版家，必須先是一個革命家。

當然，徒有一顆爲革命工作的決心還是不够的。編輯出版工作是一項專門的業務，如果不能精通它，也就不能作好它。魯迅先生向『北新書局』寄來的書包學習包紮，這種學習精神是值得我們向他學習的。魯迅先生在這方面創造的成績，是與他深廣的學識、豐富的經驗、刻苦學習的精神分不開的。

作爲編輯出版家的魯迅先生是偉大的。我們抬起頭來向他仰望之餘，必須低下頭來以他的精神來鞭策自己，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嚴肅、認眞、負責的把編輯出版工作做好！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

---

[60]書簡　五九五頁
[61]同上　七四頁
[62]同上　一八一頁
[63]魯迅日記　十五册　四九頁
[64]三閑集　一六四頁

## 全國各地準備紀念
## 魯迅十五週年忌辰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魯迅先生誕生七十週年紀念日，十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紀念日。十月十九日那天，全國各地都將舉行紀念會。魯迅先生在北京的故居也準備開放，以備各界瞻仰。

爲了紀念這一偉大的文學家，使他的著作普遍流傳，人民文學出版社已開始陸續出版二十六種魯迅先生的重要著作的單行本。這些單行本都是重新校訂的，並儘量採用魯迅先生生前自己設計的封面裝幀。魯迅著作編刊社，已對魯迅先生的全部著作，首先是雜文部分進行註釋和校訂，現在已完成全部工作的五分之一。爲了準備重新編撰魯迅先生的年譜和傳記，該社已開始蒐集材料。

## 學習毛澤東思想

最近，各方正在熱烈地研讀毛主席的文獻，這裏發表的四篇文章，就是四位作者的學習心得，並且聯繫到實際的工作。爲了加強學習毛澤東思想，本刊將繼續發表這樣的文章。

——編者

# 從變革實踐中我對於『實踐論』的認識

陳其瑗

我對於毛主席的『實踐論』是初入學的學生，我不能說已經懂得透澈，完全能夠拿來實踐，不過就我過去五年在社會變革實踐中所認識到有些問題，拿出來給同志參考。這些問題我預備分開兩個時期來說明。

第一個時期，是讀『實踐論』以前我對於事物的認識。

第二個時期，是讀過『實踐論』以後我對於事物的認識。

現在，我先來談談讀『實踐論』以前我對於事物的認識。

在美國，我雖然曾經歷過一些階級鬥爭的社會生活實踐，但那些都是外國的局部的經驗；我雖然也曾參加過第一次國內革命社會變革的實踐，但我只是高高在上的參加，並沒有從基層社會人民羣衆那裏吸取社會變革的經驗教訓；我雖然也學過一些馬列主義理論，懂得辯證法的幾個規律，可是我以前沒有學習過毛澤東思想，所以消化不良，所得甚淺。因此，我不能很好地認識事物的發展規律，和懂得怎樣去認識事物。

一九四六年由美返港以後，曾接觸過一些實際問題，在工作上雖然作出一些成績，但是不够得很。那時的情形，眞可以說是用最大的努力，獲取最小的效果。在對人的歷史發展和客觀事物的眞實性，沒有很正確的反映，因此，發生了錯誤與偏差，走了許多彎路。現時我自己反省起來，這是不多不少的犯了狹隘經驗主義和自以爲是的主觀主義的毛病。這些毛病對我個人是一個很大的包袱，而且在進行工作上也是很大的阻力。

在香港達德學院工作的三年中，雖然做了一些事，但從整個工作過程來看，我只是一個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者。在學校裏，我不能很好地把全體董事教職員學生的力量充分地團結起來，把學校的業務推動得更進步更有效率。處理事情我事事陷於被動，很少能爭取主動的工作。我自己雖然沒有宗派思想，但有時我的行動，我的佈置每每爲學校中存在的宗派思想所支配。甚至聘請一個教職員接收一個學生，募集一些款項，都受到了宗派思想的影響。然而我又不能用正確的認識去說服他人，去批評那些各式各樣的錯誤意見。結果是：愈接近人，愈不能接近人。處理事情，更是『治絲而棼』。

譬如說：達德學院的經濟來源，除了學費收入外，主要是靠募捐，每年最少籌募一二萬元港幣才够應付。我經常感到學校財政困難學費欠交太多，籌款工作又不易展開。然而，我只會倚靠少數董事的力量來支持，而不知倚靠教職員學生羣衆的力量。同時，我對於全體學生分析不够，只是片面地去了解他們。那時有些個別欠費學生不是因爲籌不出錢，而是受了反動份子的煽惑，故意不繳學費，（有一個學期，在全體不到二百個學生中，欠交學費高至一萬四千餘元）。然而學校不細心分析學生的具體情況，隨便就定出『不交費不能上課』一般的處理辦法。有些朋友認爲這種措施，完全是純財政的觀點，批評我們

不知道倚靠學生羣衆力量來解決學校的財政(後來事實證明這些批評是正確的)。達德學院也曾經倚靠學生的羣衆力量來作政治鬥爭(在達德開辦後一個學期,我們曾經動員學生力量去打擊混進學校的十六個蔣匪帮特務份子),爲什麼我不會倚靠學生羣衆力量來解決學校的經費困難呢?這證明我只知適用舊教條舊經驗來處理與舊環境相同的事物。一旦遇見新的環境,則不會運用自己的思想去接近和認識新的眞理,這是經驗主義在作怪。其後,由於接受失敗的教訓和得到有些同志的幫助,才學會動員學生自覺、自動、自願的繳交學費,而且做成羣衆性地展開集體替學校募捐的運動,學校財政困難遂得逐漸解決。由此可見,低估了學生羣衆的力量,而不知積極地去動員學生發動廣大羣衆的經濟力量,這是主觀主義的錯誤看法。只看重舊的一知半解理論和過時的局部經驗都不足以應付新的事物和新的環境。這證明毛主席『實踐論』所指出的是對的。

綜合以上發生錯誤的原因:(一)是經驗主義的作祟,强調過去個人局部的經驗和不完全的理論教條,來指導我的認識,因而做成主觀認識不是客觀事物的反映,因而這種認識就不可能正確。這是唯心論的道路。(二)受了封建的生產活動的限制。由於我長期生活在中國舊社會當中而脫離了中國舊社會又有相當長久的時間,使得我自己對人物的歷史只限於片面的了解;同時,長時期生活在封建式的狹隘生產規模中,也限制了自己的眼界。

其次,再談談讀過『實踐論』以後我對事物的認識。

經過了認眞學習『實踐論』以後,我明白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有很大的區別;我完全了解如果只憑着感性認識,拿去處理事物,必然是到處碰壁。因此,我認識到:(一)要得到正確認識,必然要使得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外界事物的眞實性。(二)必須把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再拿到實踐中去考驗證明。(三)我認識到:人的認識(不論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物),不能離開實踐。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把理論更提高一步,故實踐必須提高到第一位。這是我讀了毛主席『實踐論』以後改變了對人對事物的看法的過程。雖然不能說已經勝利地完全掌握對人對事物的認識的發展規律性,但至少可減少不正確認識的成分,正所謂『吃一塹,長一智』。

因此,一年半以來,我在內務部工作當中有了『實踐論』作爲我認識的基礎。關於處理救災的問題,我首先把中央人民政府從各災區得來的具體情況,所推理訂出來的救災方針、政策、與辦法,拿到災區去考驗實踐,看看這些『理性認識』是否符合災區客觀的現象和要求。我把中央『不要餓死人』的救災方針,倚靠羣衆,動員羣衆,首長動手,幹部下鄉的幾個救災政策,和生產自救、社會互濟、以工代賑、節約防災這幾個救災辦法,去與各地救災情況對照,證明完全是正確的。我與我們的幹部掌握了這些已通過實踐判斷正確的方針政策與辦法,來進行視察工作和臨時處理災區的一些問題,幸而少犯錯誤。回到中央來作報告。也容易得到比較正確的災區情況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是我第一次實踐了毛主席的『實踐論』。

關於處理歸國難僑工作情形,我也同樣以『實踐論』爲認識的基礎。我已有二十五年沒有回過家鄉(廣東),故鄉的人物對於我已成陌生的人物,但我不能再蹈達德學院時的覆轍,我首先掌握住『不斷使用自己思想接近新的環境與新的眞理』。對每一人物不從表面現象去認識他,而從本質內容去認識他,不從過去歷史片面地去認識他,而從他的全部社會發展過程去認識他,不從他的外部聯系去認識他,而從他的內部聯系去認識他。加上我對某些事物未經調查研究不輕易發言,學習了毛主席所謂『知識問題是一科學問題,不能有半點「虛僞與驕傲」,而必須具有「誠實與謙遜」的態度』。每到一處地方,我首先謹愼地聽取各方面的報告,對各人的正確意見我都很虛心去接納。由於我的主觀認識與客觀事物的符合一致,我自己對人物的作風態度也因此而有所改進;一直都能與各級幹部、各人民團體團結合作順利地處理和解決一切問題。在某地短短十五天內,便能迅速成立了處理難僑的機構,接收了數以千計的難僑。一般來自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幹部,均能彼此合作,而且在處理問題上面,也能與我的意見取得一致。這證明我對於處理人物事件已有了進步。這一次我之所以能够完成任務,首先是由於在毛主席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對處理難僑的正確方針,各級幹部的同心協力,而作爲認識事物的基礎的『實踐論』,對於我也有不少的助力。

根據上面這些經驗,我得出一個結論,即是:有了『實踐論』作爲思想武器,我們行政工作人員在工作上就有了把握,沒有學好『實踐論』的時候,就好像在海船上迷失了方向。每一個政府高級幹部,必須加緊努力,認眞、細心地去學習、再學習毛主席所給予我們的這個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實踐論』,來做好我們的工作,由此而萬衆一心,團結合作,配合土地改革和鎭壓反革命的運動,進行國家生產建設,貫澈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來保衛世界持久和平。這才稱得上對人民負責任,對國家盡忠心的幹部。

# 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一些體會

嚴景耀

近幾年來，讀毛主席的著作，深感到毛主席對於中國社會的分析，總是針對着中國的具體現實。毛澤東思想之所以能够指導中國革命走到勝利的道路，就因爲他的指示正是符合全國人民的要求，同時因爲有了毛主席的領導，全國人民對於新中國的前途有了無限的希望與信心。

現在讀了毛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才更親切地體會到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造詣與革命的天才。他在二十五年前，已經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來深刻地分析中國社會，已經奠定了中國革命最基本的路線。我對於這篇文章的初步體會有以下幾點：

第一、革命的首要問題。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因爲只有團結眞正的朋友，才能集中力量攻擊眞正的敵人。毛主席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得到的結論就是：『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毛主席在二十五年以前已經明確地告訴我們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了。但是有些人在思想上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分清敵友。當抗美援朝剛開始的時候，有些人就暴露了崇美、親美、恐美的思想，對敵人就『恨不起來，』因此就不能全心全意地參加抗美援朝的愛國運動；全國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就有『和平分田』的想法；鎭壓反革命運動開展的時候，有人就說『恐怕發生波動』。他們表面上說出來的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好像是爲國家爲人民着想的，而實際上這種思想的根源，就在於自己立場不穩，敵友不分。二十五年前毛主席就說：『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眞正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眞正的敵人』。而中國革命所以能够取得了基本的勝利，團結朋友，加强統一戰線，是一個主要的經驗。現在我們正在很緊張地準備着來建設燦爛光輝的新中國，全國正在加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與鎭壓反革命三大運動，來爲我們的建設掃除障礙。全國人民更應當響應號召，在毛主席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共同努力，我們知識份子只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才能分清敵友，才能加强統一戰線，團結一致，爲建設偉大的祖國而勇猛前進。

第二、革命的領導問題。中國革命的總路綫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和反官僚資本的革命』現在讀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才知道毛主席在二十五年以前已經說明了這個革命的總路線，而且不斷地爲總路線鬥爭着。毛主席在中國革命一開始的時候，就指出中國革命是一定要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是不能領導的。而無產階級領導革命，一定要有最廣大和最忠實的農民爲同盟軍。但是，當時的資產階級是企圖奪取革命領導權的。他們是想『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共產黨』而獨立革命的。毛主席在那時已經說明資產階級倘若『以其本階級爲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一個幻想。』因爲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不但很軟弱，而且『必定很快分化』的。歷史證明了毛主席的科學預見，後來大資產階級『向右跑入反革命派』，而民族資產階級『向左跑入革命派』了。同時毛主席已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二面性，『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我們的陣線。』同時，對民族資產階級又團結又鬥爭，而鬥爭的目的是爲了團結的政策，奠定了基礎。

毛主席當時已肯定中國革命是要由無產階級領導的。他說『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却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毛主席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很明確地指出，革命是要依靠於社會裏那些正在發展着的，具有遠大前程的階級，即令這個階級在現在還不是佔較大比重的力量。

斯大林也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在『論中國革命底前途』中說：『中國民族大資產階級是軟弱的……這就便利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㈠這說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中國問題，所得的結論必然是一致的。

同時，毛主席在領導問題上又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這樣就解決了中國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這是中國革命領導與革命勝利的主要條件。在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看不見農民大衆的力量，而要把領導權斷送給國民黨。還有以張國燾爲代表的『左

』一傾機會主義，只注意工人運動，看不見農民。他們都使革命的發展受到很大的損失。歷史證明：只有毛主席的分析是最全面最正確的。而毛主席的分析，又與斯大林的分析是一致的。斯大林說因爲中國民族大資產階級是軟弱的，這就『便利於無產階級政黨對中國農民的領導。』㊁同時指出『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快愈澈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就愈有力和愈強大。』㊂

第三、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早就說明『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後鬥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着，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着，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於其旗幟之下。』毛主席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尤其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從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一個基本觀點出發，來分析中國社會。指出中國革命的道路，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十年以前，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論及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闡明得更爲詳盡。兩年以前，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主席更昭示全國人民要『一邊倒』，指出『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㊃毛主席在二十五年以前就把這條正確的道路指引給我們，而且一直在提醒着我們。但是，我們一部分知識份子，一直在幻想着第三條道路，僞裝着中間路線，總想騎在牆上，投機取巧。直到解放戰爭勝利以後，毛主席提出『一邊倒』的時候，還有許多人要問『爲什麼一定要一邊倒』？當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以後，蘇聯幫助我們創辦石油公司與有色金屬公司，就有人担心這是利權外溢。抗美援朝開始的時候，有人就問『蘇聯爲什麼不出兵？』當蘇聯宣佈出席美帝對日非法媾和的舊金山會議，預備在會內作鬥爭，與我們會外鬥爭來配合的時候，還有人懷疑『蘇聯出席是否出賣我們？』這種種問題說明些什麼呢？它說明了直到現在，還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一邊倒』是正確的道路，還是自覺與不自覺地幻想着中間路線，還沒有看明白『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與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的教訓。㊄換一句話說，還是不能深信毛主席二十五年來一貫的號召，還是不肯全心全意地倒向革命。這也說明我們知識分子受反動思想影響之深，而不能很快地解放出來。只有努力學習毛主席的指示，來改造自己的落後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路上去。同時，新中國的進步，眞是突飛猛進，絕塵而奔，若不急起直追，一定會被時代所抛棄、所淘汰。

第四、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偉大。『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雖在二十五年以前寫的，但是現在讀了覺得非常親切，所分析的問題，都是切中要害。它經過了歷史上四次革命戰爭的考驗，而愈加光芒萬丈。我們讀了毛主席的文章，不得不深深感覺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所得到的結論，才能經得起時代的考驗。毛主席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㊅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範作品。

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向東方各民族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務。他說：『如果俄國布爾什維克已把舊的帝國主義打破了一個缺口，自己担負起了一個非常困難而又非常高貴的創造新的革命道路的任務，那末你們，東方勞動羣衆代表們面前就擺着一個更偉大的和更新的任務。』㊆而『這個任務從前在全世界共產黨員面前是沒有提出過的，這個任務就是：依靠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你們在應用於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獨特條件時，須要善於把這個理論和實踐應用於這樣的條件，即農民是主要羣衆、所要解決的鬥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主義而是反對中世紀的殘餘。』㊇

同時，這個任務『就在於把較爲先進的國家底共產黨員所享用的眞正共產主義學說譯成每民族語言，就在於實現那些應當立刻實現的實際任務，並且在總的鬥爭中與其他各國無產者打成一片。這就是你們在任何一冊共產主義書本中都找不到解決然而在俄國已經開始的總的鬥爭中可以找到解決的一些任務』。㊈

這個任務在中國已由毛主席領導着，光榮地担負了起來，並且走到了勝利。毛主席指示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是一個非常光輝的示範。

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革命走到勝利。中國人民走向勝利的道路，就是毛澤東的道路。但是毛澤東的道路，不是局限於中國的。劉少奇同志指出：『這條道路也可能成爲情形相類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解放的基本道路。』㈩㈡現在在朝鮮的普遍口號就是『毛澤東是亞洲革命的導師，朝鮮勝利的鼓動者。』在越南『毛澤東是亞洲救星，是越南的勝利指導者。』同時『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口號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個口號已爲亞澳各民族共同担負起來的任務。這種種事實說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東方的發展』。㈩㈠

讓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學習毛主席的文章，學習毛澤東思想，拿它來武裝我們的頭腦，把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進行到底，來打倒美帝國主義，爭取中國與東方革命的澈底勝利。

㈠ 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底前途，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北京解放社一九五〇年出版，一四四頁。

㈡ 同上。

㈢ 同上一四六頁。

㈣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解放社一九四九年七月出版，八頁。

㈤ 同上。

㈥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一九四八年出版，九二七頁。

㈦ 列寧，論東方各民族底覺醒，『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六五頁。

㈧ 同上，六八頁。

㈨ 同上，六九頁。

㈩ 毛澤東，『論新階段』八八頁。

㈩㈠ 劉少奇，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開幕詞，『新華月報』，一卷二期，北京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四四一頁。

㈩㈡ 陳伯達，『論毛澤東思想』。

#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讀後記

朱劍農

一九二七年初，全國各地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影響之下，蓬勃地展開了波浪壯闊的農村大革命。但是當時以陳獨秀爲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但沒有正視這種農民羣衆偉大的革命力量，反而是被反動的逆流所嚇倒；不但不善於『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反而『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脚地批評他們』。像這樣脫離現實革命運動發展情況，看不出革命發展實際力量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後來終於從革命隊伍裏淘汰出去，乃是勢所必至理所當然的了。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特點。『祇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這是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所指示我們的。其實，毛澤東同志自己就是這樣一貫地認識事物的本質的。

毛澤東同志於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間，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農民運動的考察工作，並寫了一篇報告。這個報告正如胡喬木同志所說，它已『成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農民鬥爭的經典文件。』（『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現在我們讀了這個報告，很顯然地可以領悟到毛澤東同志早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明確地認清了中國革命中下面這樣幾個問題必須了解甚至是必須迅速確定態度的基本問題。祇有對這幾個問題有了正確的了解和正確的態度，才可以取得以後革命的勝利，否則，不是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就將招致革命的失敗。

第一個問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沒有一個大的農村變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爲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來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脚。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眞正目標。』『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

命立場上去了。』以陳獨秀爲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因爲不擁護這個變動，所以就站在反革命立場上去了。列寧說：『誰要是以爲無產階級政黨…不與農民成立一定的關係，不在事實上援助農民運動，就能够在這些落後的國度裏面實行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策，那就是空想。』斯大林也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這裏是明白肯定了中國革命必須要有農村的大變革。正因爲是這樣，才能够正確地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今天這樣偉大的勝利。

第二個問題是對於農民革命的領導問題。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上所沒有的，但由於當時得不到先進階級與先進政黨的領導，這樣就使過去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一般都是有了先進階級和先進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例如當時『鄉村中……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　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以及所謂『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這固然都是很好的例證。但當時被反動逆流所嚇倒的以陳獨秀爲首的機會主義者，却不主張黨對於這樣偉大的農民革命給予正確的領導，反而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脚地批評他們』。祇有親身接觸了實際鬥爭的毛澤東同志，才正確地號召和領導黨內眞正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戰士，堅決地『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這樣才正確地領導了以後在各個革命時期廣大農民羣衆的革命鬥爭，從而現階段的革命，也就『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而且中國無產階級對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也只有這樣取得了對於農民的領導權，這領導才不會落空。

第三個問題是站在革命的立場，害不害怕農民『過分』的問題。『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　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　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鎭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這樣與羣衆的感情結合在一起，信任羣衆的力量，信任羣衆的正確，就是一個善於估計羣衆四週圍的各種條件，不落在羣衆的鬥爭之後，而又善於總結羣衆革命鬥爭的實際經驗，並領導羣衆走向前進的革命領袖，無疑地他是必然能够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事實上，毛澤東同志自從那時起，就是一貫地堅持着這種態度，所以能够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贏得了今天這樣的輝煌勝利。現在還有不少的地區正在進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在現階段的土地改革工作中，我們依然需要領悟毛澤東同志在這個『考察報告』中所取的態度。這樣的態度，聯系到今天土改工作的具體情況來說，就是要堅決地反對『和平分田』，放手發動農民羣衆，爲澈底打垮一向騎在農民頭上的封建地主而鬥爭！

第四個問題是農村的變革應該依靠誰、團結誰的問題。『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游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這個貧農大羣衆，合共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爲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這裏很顯然是表明毛澤東同志根據當時農村革命的具體實踐，就已確立了農村裏的變革，必須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的總路線。這在我們現階段的土改工作中，認爲『應該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的總路線，是有其一脈相傳的歷史淵源的！

第五個問題是農民革命勝利時就有及時建立農村『革命政權』的必要，這

樣的政權是可以眞正爲農民辦事的。『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眞正辦到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眞正「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停止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這是很現實地反映了在農村一旦推翻了地主的政權，立即就有建立革命政權的必要。『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這裏親自看到革命勝利了的人民立刻建立革命政權的這種革命羣衆的偉大創造力，所以當他領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中，都能够正確地吸取這時的經驗，毫不遲疑地隨着革命戰爭的勝利，立即就地建立革命政權。到了人民解放戰爭已經贏得全國範圍的勝利，乃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勝利地宣佈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反革命派往往譏笑『農民無知』，其實革命勝利後所建立的農村人民政權，倒是眞正能爲人民做好各種各樣的工作。在毛澤東同志的『考察報告』中，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農村人民的新政權，一經建立之後，很快地就可以爲農民辦好許多事情。無怪乎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僅僅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就有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偉大成就。這就益發可以表明人民的政權，是爲人民辦事，並且能够爲人民辦事的眞理了。

毛澤東同志的這篇考察報告，不但是總結了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農民運動的鬥爭經驗，實質上也就總結了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整個革命鬥爭中的經驗。在這個總結中，一方面指出了當時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害怕農民行動過左的錯誤，一方面又給以後各個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規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這樣的政治路線，才引導全國人民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面勝利！

# 讀「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梁純夫

## 一

我讀了毛主席這篇論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陝北瓦窰堡黨的活動份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首先第一個豐富的收獲是，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前途滿懷着前所未有的信心，特別對於我們當前的抗美援朝運動的最後勝利，對於我們能够打敗美帝國主義者的任何新侵略陰謀和侵略計劃，有了確切不移的信心。這決不是一句隨隨便便的恭維話或客套話。這個報告發表的日期，是首先值得注意的事情。那時候，中央紅軍勝利完成它的艱苦而偉大的二萬五千華里的長征才兩個月，距離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也不到一年。而遵義會議，是開始『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一次劃時期的會議。毫無疑問地，毛主席這篇報告是遵義會議以後關於中國革命前途和政治策略的第一次有系統的最完整的分析（參考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的前言）。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有了這位傑出的偉大的領袖，中國的革命行動便立刻獲得一個正確的指南針。到現在不過十五、六年，中國的人民革命事業已經得到了驚動全世界的輝煌勝利，毛主席在這篇報告中所提出的『人民共和國』已經鞏固地建立了起來，並在國際上取得了崇高的地位。在另外一方面，這篇報告發表的時候，距離『一二九』不過十多天，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我東北爲根據地，向我華北深入了一步，準備全面滅亡中國的時候。毛主席這篇報告的中心思想是號召『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並以共產黨和紅軍充當這統一戰線的發起人和領導者。正如毛主席後來所指出的，這十多年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順利前進以至今日的輝煌勝利，就是靠了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和統一戰線這三件法寶。今天的形勢跟十五六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帝國主義已經被澈底打敗了，代之而起的是更可惡、更狂妄的美帝國主義，它沿着日本帝國主義的舊路，並想利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餘力量和已經破產了的侵略經驗，來破壞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偉大成就。但是在我們這方面，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已經比以前壯大了許多倍，人民統一戰線的基礎也比以前更加廣泛了。有了這三件法寶，有了毛主席的領導，今天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正如以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樣，是一定可以被打敗的。

## 二

毛主席的這篇報告，在當時來說，不單爲中國人民的革命行動指出一個正確的方向，也糾正了革命陣營內一些錯誤的認識和澄清了一般混亂的思想。我們今天讀了它，又不單加强了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前途和對於最後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的信心，並且在思想方法上，對於我們也是一種很好的訓練。顯然地，一個有這樣重大影響的，爲中國革命的勝利前途指出正確方向的報告，不是具有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方法的修養的人是決計作不出來的。據我個人的粗略體會，這個報告中值得我們學習和鍛鍊的思想方法有下列數點：

第一，善於分析當前的階級關係和敵我陣營的變化——毛主席在這篇報告中所以向中國人民提出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共和國』的號召，是由於他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佔領全中國』的形勢下，分析了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的思想情況和可能的變化。經過一連串細密的分析，他才肯定在要建立的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共和國中，除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之外，民族資產階級也可以包括進去，以壯大抗戰和革命的隊伍而孤立以蔣介石爲首的賣國賊營壘（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此外，他又在『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爲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的情形下，適當地估計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的發展。對於以蘇聯爲首的國際革命勢力的可能援助，也作了肯定的判斷，並認爲『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條件』。

第二，對革命形勢作全面的有遠見的估計——這一精神貫串着這篇報告中對每一個重要問題的分析，例如當時有些人（如張國燾）認爲長征表示中央紅軍的失敗，因而對革命喪失了信心。毛主席在這裏着重指出：『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他認爲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確看法應該是：『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佔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而更加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完成長征比保持原有陣地意義重大得多，影響深廣得多，因而總結說：『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就在這樣一種認識的基礎上，他建立了對革命的信心，指出了革命的前途，並向中國人民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和人民共和國的任務。此外，對於當時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對比，毛主席在這篇報告裏也作了全面的，實事求是的估計，不是徒然的悲觀，也沒有盲目的樂觀。他承認『中國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較過去更加增長了。這是正確的估計，這是一方面的估計，但是同時我們應當說，目前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是大於革命的力量，這也是正確的估計，是又一方面的估計。』根據這一全面性的，實事求是的估計，他指出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某些人的性急病，並認定『要最後地澈底地解決內外反革命勢力，我們還得準備再花一個應有的時間……還得提出一個很好的革命策略……』所有這些實事求是的、全面性的、有遠見的估計，以及毛主席在這篇報告中所提出的正確的革命策略，在今天看來，無疑地是構成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在過去十五六年中順利進展和取得今天的輝煌勝利的有決定性的要素，也是我們能够最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重要因素。

第三，從鬥爭和發展上看問題——這也是貫串全文的一種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這篇報告中有兩句話給我的印象最深，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爲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爲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經過長期準備，已開始向中國本部推進，決心一舉滅亡全中國的時候，當『中國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是大於革命力量』的時候，革命的領導者如果沒有大無畏的鬥爭精神，不從發展上看出正在成長的新生的革命力量，就很容易在敵人的銳猛進攻面前倒退、消極、以至投降。毛主席却響亮地向中國人民提出：『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爲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當敵人要我們屈服的時候，他却認爲這是組織廣泛和強大的鬥爭來使敵人最後失敗的好時機。中國人民的很大幸運是，正當中國的民族危機和革命危機發展到一個頂點的關頭，我們及時地得到毛主席這位傑出的偉大的完全可以信賴的革命領袖的英明領導，使整個局勢完全扭轉過來，並最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取得全國規模的光輝的革命勝利。中國人民的更大幸運是，當美帝今天又沿着日本帝國主義的老路，並且加倍狂妄地企圖來破壞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偉大成就的時候，我們仍然有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有更強大的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和更加廣泛的統一戰線。這就使得我們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前途，對於我們能够澈底打敗美帝國主義的新侵略陰謀和侵略計劃有着確切不移的絕對信心。

# 蘇聯地理學界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陳原

任何科學的發展和進步，都有賴於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這篇文章裏，作者詳盡地介紹了蘇聯地理學界正在進行中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於我國的學術界來說，是富有現實意義的。

——編者

## 一

一九五〇年在蘇聯地理學史上是一個轉折點。這句話是全蘇地理學會會報的副主編卡列斯尼克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說的，實際情況確是如此。

去年這一年，是蘇聯種植防旱森林帶的偉大計劃的第二年（計劃是一九四八年十月發佈的），需要解決許多實際問題；這一年蘇聯的黨和政府又發佈了一連串的決定，大力從事走向共產主義的建設，以便在短期內改造廣大地區的自然環境。這樣巨大的實踐活動，需要地理學者的積極參與那是不言可喻的；但事實表明，地理學界的工作遠趕不上現實的需要，換句話說，地理學界的工作在一定意義上脫離實際，因此應當予以澈底的改進。

早在去年三月三十一日，黨中央的『文化與生活』報第九期（總一三七號）上就對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領導思想及實際工作提出了嚴厲批評，論文的題目就叫做『脫離現實』，執筆者是薩西里業夫。六月二十日，斯大林發表了『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給蘇聯科學界指出了研究問題的正確道路，同樣也給蘇聯地理學者指點了正確的方向。正如塞米夫斯基教授在一次會議裏所說的，斯大林的論文給經濟地理學者的啓示很大，它指出每一個蘇維埃學者，祇要深刻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實質，能够創造性地加以利用，那就能够負担他所要負担的重大任務的。到年底，『哲學問題』第二期上發表了斯米爾諾夫的長文『論地理科學的基礎』，把蘇維埃地理學界所存在的學閥統治、資產階級理論影響、錯誤傾向都坦率地提出來，並且列舉了具體的改進意見。

從去年年底開始，蘇聯地理學界就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進行了嚴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檢討了過去工作的缺點與錯誤，闡明了若干一直模糊的論點，到現在爲止，討論還沒有結束。毫無疑問，這樣大規模的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蘇維埃學術界改進工作的武器，經過這樣一次檢討，蘇維埃地理學將向前大大跨進一步。正如斯大林所說：『誰都承認，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

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爲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召開了一次學術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二十四人，由副所長丹尼洛夫主持，所長格里哥黎耶夫也出席作了檢討，他的檢討後來又寫成論文，發表在今年第一期的『哲學問題』上。全蘇地理學會在研究斯大林論文時，也結合地理學界的情況及上舉批評論文，進行過多次的討論。該會經濟地理學部在去年十月至十二月舉行過幾次會議，前後發言的有十九個專家，由塞米夫斯基主持，著名的經濟地理學者康斯坦丁諸夫作總結發言；該會自然地理學部今年一月至二月也舉行過兩次會議，到會的有三百人以上，第一次由斯米索夫主席，第二次由希威哲教授主席，卡列斯尼克作主要發言和總結。

許多專家也參與了文字的討論。莫斯科大學地理學系的馬爾可夫發表了『論格里哥黎耶夫院士的錯誤』，（見全蘇地理學會會報一九五〇年第五期）之後，斯米爾諾夫又發表了對這篇批評的批評，題爲『論地理理論問題中的錯誤觀點』，全蘇地理學會的討論會上對斯米爾諾夫的論文也提出了許多反駁的意見。『哲學問題』今年第三期又發表了庫茲涅佐夫的『關于自然地理的對象和方法』，以及顧蒂爾的『地理學上的幾個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討論到現在還沒有完結。

因此，本文企圖把蘇聯地理學界這一次進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論點，簡單地加以報導。

## 二

首先，參加討論的地理學者，一致肯定了蘇聯地理學過去幾十年已有一定的成績，對于祖國的建設事業起了一定的作用。『文化與生活』報去年三月那篇批評論文劈頭也完全不懷疑地肯定了這一點。例如，大家都知道，蘇聯地理學者在研究北極地區問題方面，有着偉大的功績，因而征服了北冰洋，開闢了經常的北洋航路；在研究祖國資源的分佈與生產力分佈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成績，從而使若干處生產力的配置更加合理；經過了三十多年的研究探險，蘇聯地理學者繼承了俄國地理學者的光榮傳統，淸除了祖國地圖上的許多空白；蘇聯地理出版界也有着一定的成就，課本及參考書的編印，自從一九三四年黨與政府關于改革地理課程內容的決議公佈以後，更有過很大的改進，（去年維特威爾教授的一本九年班用『外國經濟地理』課本，就得到斯大林獎金。）地圖的編製也到達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大蘇維埃地圖』至今仍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地圖集；最近『大蘇維埃百科全書』，所插的地圖，也是一件很大的收穫）。而在蘇聯改造自然的偉大事業上，地理學者也積極地參與了，並且有了若干成績；這個任務的重大，是從前地理學者所想像不到的，因此也有許多缺點。

正因如此，『文化與生活』報去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表的論文，纔指出蘇聯地理學界存在着的缺點和錯誤傾向，以便把它去掉，使蘇聯地理學者能更好地負起這個任務來，對祖國有更大的貢獻。

## 三

『文化與生活』報着重地指出，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嚴重的錯誤傾向，包括下面所說的幾點：

第一，地理研究所的重要任務之一——出版蘇聯地理和外國地理的研究著作——完全沒有達成。一九四六年研究所宣佈說要出版一部八卷本的『蘇聯地理』，據說已在編著中，但後來一本也弄不出來；又說一卷本的『蘇聯地理』已經接近完成階段了，可是連這本書也印不出來。按照計劃，研究所還打算出版十一種關于蘇聯各區域的氣候和自然環境的著作集，但結果祇印出了關于摩爾達維亞共和國的文集（一九四七年），而其中還包含着許多錯誤。例如文集里面有一篇講歷史地理的，是A·奧獨德作的，這里面就完全忽略了摩爾達維亞人民的階級與階級鬥爭。

其此，地理研究所于一九四六年決定出版一些關于蘇聯的通俗科學書。這些著作大多數是描寫和記敘自然界的外表，完全沒有聯系到蘇維埃人改造自然的活動，沒有從經濟意義的觀點來評價各地的自然條件。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本『蘇俄西北部』，就是其中的一例。這本書的作者們集中在寫地形、植物和動物，完全忽略了與人口及經濟方面有關聯的地理現象。讀者讀完了這本書，可以完全不知道這是蘇維埃時代的著作。作者僅僅提到莫斯科運河及由此而形成的大蓄水池，至于這條運河和這個蓄水池對于當地有什麼影響，對于經濟、動植物、氣候發生什麼作用，就完全不加申論。研究所另外一本出版物，卡列斯尼克著的『北高加索和頓河下游』一書，也是脫離實際的，作者在分析這個地區的地理時，也完全忽略了蘇維埃時代人們所作的巨大努力，並因而引起的偉大變革。由此可知，自然地理的作者還是抽象地看待自然界，沒有注意到社會主義社會、蘇維埃人的活動給它的有計劃的影響和作用。這種觀點是完全不對的。

最後，『文化與生活』報的批評指出，地理研究所的工作之所以不能展開，之所以發生這樣嚴重的錯誤，其首要的原因，是在於研究所領導人格里哥黎耶夫院士近年來持有錯誤的地理觀。

格里哥黎耶夫院士在地理科學上是有過很大的貢獻的；不過他近年來發展了一種學說，按照他的意見，自然地理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研究『自然地理過程』（Физ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他的理論有一大套，簡單地說，這個所謂『自然地理過程』，造成了自然界物體之間的一切交互作用，決定它們的內在發展底性質，並形成自然地理環境以及地表一切外在形態的特殊性。按照他的意見，所謂『自然地理過程』是由種種不同的因子組成的，即由氣候因子、地形因子、土壤因子、植物地理因子、動物地理因子及其他因子組成的。這許多因子發展的推動力是什麼呢？據說，主要就是『互相矛盾的作用之結合』。說得簡單一些，按照格里哥黎耶夫的意見，歸根結蒂，各種因子（組成部分）交互作用過程，是地理學所要研究的主要對象，地理學所要研究的，倒不是整個地理環境發展的規律性。（參看斯米爾諾夫的論文）『文化與生活』報指出，在陸地上主要起決定作用的因子，不可避免的是氣候因子。按照格里哥黎耶夫的觀點，這氣候因子可決定于熱度與溫度的增減。蘇維埃地理學者在這裏陷入了資產階級地理學的泥沼，簡直完全忘記了蘇維埃人怎樣在廣大地區上改變了氣候和其他『因子』。正如Ф·沙爾蒂可夫在『青年布爾什維克』一

九五〇年第二期上所說，蘇聯的黨和政府于一九四八年公佈並開始實行的偉大防護森林帶計劃，將使整個巨大的草原起了深刻的變化，『峽谷消滅了，旱災沒有了，氣候溫和了，潮潤了，人類在草原上的生活變得無可比擬的方便、容易、美麗和豐富了。』（引見陳原編譯：『人類改造自然』，三聯版，十九頁）。但是格里多黎耶夫院士却沒有理會這一點。

地理研究所出版的研究集刊『自然地理問題』，就經常充滿了持有這樣錯誤觀點的論文。華西里耶夫寫道：『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或者在地理科學方面，有許多很重要的事件，這些事件在地理研究所的機關刊物上都沒有任何的反映。也沒有應用聯共（布）的決議，這些決議對于地理工作提供了極豐富的資料。在地理科學歷史上那樣明顯的事件，例如米邱林科學的勝利，改造自然計劃等等，在『自然地理問題』集刊裏面一點也沒有出現。在集刊裏面也完全沒有反映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底教訓。』這裏順便還可以帶一筆，正如斯米爾諾夫在他第二篇批評文章裏面所指出的，全蘇地理學會『會報』也很少刊載有關地理原則性問題的論文，更很少批判資產階級地理學的『理論』，因而降低了會報所應起的作用。在一九五〇年間，『會報』雖則刊載了不少有價值的地理專著，但是在理論方面，僅只刊載了兩篇論文，一篇是卡列斯尼克的『斯大林的著作對地理學的意義』，另一篇是馬爾可夫的『格里哥黎耶夫院士的錯誤』。

除此以外，『文化與生活』報還指出對現實地理問題很少展開討論。所有工作者都一律拜倒在格里哥黎耶夫院士的『權威』脚下，凡是反對他的『學說』的人，都受到攻擊。這情形恰如後來斯大林那篇名著裏面所說的，『有一種不適合於科學和科學工作者的品質的制度統治着』。

『文化與生活』報那篇論文的結論是這樣的：

『蘇聯科學院地質地理科學部以及地理研究所的黨組織，在地理研究所的實際工作中，犯了很嚴重的錯誤，有着很大的缺點。

『在蘇維埃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學界面前，擺着巨大的愛國主義的任務——那就是給我們的運動向前推動以有效的助力。地理研究所的工作者可以靠下面的工作達成這個目標，即：對蘇聯各區加以綜合的研究，解決與當前經濟任務有關的問題，編寫眞正馬克思主義的有關祖國和外國的地理著作，積極協助改進地理教育的情況，進一步擬定蘇維埃地理學的方法論基礎，揭破資產階級方法論（的錯誤），嚴厲批評對我們的（地理）科學有害的學院派「理論」，並且廣泛展開創造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這篇論文發表以後，『文學報』和別的報刊曾繼續嚴厲地批評資產階級的庸俗地理決定論侵入了蘇維埃地理科學，但是一直到斯大林的論文發表以前，還沒有引起地理學界的足够的注意。

## 四

斯大林關于語言學的著作一發表，蘇聯地理學界立即進行了思想檢查，作爲初步揭露蘇維埃地理學現狀的概括性論文，就是斯米爾諾夫的『論地理科學的基礎』。

這篇論文儘管有許多缺點，也有若干偏向，（這是在後來地理學界的幾次討論會指出過的），但它仍然是近年來第一篇毫無掩飾地並且全面地、概括地揭露了蘇維埃地理學界的一些嚴重的錯誤傾向，並提出了初步的改進辦法的文章，這是後來地理學者們所一致認爲大體上符合事實的，換句話說，這篇論文的主要論點在基本上是爲各方面地理學者所一致贊同的。

『哲學問題』編輯部在發表斯米爾諾夫這篇論文時，加了個按語說：編輯部發表這篇論文，其目的是在展開文中所提到的地理理論問題的討論，並希望專家參與。

斯米爾諾夫——如上文指出過的——首先肯定了蘇維埃地理科學上的成就，但接着指出儘管有這些成就，蘇維埃地理科學已遠落在現實需要後面了，其原因是指導實踐的理論還保留着資產階級地理學思想的殘餘，這些『虛僞的科學理論』既然統治着蘇維埃地理學界，因此就不能使這門科學長足進展，適應新的需要。資產階級地理學的根本錯誤，就在於不問政治的傾向，即是說，他們認爲地理學所研究的是地表——自然界，而這個自然界又完全與社會實踐無關的，這樣客觀主義地去研究地球，不可避免地要走到宿命論。資產階級地理學的方法論，就是認定地理現象的無規律性、偶然性，由此產生了資產階級地理學的景觀論——這是現代資產階級各派地理學說的僞科學基礎。

斯米爾諾夫指出，資產階級地理學的景觀，就其外表來說，就是地表上的種種因子（地殼構造因子、大氣因子、水文因子、生物學因子等）交互作用的結合體，這些結合決定了一個地方的地理特點，凡是因子結合相同的，都自成爲一個性質相同的地區，這就叫做景觀。就其本質來說，這些因子的結合和任何地理環境的一般發展規律不相聯繫，這就是說，用一個地方的因果關係來

代替整個的發展規律。

比較完備的景觀理論是赫特納在其『地理學的歷史、本質和方法』一書裏面發展的。赫特納否認普通地理學，他認爲研究地表發展的總的規律性是地球物理學的事情。赫特納認爲地理現象的地方結合體是和發展無關，和時間無關，祇是依據其空間的共同性去加以研究，所謂空間共同性就是空間的再現、相類和結合。

赫特納於是去尋求哲學的支柱。他找到了康德（Kant）和溫德（Wundt）他這時把科學分成三類，即系統科學（物質的）、紀年科學（歷史的）和空間科學（分佈的），而地理學則屬於空間科學，其目的就是僅僅研究物質的空間分佈，既不管時間，也不論發展。

斯米爾諾夫認爲赫特納的『學說』對蘇維埃地理學者有很大的影響。按照斯米爾諾夫的見解，蘇聯地理學有三個主要派別，即（一）列寧格勒學派，以貝爾格院士（全蘇地理學會會長）爲首腦；（二）莫斯科大學地理系，以宋且夫、索洛維約夫、馬爾可夫等人爲首腦；（三）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派，以格里哥黎耶夫院士爲首腦。這三派當中，前兩派是頗接近的；前兩派與後一派之間經常展開論戰，但是總得不出結論，其原因是三派都以僞科學理論做基礎的。

貝爾格院士口頭上反對赫特納的景觀說，但他骨子裏却受赫特納的影響最大。他雖然很正確地指出：任何地理研究都不能忽視地理區域（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зона），並且贊成偉大的俄國地理學者杜庫查耶夫的地理區域說及其規律性，然而他仍不出赫特納的因素結合論，把因素結合的內容滲了進去，並創造出一種似是而非的『景觀和諧論』。可是貝爾格的實際研究工作，却被地理區域的客觀發展規律所推動，使他得出了眞正的結果，而與他的『理論』相矛盾。

莫斯科大學地理系學派受貝爾格院士的影響很大，不過這一派把景觀看做各種因子的矛盾統一體。他們又不敢否認一般規律性，所以在專題研究上，他們打破了自己的立場，取得了若干實際成績。

最後的一派就是格里哥黎耶夫的自然地理過程說。關於這個學說上文已簡略地提到過；他認爲『地理過程』構成地理環境，而且主宰其發展的方向。實際上他也脫不了因子交互作用的說法。格里哥黎耶夫在地理研究所討論全聯盟列寧農業科學院八月會議總結時說的一段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這種觀點。他說：

『唯物主義的自然地理學，要研究種種大小不同的地段，這些地段是按照其發展的特殊性底原則及其固有的地理規律性（總的和分的）來劃分的。在上述地段內，也包含了景觀在內，或者換句話說，也包含了自然地理區在內，這些是最小的單位，……在研究上述地區的時候，特別重要的是規定地理環境構成部分的相互作用過程所具有的規律性。我所規定的關於自然地理對象，就是由此而來的，我認爲自然地理研究的對象就是地理環境，換句話說，就是地球的地理外表，從它的構成部分（地殼、大氣、水、土壤、植物、動物）在辯證的發展中相互作用加以研究。換一種說法，自然地理研究的對象就是當作各種構成因素的辯證統一體底地理環境（地球的地理外表）。』

讀者不必看別的文章，光從這一段引文裏，已經隱約看見格里哥黎耶夫院士仍舊脫不出因子相互作用說的泥沼了。

斯米爾諾夫批評這三派的共同缺點和錯誤時，指出他們都是唯心論的，其分別只是有的把因子之結合看作地方性的，有的把因子之結合看做全體性的。斯米爾諾夫舉出了一些實例來批評景觀說與過程說之不妥當，同時又提出了自己的『集團』（結合體）（Блок）的說法來。

在這篇長文的末尾，作者提出了七點具有建設性的改進辦法，很值得我們注意。作者認爲：

一、必須拋棄因子交互作用論這種假科學『理論』，這種『理論』會使地理研究變成毫無結果，變成沒有規律可尋的工作。必須拋棄景觀論和自然地理過程論，因爲這是反科學的，其結果將否認地理環境發展的規律性。必須拋棄地理區的同類同型性，因爲這是取消發展規律性的。

二、必須拋棄傳統的地區的地理特性這種假科學『理論』，這種『理論』只是把事實和因素加以紀錄和系統化，並說明其外表的相互關聯。眞正的地理研究是從總的國民經濟的觀點去研究地方的地理內在的特徵和內在的關聯，以便和國民經濟任務相配合。

三、必須拋棄傳統的觀點，認爲地理學總論與分論（一般性研究與地方性研究）是對立的。任何分區研究都與總的研究不可分的；反之也是這樣。

四、科學的地理學必須辯證地去研究地理環境發展的過程及其質的構造，同時也不能忽略其量的表現。

五、應當避免脫離發展來看具體問題。應當研究其發展的歷史、現狀及其前途。

六、必須反對關於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相互關係的傳統觀念。如果採取客觀主義的立場來研究地理，那麼在自然地理方面不可避免地會走向景觀論或自然地理過程說；在經濟地理方面不可避免地會走向區域（景觀）研究，其出發點就是經濟因子與自然因子的地方性結合。莫斯科大學地理系的沙烏希金、巴朗斯基等人既持有這種經濟地理觀點，因而他們都成了自然地理的景觀路線的擁護者。但是經濟地理學却是從經濟上創始某些改造或更合理利用地理環境的措施，而這又是以準確的地理知識出發的。經濟地理是一種社會科學，社會經濟的科學，以我們社會的發展規律——包括社會主義生產（全部或各部門）分佈的規律性爲研究的起點。經濟地理學同時也不能離開自然地理學。這兩者的統一，纔能够更好地解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許多具體問題。

七、必須抛棄地理科學中若干特殊部門的傳統觀念，因爲客觀主義也侵入了這些部門。例如製圖學，到今天爲止，還受一種空間科學（分佈學）的觀點所支配，把地圖的內容變爲所繪現象的分佈共同性與地方性的表現。必須使製圖學走上這樣的道路，即繪製能顯示現象的統一、內在的相互約束以及動力性和矛盾。必須提高地理科學的思想性，清算爲帝國主義服務的資產階級地理思想，以便更好地爲新社會服務。

科米爾諾夫的七點建議，大體上就是如此。

## 五

在幾次學術討論會上，對於上舉的幾次批評，結合了學習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天才論著，蘇聯地理學者一致承認了過去的若干錯誤，（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理研究所所長格里哥黎耶夫院士進行深刻的自我批評），並提出了好些有關地理科學問題的不同意見，以便將來進一步取得一致的結論。

蘇聯地理學家一致承認，地理學已落在現實需要的後面。不但地理科學的理論研究工作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高度要求；就是實際的探測工作，也沒有與實踐好好結合。蘇維埃地理學界認爲『文化與生活』上華西里葉夫的批評是完全對的。如上文所說，格里哥黎耶夫院士作了很詳盡的自我批評；卡列斯尼克關於他所作的『北高加索和頓河下游』一書的錯誤傾向，也反覆進行了檢討，他說在描寫景觀而忘記了人類對景觀所起的作用，那是莫大的錯誤。他也指出在自然地理著作中常犯這樣的錯誤。

爲什麼會發生這樣脫離實際的錯誤呢？根本的原因是在地理學界中沒有好好地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好好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認識不够，以致不能把握眞理。其次就是沒有澈底地認眞肅清資產階級地理學的影響，因此全蘇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學部在討論會後作出決議，其中第一項就是：堅決肅清經濟地理學上的各種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表現以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歪曲；防止資產階級觀點侵入蘇維埃經濟地理科學。斥責並清算種種錯誤的傾向，如統計方向、忽視自然環境的作用（『左』傾）、庸俗地理決定論、以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總括的說，就是提高地理科學的思想性。

討論會上批評了各種錯誤的地理觀點和學說，其中包括格里哥黎耶夫的『自然地理過程』，『經濟地理過程』以及兩者所產生的『統一地理過程』，而正如地理研究所副所長丹尼洛夫所指出的，這所謂『統一地理過程』說，就是抹殺了自然發展規律與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之間原則上的差異。會上同意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不可能統一爲『統一的』地理。此外還批評了景觀和諧論、分布論的地理觀，特別指出莫斯科大學沙烏希金所傳播的和諧論，說什麼『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的和諧結合體，對經濟地理問題採取了區域地理的孤立看法，沒有顧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全國性的任務。沒有正確地意識到蘇聯經濟地理的任務，就是研究生產分布的法則，以及各個經濟地理區在社會主義下的發展和形成。

關於『統一地理過程』以及地理學研究對象問題，會議和個別的檢討都分別作了討論。格里哥黎耶夫在他的發言以及自我批評的論文中，曾深刻地指出，資產階級地理學往往保持自相矛盾的反科學的觀點，即認爲社會發展大部分是由自然界的規律所決定的，因此資產階級地理學就努力企圖用自然界的法則來替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罪惡辯護。比方殖民地國家的經濟落後性，事實表明是由於帝國主義獨佔資本掠奪的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可是美國地理學者（例如赫丁頓）就把這歸究到這些國家的氣候條件不良等等地理因素。格里哥黎耶夫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把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混淆了，因而把兩門科學（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也混淆了。他說：『自然地理學要研究的就是作爲整體（整個地球或各別自然地區）的地理環境，和地理環境的構造與發展底規律性。自然地理學各部門（地形學、氣象學、水文學、土壤地理學、生物地理學

等）則研究作爲一個整體的各個部分的地理環境組成分子。』而『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則是國民經濟，探究生產分佈的規律性，並由此得出各地區經濟構成和發展的規律性。經濟地理學的各個部門（人口地理、工業地理、農業地理、交通地理等）則研究整體中的各個組成分子，以及這些組成分子分佈的規律性，它們在經濟構成和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他自我批評道：『因此我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所發表的論文中，曾竭力把這兩種規律性統一而爲「統一的地理過程」，顯然是有着深刻的錯誤的。關於這一點，我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經體會到，共後的著作裏面也沒有重視過這些錯誤，並且發展了與上述相似的觀點。這些觀點大體上是和斯米爾諾夫的論文所提出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說法一致的。』

關於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所研究的對象，特別是前者，幾個會上和許多批評論文都批判了格里哥黎耶夫院士的錯誤（『自然地理過程』論），但是在討論中還有若干意見未能一致，顯著的如卡列斯尼克提出的理論，基本上是他在『普通地理學基礎』所提到過的，即『地球的地理外表』說，也是變相的因子交互作用論，也有人在討論中（如聶夫斯基）還特別推荐他這本著作的。可是在外表上他也是反對格里哥黎耶夫學說最激烈的一個。格里哥黎耶夫在他的自我批評中提出的新定義，是比較值得注意的。他說，『自然地理的基本任務就是：研究地理環境的組成和構造，研究共發展的規律性，以及研究人類社會如何通過這種規律性來改造（自然）。』

關於景觀問題，意見很多，似乎還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有的批評斯米爾諾夫的看法是不對的，蘇聯地理學者早已對『景觀』這個舊詞給予新的內容，蘇聯地理學者是以辯證法來處理景觀的，從頭就與資產階級地理學者不同。卡列斯尼克認爲景觀是既同時有多樣性又有同類性，它之所以多樣，因爲它是由外形（分水嶺、坡、河、湖、地下水等）和本性（地形、土壤、植物、水等）都不一樣的組成部分構成的；它之所以同類，因爲這些不同性質的各部分之結合體有規律地和典型地在一定的空間重現。而地球上客觀存在這樣的結合體，因此景觀是存在的。伊沙陳柯也認爲景觀是一種地理單位，布拉哥維多夫批評斯米爾諾夫光從形式上看問題，據他說，共實蘇聯地理學者所用的『景觀』，『因子』等等都有了新的內容。不過這許多專家的意見並沒有從基本上駁倒斯米爾諾夫所指出的錯誤：景觀派把虛構的（而不是實際上）的因子交互作用的結合體當作主要的研究對象，這樣就會脫離現實的。

關於總的（概論）和分的（區域）地理問題，在討論中也明確起來了。拉夫羅夫在地理研究所的討論會裏發言，就提到經濟地理中的區域地理派，常常以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爲其擋箭牌，說列寧早已提倡不顧全局的區域地理研究方向。這是一種曲解。列寧在研究特定地區時，是揭發了總的發展規律在特定地區所表現的發展規律的。如果離開了總的（全國）的發展規律，就不可能正確了解特定區域的眞正情況及其未來發展。

這次討論也檢討了斯米爾諾夫的偏向——有的指出他抹殺了蘇聯地理學界的一切成就，彷彿整個蘇聯地理學界完全是『唯心論』的；有的指出他過低估計經濟地理學的意義；有的指出他忽視了蘇聯學者接受俄羅斯學者的傳統；有的也還不承認貝爾格受赫特納很深的影響等等。這次討論廣泛接觸到許多著作，包括得斯大林獎金的維特威爾所著『外國經濟地理』課本在內。經濟地理學界討論時，特別結合對斯大林著作的學習，指出這本書在引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時，是採用了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例如塞米夫斯基所指出的，維特威爾引證了列寧的話，說『美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國之一』，（見該書一九五〇年版本頁二九七——二九八），而沒有指明是在什麼時期，顯然會使讀者的思想混亂的。他還指出把資本主義各國與人民民主各國編在『一本』地理裏面，統名之曰『外國』，這也是容易引起混亂的，不過這個問題牽涉到學制（課程），會上還沒有展開討論。

在幾次討論會中，特別是在全蘇地理學會自然地理學部開會時，有一些地理學者不結合自己的思想情況進行檢討；康斯坦丁諾夫在經濟地理學部討論總結發言時也指出了這一點，而在結合自己情況時，也檢討得不够深刻。這就是說，自我批評還待廣泛的展開。

經過這一次廣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現在還沒有結束），蘇聯地理學界已經向前踏進了一步，澄清了一些糾纏多年的理論問題，並發見缺點與錯誤（最大的一點是脫離實際）之來由，如希威哲所說的，地理學者還沒有很好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這一學說，還不能把這一學說作爲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的不可動搖的基石 。批評與自我批評還繼續展開．它將可以幫助着解決更多的問題，那是絲毫不用懷疑的。

# 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馬特

## 一

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發展中的最高峯，他天才地概括了無產階級近百年來革命鬥爭的經驗，特別是概括了列寧的傑出哲學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出版後三十年間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經驗和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創建了簡明而系統的理論基礎。

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也是簡明而系統地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原理的天才著作。然而恩格斯的著作與斯大林的著作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恩格斯是在着重於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舊哲學的關係，它如何從舊哲學中發展出來，以及它跟舊哲學根本不同之點；斯大斯的著作則在着重於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經典性的規定及其基本特徵。兩者完成了不同的任務，而斯大林的著作則是在更其發展、更其概括、同時也就是更其全面的形態下總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論到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所担當的歷史任務和意義時指出：『列寧這本書不僅是批判了波格丹諾夫、尤史克維奇、巴査羅夫、瓦連廷諾夫及其哲學老師亞溫那利和馬赫在他們著作中企圖用精巧光滑的唯心論來與馬克思的唯物論對立的思想，同時，列寧這本書又還捍衛了作爲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並用唯物論觀點綜合了從恩格斯逝世起，至列寧所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出版問世整個時期內在科學方面，尤其在自然科學方面所獲得的最重大最實在的成果。』

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在一定意義上是在於從正面來闡明列寧在其『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所捍衛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而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也是以這種形式而出現的。然而，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却遠遠超出簡單的和系統的闡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任務，他在許多的論點和論證上，大大地發展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 二

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著作中，斯大林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說：『辯證唯物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世界觀』。這是極其重要的規定，這個規定說明了辯證唯物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革命實踐活動之間的聯系，及其與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哲學體系之根本的質的區別。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要把這個規定作爲一根紅綫，貫穿在這本書的全部理論體系中，從這個觀點去理解、體會，和學習斯大林這部著作的根本精神。

列寧曾經斷然和明確地規定哲學中的黨性原則，並且指出：『哲學上的不偏不倚，只是可恥地掩飾着的對唯心論和信仰主義的奴顏婢膝而已。』（『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斯大林發展了列寧的這一思想，在他的著作中鮮明地標誌着辯證唯物論與黨的活動之間的聯系，這就廓清了從第二國際以來一切機會主義者將資產階級的腐朽沒落的哲學思想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狂妄企圖。而一切離開了黨的實踐活動去理解辯證唯物論，或是將黨的實踐活動認爲無須受辯證唯物論的理論指導的錯誤想法，同樣在斯大林這個斷然而明確的規定中可以得到有力的糾正。

遠在一八四三年，馬克思在其所寫的『黑格爾「法權哲學」批判』的著作中，就已指出理論與實踐的密切聯系的原理，指出辯證唯物論哲學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間的密切聯系的原理。馬克思寫道：『正如哲學在無產階級中找到它的物質的武器一樣，無產階級也在哲學中找到了它的精神的武器。……哲學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揚棄，不能轉化爲現實；無產階級如果不把哲學轉化爲現實，也不能揚棄他自己。』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要從

理論與實踐的聯系的觀點，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之作爲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鬥爭武器這個觀點，來理解、體會『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精髓。

這就是說，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首先就要求我們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如何與階級敵人作不調和的鬥爭。在現階段，在我們面前擺着特別重大的任務是：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個武器， 去揭破貼着美國商標的實用主義和世界主義， 以及僞裝爲馬克思主義而實質上却是資產階級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等等的反動的和錯誤的思想。這些東西，自從胡適及其他人販運過來以後，一直蔓延在我們的思想界，而在人民大衆當權的時代，則又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僞裝爲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就必須跟這些反動的和錯誤的思想、以及對這些思想的寬容和姑息的思想作不調和的鬥爭。

## 三

斯大林在他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天才地製作了辯證唯物論的根本原理與具體運用之間的密切聯系的典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互相一致的典範。

斯大林在論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特徵時，巧妙地把辯證法的基本特徵與具體運用結合起來。在論到現象的互相聯系、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約的規律時，他又天才地規定了『一切以條件、地方和時間爲轉移』的有名原理，並舉出奴隸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爲例，指出：在什麼歷史條件下，奴隸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在什麼歷史條件下，則又要成爲反動的東西。斯大林寫道：『顯然，沒有這種觀察社會現象的歷史觀點，那歷史科學就會無法存在和發展，因爲只有這樣的觀點才能使歷史科學不致變成一筆偶然現象的糊塗賬，不致變成一堆荒謬絕倫的錯誤。』

在論到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的規律時，斯大林天才地論證了新生的力量之不可戰勝，腐朽的東西之必歸沒落的原理 。 斯大林指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與民粹派的鬥爭事實，前者依靠了當時僅佔很小的少數然而却是正在發展中的無產階級。事實證明：這個原來是一個不大的力量的無產階級，後來發展成爲歷史上和政治上的頭等力量。

於是，斯大林得出結論道：『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

斯大林在論到事物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由量變到質變的規律時，指出被壓迫階級所實行的革命的變革，是完全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現象；指出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必須經過革命來實現，而決不能經過改良來實現；指出：『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 ，便要做革命家 ，而不要做改良主義者。』

同樣，在論到事物發展過程的實在內容是事物內部新舊東西之間的矛盾鬥爭的規律時，斯大林指出：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完全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現象；指出：『不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各種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開這些矛盾，不是要熄滅階級鬥爭，而是要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

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必須學習斯大林如何將辯證法的規律具體運用到社會政治生活中，拿來解決現實中所發生的問題。並進而將這些規律去指導革命的實踐。

這就是說，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要善於體會斯大林的這部著作的基本精神，善於將原理和方法密切地結合，善於根據這些原理和方法去解決在中國新民主主義各種建設工作中所碰到的實際問題。

必須指出：如果『一切以條件、地方和時間爲轉移』，我們就不能以一時一地和在一定條件下所取得的經驗爲滿足，甚至錯誤地將這些經驗無條件地運用到時地條件都不相同的對象上面去。

如果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腐朽的東西必歸沒落的話，那末，我們就必須更加緊密地依靠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因爲只有它才是新中國各種建設的強大而不可戰勝的領導力量，只有它才能指引我們的國家走上富强康樂的大道。同樣，如果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腐朽的東西必歸沒落的話，那末，我們就要善於發現新鮮的事物，在我們國家的建設事業中，依靠它來推動各種具體的工作。

如果事物的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是必須經過革命的變革的話，那末，我們就不要害怕在各種工作中的根本的改革 。 在各種工作中，保守主義和固步自封，都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打倒了這個敵人，我們的工作才能前進一步。

最後，如果事物的發展必須經過新舊之間矛盾的鬥爭，這就是說，在我們的（譬如說） 思想領域中 ，新舊思想之間的鬥爭是完全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現象，只有敢於面對自己的舊思想，揭發它，跟它展開不調和的鬥爭，新的思想才能取得前進的陣地，並逐漸地佔領整個的陣地。

所有這些就集中說明一點：我們學習斯 大林的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

論』，就是要能動地用辯證法來分析具體的事物。

## 四

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書中，斯大林同樣天才地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的基本特徵及其具體運用的根本原理。斯大林指出：『把哲學唯物論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去，應用到無產階級黨的實際活動上去，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在論到：(一)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二)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三)世界及其規律是可認識的——這些唯物論的根本原理時，斯大林指出：社會生活、社會歷史，也如自然界的現象一樣，是有規律的發展，而決不是什麼『偶然現象』的堆積。因此，

『無產階級黨的實際活動決不應以「卓越人物」的善良願望爲基礎，決不應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爲基礎，而應以社會發展的規律爲基礎，應以研究這些規律爲基礎。』

『無產階級黨在它的實際活動中，決不應以什麼偶然動機爲準則，而應以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實際結論爲準則。』

『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爲了不致陷入空洞臆想家的地位，那末無產階級黨在自己的活動中，就不應從抽象的『人類理性原則』出發，而應從具體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即從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出發；不應從「偉大人物」的善良願望出發，而應從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

然而，斯大林同時又着重地指出：先進的社會思想和理論，一經順應着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需要而產生出來以後，它就反過來能够對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發生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强而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爲它憑藉於正確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需要的先進理論，把這個理論提到它所應有的高度，並努力來澈底利用這個理論所有的動員的、組織的和改造的力量。』

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要善於從實際出發，善於分析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並根據它來作爲我們行動的指南。一切脫離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主觀主義的空想，都是我們工作的嚴重障礙，必然要使我們的行動遭受失敗。

然而要達到這一點，卻不是容易的事情，必須對客觀事物作詳細的調查研究，掌握豐富的事實材料，並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然後才能從這些事實材料中找出它固有的發展規律，這決不是單憑想像或片面材料所能解決問題的。

因此，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論與歷史唯物論』，又要善於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明確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各種建設工作的偉大意義，因爲只有它，才是唯一正確的科學理論，只有它，才是唯一符合於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實際鬥爭經驗的概括和總結，只有它，才能幫助我們總結經驗、發現客觀眞理，並指引我們走向勝利。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應成爲做好我們各種具體工作的唯一保證。

這就是說，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在思想方法上，一方面要求我們要反對教條主義，他方面要求我們要反對經驗主義；在工作方法上，一方面要求我們要反對命令主義，他方面要求我們要反對尾巴主義。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就要求我們同時要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貫澈到實際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當中去。

## 五

斯大林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一書中，完整地建立了歷史唯物論的體係，並光輝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理論。

斯大林首先明確地規定：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中，地理環境、人口增長和生產方式這三者的正確關係，並指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而地理環境和人口增長，就只能對於社會發展起促進或阻滯的作用，而決不能起決定的作用。

這樣，斯大林就一下子解決了許多人在很長時期以來糾纏不淸的關於地理環境和人口增長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問題，並間接地糾正了普列哈諸夫的地理唯物論的錯誤，和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一書的序文中關於社會發展中家族的作用問題所作的偶然的不正確的規定。(註)

斯大林進一步指出：

(一)作爲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的生產或生產方式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它始終是處於變更和發展的過程中，而這種變更和發展，又必然要引起全部社會制度、社會思想、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的變更和發展。

（二）作爲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的生產或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生產或生產方式的變更和發展，首先是從生產力，特別是從生產力中的生產工具的變更和發展上開始，跟着生產力的變更和發展，人們的生產關係也就跟着變更和發展。所以說，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躍的最革命的要素。

（三）作爲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的生產或生產方式的第三個特點，就是：『新的生產力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產生的過程，並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後發生，而是在舊制度內部發生；不是由於人們有意自覺活動的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覺地、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地發生的。』

斯大林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還明確地規定了關於社會生產力的有名的定義，即：

『生產物質資料時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術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這些要素總合起來，便構成爲社會生產力』；以及天才地論證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完全適應的原理，廓清了關於這些問題的糊塗觀念和錯誤思想，大大地發展了歷史唯物論的理論。

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要善於根據歷史唯物論的理論來觀察和分析問題，澈底肅清直到現在還留存於歷史科學中的歷史唯心論及其變種等等。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要明確勞動創造人類世界，勞動羣衆創造歷史的科學眞理，而反對智慧創造人類世界、英雄偉人創造歷史的反科學的見解。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要明確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明確階級立場在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上的頭等重要的意義，而反對任何的階級調協和客觀主義的態度。

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要善於根據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發展規律來觀察和分析問題，澈底肅清直至今天還留存於歷史科學中的地理決定論和人口決定論。根據這些『理論』，以爲（譬如說）中國文化起源於黃河流域，是由於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帶促成了古代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而不是（如同應當說的）古代中國奴隸制度發展的結果。根據這些『理論』，以爲（如同艾奇遜在他的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中所說的）近代中國的問題，是由於中國人口過剩的結果，而不是（如同應當說的）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勾結了中國的反動勢力欺壓和侵略中國人民的結果。所以，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必須從根本上肅清這些錯誤的和反動的『理論』。

（註）參閱本刊第三卷第四期譯載的聯共（布）馬恩列學院：『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序

## 六

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是精深博大同時又是極端的簡潔明瞭的理論典範。在這部著作中，斯大林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作了傑出的概括和總結。如果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那末，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是這部百科全書的靈魂和頭腦，它像一根紅綫一樣，貫穿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部百科全書裏面，使這部百科全書的每一個具體部分都連結起來。只有掌握了這個靈魂和頭腦，才能眞正了解和學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部百科全書的精髓。

因此，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必須跟無產階級百年來的鬥爭歷史聯系起來，跟蘇聯共產黨（布）的歷史聯系起來，跟中國人民百年來的鬥爭歷史聯系起來，特別是跟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歷史聯系起來，從其中去體會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如何在革命實踐中活生生地體現出來，在實踐中得到證實並從而指導了這個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是行動的哲學、實踐的哲學，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應當從行動中、從實踐中去體會、運用和發展這個理論。

因此，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還必須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斯大林的其他著作聯系起來，特別是跟毛主席的著作聯系起來，從其中去體會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在各方面的具體運用及其聯系。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要善於運用這個理論來解決各種具體問題。

由於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的最高發展，是百年來無產階級鬥爭經驗的概括和總結，同時也是最近數十年來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的概括和總結，因此，學習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就要善於體察新的事物的發生和發展，只有從不斷發生和發展的新的事物中學習斯大林的概括和總結經驗的方法，從其中找出新的發展規律，才能保證我們的學習不致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才能推動這個理論前進。

# 一年來文藝批評的發展及其成就

王淑明

## 一

文藝批評是『文藝界的主要鬥爭方法之一』，也是『實現文藝工作中黨的領導的重要工具』。過去一年中，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是開展了，它已是有領導地、而不是無計劃地，有重點地、而不是分散作戰地，來進行對作品批評，與對文藝上的不良傾向作鬥爭，這不能說不是這一年中文藝批評工作的特色。

在以往，我們對於文藝創作以及文藝上的一些不良傾向，有如作家對作品的粗製濫造，人物形象的歪曲，以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來表現工農兵……等這些問題，雖曾予以注意，但還注意得不够，未能充分地展開討論。這當然由於這一工作剛剛開始，又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的研究』。而同時另一方面又在於這些現象雖然表現出來，還未能成爲一種傾向，因此，也就不必過早地予以抨擊，以致妨礙到創作運動的開展。

在過去一年間，情形就不同了。所有這些傾向，已充分地暴露出來，表現得相當嚴重，其中最顯著的，爲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已侵襲到文藝領域中來，受到一些人無例外的歡迎。要保持文藝思想上的純潔性與嚴肅性，就不能不首先對這種反動思想進行鬥爭。

這裏：第一次展開這樣鬥爭的，是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評。

『武訓傳』在上海開映時，曾受到小市民的歡迎，甚至，『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亦毫無例外地著文稱頌，認爲是反映了中國勞動人民的高尙品德，事實上這是『無的放矢』。『武訓傳』不但沒有在作品中反映中國勞動人民的高尙品德，而且恰恰相反，正是對勞動人民的侮辱與對歷史的最大汚衊。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衆、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認爲『「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希望引起全國文化界的進一步的討論。這一號召，首先得到文藝界的擁護。各地文藝工作者紛紛著文從各方面——從思想性、藝術性，從歷史的唯物觀點，來作嚴密的分析。認爲電影『武訓傳』中最具有危害性質的，是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作盡情的宣傳，對勞動人民與中國近代歷史作無理的歪曲。這種混淆黑白，顚倒歷史的反動觀點，是絲毫不容姑息的，是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敵人；是不僅對文藝界、而且對整個思想界來說，都具有最大的危害性。

爲着對於武訓的歷史，了解得更加澈底和眞實起見，有關方面，組織了一個調查團，到武訓的故鄉與其興學地區，調查了一次，回來發表了『武訓歷史調查記』。這個『調查記』，將『武訓其人及其「行乞興學」的眞相和本質，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時代動態表露無遺』，郭沫若先生稱爲『這是「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的一篇實事求是的記載』。周揚同志認爲這是在『文藝批評工作的方法上，做了很好的示範』。

經過了這次調查，武訓的全部歷史，眞相大白。周揚同志於是就『武訓傳』的思想和藝術，作了系統的批判，發表了一篇具有總結性的『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的文章，作爲對這次論爭的結束。

對於『武訓傳』的批評像這樣大規模的普遍而又深入的論爭，在我國的文藝批評史上，還是第一次。在今年的文藝批評工作上，也是最成功的一次。

## 二

比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危害性較小的，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如毛主席所說：『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强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

在這一年中，我們又對於一些作家，在其作品中頑强地表現他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而又帶有傾向性的，展開了熱烈的批評。

首先是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這部作品的最大缺陷，是歪曲了人民解放軍的戰士與其指揮者的形象。怎樣會造成這種歪曲呢？這與作者的不

能深刻體驗生活當然有關，但最主要的，却正如張立雲同志在『論小資產階級思想對文藝創作的危害性』一文中所指出的，是在於『劃淸無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的界限的問題』，『必須用無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去創造人民解放軍的英雄形象，這一點不能有絲毫的模糊』。碧野的作品，所以歪曲了人民解放軍的戰士與其指揮者的形象，其最主要的關鍵，正在於他模糊了這一點。

另一歪曲了人民解放軍的英雄形象的作品，是電影『關連長』。編導者以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來代替革命的人道主義，使『關連長』這個戰鬥英雄，成爲違反紀律的指揮員，成爲愚蠢可笑的膿包，成爲盲目的個人英雄主義者。編導者處處爲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找根據，來將它設法塗飾在『關連長』的身上和臉上，這樣就將他描繪成爲一個歪曲的形象了。對於這張壞影片，『人民日報』、『文藝報』、『人民戲劇』這些報刊，都發表了批評文章，指出了它的形象的錯誤與這錯誤的根源，乃在於作者以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給作品中的主人公以不好的塗飾。

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對工農份子的無理侮蔑，以小資產階級的庸俗趣味來迎合讀者，不眞實地反映生活與新人物，這是蕭也牧作品的主要傾向。『我們夫婦之間』如此，『鍛鍊』也是如此。這種傾向，在蕭也牧的作品中，到後來是表現得越來越嚴重了。於是，就引起了陳涌同志首先在『人民文學』上對他作了批評。稍後，『文藝報』又連續地發表了好幾篇文章，指出蕭也牧的作品，代表了一種傾向，因而對他作品的批評，就具有代表性的意義。有好幾處地方，還對他的作品與根據他的作品而改編的電影『我們夫婦之間』，開了座談會。

所有以上這些對於作家在創作中的以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來代替無產階級的思想感情的批評，都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其意義乃在於『使每個同志都健全起來，使我們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眞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

## 三

這一年中的文藝批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普遍與深入。幾次的主要批評，都不是稍觸即止，而是把論爭展開，以致於求得一個比較共同的認識與很好的結束。像對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是既普遍而又深入的。對於蕭也牧作品的批評，是持續得很久，大家都認爲這種惡劣的創作傾向，是需要與它作嚴正的鬥爭的。

除了這些，在各地方性的報刊，都以一定的篇幅，來供文藝批評之用，這在過去是很少見的。如重慶『新華日報』對於劉盛亞的『再生記』的批評，『福建日報』對於『虎符』的討論，『羣衆日報』對於幾首歌頌毛主席的詩的批評與討論，『長江日報』對於阿金的『雜文』，淑子的『時事山歌』，水門汀的『文藝漫談』等的批評，……這些都是在報上展開羣衆性的對作品批評的例子。至於在期刊中，例如『東北文藝』、『長江文藝』、『西北文藝』……等，就大都闢有文藝批評專欄，每期都刊載一些對於作品的批評文章。這些作品，大都是發表於地方性的報紙或刊物上，他們即就地予以批評和討論，這樣做比較親近和切實，也使作者和讀者更容易得到教育的機會。

像『東北文藝』上對於『火車頭』討論，『長江文藝』上對於『笑』的討論和批評，『西北文藝』上對於油畫『毛主席在陝北自衛戰爭中』及秦腔劇『血訓圖』的討論和批評，都是先展開羣衆性對於作品的批評，然後再由作者自己作了比較深刻的檢討才告結束。其中如鍾紀明的作品『金元帝國的潰敗』，在『羣衆日報』及『西北文藝』上受到胡采等的批評，作者沒有正式答覆，領導上也沒有予以重視，還受到讀者公開的指摘。

地方報刊對文藝批評的重視與羣衆性批評的展開，都是這一年來的另一顯著特點。尤其是羣衆性批評的展開，我覺得値得我們予以足够的注視。從這裏，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廣大讀者對於文藝作品的認識與欣賞力的提高，同時也可以於職業批評家之外，注意培養一些可以作爲補充的生力軍。羣衆對於作品的意見常常是素樸而又尖銳，有許多是正確的。專家的責任，就在於將這些正確的意見，加以提鍊和集中，使之更系統化起來，然後再回到羣衆中去，幫助他們提高對作品的認識，這是一件非常艱鉅而又有重大意義的工作。

## 四

根據以上的叙述，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年來的文藝批評工作，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也獲得了不小的成就。在這些成就中，最顯著的，我以爲對於文藝創作上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侵入，與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頑强表現自己二者給以澈底的抨擊與駁斥，因而對於端正今後的文藝創作思想，澄淸文藝界的思想混亂現象，提高作家對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政治的重新認

識等方面，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進城以後，我們不少文藝工作者以爲自己有了生活。有了思想感情，也不必再需要改造了，因而對於學習政治就輕視起來。對於自我改造，就更麻痺大意起來。以爲單憑『技巧』和『趣味』，就可以獲得讀者，就算有了一切。但事實却不如此！一接觸到具體作品，他們中的許多人，就會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重溫起來，而且還對它非常愛好，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向反動思想投降，認賊作父而不自知，這是如何危險的事！我們必須認識：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自我改造，不是那麼容易完成的，也不是可以在短期內完成的。毛主席就說：須『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鍊』，並且也舉出他『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以爲『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經過這次『武訓傳』與對蕭也牧的作品的討論和批評，我們應該百倍地把思想上的警覺性提高起來，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竟會侵入到戰鬥的共產黨中；而『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這大概是過去我們所沒有完全料到的。經過了整風，又經過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學習，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竟還會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我們許多作家的觀念中，而不能自拔，這大概也是我們當初所沒有完全料到的。經過這次『武訓傳』與對蕭也牧作品的討論，使我們重新認識了思想鬥爭的重要性，重新認識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也使我們重新認識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以爲有了生活，有了技巧，就可以不必用無產階級的思想來武裝自己，這是錯誤的思想。這種新的認識，是這一年來文藝批評工作上所獲得的最大成就。

一九五一•九•二十•於北京

# 民間文藝學上的新收穫

鍾敬文

## 一

我們的新國家在年齡上是幼稚的。從她誕生到現在還不過兩週歲。但是，她的成長的速度却很驚人。好像某些神話裏所說的孩子一樣，在一夜裏他突然長大了起來。在過去短短的二十幾個月中，我們政治上、經濟上以及一般文化上的成就，決不是它所經歷的時間的長度能够比例的。特別是一年以來，我們祖國無數優秀英勇的兒女，在鴨綠江外，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軍和廣大人民共同對那些『文明』生番的隊伍作戰。他們挫敗了和平破壞者的威風，他們解救了鄰邦的急難和鞏固了祖國的安全。這是我們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任務的進一步的實踐和勝利。這個勝利，決不限於軍事和政治，它遍及一切文化方面。它也不僅是我們民族和國家的榮幸，而是世界一切愛和平、求進步的民族和人民共同的榮幸。

現在臨到我們的新國家成立二週年紀念的偉大節日了。這是我們放聲高歌、手舞足蹈的日子，也是我們回顧脚印並邁步向前的日子。去年這個節日，我曾經就我自己比較熟悉的學藝（民間文藝學）的新成就做了一個簡略的結算。現在我要來再做一次這種工作。我相信這決不是一種無意味的重複。第一，一年來這方面的活動，雖然比不上別方面那樣雄飛猛進，到底有相當成績。其次，這種學藝的前途無疑是坦蕩的，爲着它本來更好更大的收穫，我們必須從過去工作上得出一些可供考鏡的經驗和教訓。我們要發展已經得到的成績，我們也要避免那些有害的偏向或錯誤。爲了這些，我們的結算工作永遠是必要的。但是，像我去年聲明過的那樣，『民間文藝』這個名詞包含的對象相當廣闊，我個人比較熟悉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口頭文學」），因此，我的論述主要只能限於這個範圍內。而且我不能不更率直地承認，就在這個狹小的範圍內，我的檢討工作也不是怎樣全面和深入的。這首先自然是要怪我的修養和才能太差，但是，沒有比較充分的時間來閱讀和思索，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慶祝和歌頌偉大節日的感情太洶湧了，熱愛這種學藝和希望它發展的心太旺盛了，這就使我明知道是不很勝任的工作，也要緊緊抓住不肯放手了。

一年來這種學藝上的成就，我想在下面約略分做兩方面去敘述它。

## 二

第一是材料的搜集、整理方面。

民間文藝的研究和它的學習、改造，在今天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要進行這些，却有一個基本的工作，就是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刊行。不做好這件工作，要進行其它的工作，正像俗話說的，『巧媳婦難做無米飯』。豐富的、整理過的材料，是一切學藝工作必需的憑藉。不但像今天這樣，民間文藝的大鑛產還沒深入和廣泛發掘的時候，這種基本的工作是急切需要的，就是將來也不見得就可以完全停止它。因爲數量無盡的材料，短時期內本來不容易搜集完全，何况它又好像一個活源頭，日夜不斷地在噴出清冽的泉水來。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和一般文化工作者是很知道這點的。所以，一年來，這種新的學藝工作，不但繼續着過去的道路前進，而且由於大家的努力和方法上的進步，它的成績超越了過去的一年。

一年來，在搜集、整理工作上，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工作方式的更加集體化。這種工作，自從『五四』時期興起以後，固然有些顯然是由集體在進行的，好像北大的『歌謠研究會』和中大的『民俗學會』，就是一些例子。但是，一般地說，過去二三十年中，這種工作的担任者，主要還是少數比較有興趣的個人。就那些做過這種工作的團體來說，也是相當鬆懈的。一九四二年以後，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師生們對陝北民間文藝的搜集、整理，自然開了新風氣。但是，這種集體工作方式，直到年來才更加普及起來。自然，年來，個人的搜集者還是不少的，而且有的由於非常努力，得到了相當驚人的收成。（好像韓燕如同志，他個人近年收集到綏遠、內蒙一帶流行的『爬山歌』六千餘首，現在已經整理出了一部分來）。但是，從一般的趨向上說，集體的搜集、整理（特別是搜集)工作已經顯著地表現出它的優勢了。從事這種工作的團體，在性質上並不單純，除一般的文工團以外，好像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及學校等，都在進行這種工作。我們隨便舉一些例子。好像中央西南訪問團文工團的採集西南各地少數民族的民謠、故事和舞蹈，山東省文聯地方戲曲研究室的搜集、整理本省地方戲和小調等，貴定縣中共縣委會的領導收集當地歌謠（已得三千餘首），皖北文聯的搜集、整理皖北各種民間文藝等（已經出版了一部『皖北民歌』），海豐第三中學師生的共同搜集整理當地歌謠（已經刊行了一冊歌謠集），……僅就這些看來，也可以約略知道國內各種機關、團體怎樣在努力進行這種搜集、整理工作，並且得到相當成績了。

這種工作集體化的情形，同時也表現在各地機關、團體的刊物（特別是文藝刊物）上。許多刊物，（例如『皖北文藝』、『江西文藝』、『甘肅文藝』等）經常地或不時地登載當地的民間口頭作品。有的更進一步，大聲號召文藝工作者和文藝愛好者起來共同做集錄工作，並刊載初步整理過的材料。好像『松江文藝』就特別發表過『徵求民間文藝啓事』，並且要求大家『注意搜集民間故事』（見該刊第一卷第五期）。又好像『川西文藝』鄭重請求各地文藝工作者，通信員盡量收集本地歌謠和民間傳說，並且特闢了一個『民間文藝選存』欄，專門刊載這種作品（參看該刊第一卷第六期）。

一年來在民間文藝收集的範圍上，也有特別值得指出的地方，就是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和民間藝術更爲我們文藝工作者所注意了。他們在收集上得到了相當成績。關於這種材料，不但在西南、西北各地的刊物好像『甘肅文藝』、『西北文藝』、『貴州文藝』和『詩歌與散文』等，經常地或不時地可以看到，就是中央的刊物好像『人民音樂』和『人民文學』等，也時常刊載着這種資料（主要是民歌和樂曲）。這正表示着我們正確的民族政策的澈底執行，表示着我們國內各民族間友誼的飛躍進展。單從我們文學、藝術的角度看，也是更加繁榮、發展的一種好現象。此外，我們從一年來所收集的材料的內容說，也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提出來，就是革命的人民創作（特別是歌謠）更多量地被收集了。江西一帶的老蘇區，不但是我們革命的政治的聖地，同時也是革命的人民文學的基地。許多埋沒多年的寶貴的革命歌謠，現在被發掘出來了。在新的陽光映照下，它們熤熤地閃着亮。

一年來，我們工作者辛勤地搜集和整理過的材料，有許多是分刊在各種雜誌上的。這些自然無法細數 。現在僅就個人所看到的那些成冊出版的略述一下。

我們先數數民間歌謠和民間音樂方面的，它的名稱，有『南北方民歌』（第一、二集、林冬白、丁英編）、『革命故鄉的山歌』（駱文、徐一等編）、『陝北民歌選』（改訂本、何其芳、張松如選輯）、『信天游』（嚴辰編）、『皖北民歌』（皖北民間文藝研究會編）、『西北回族民歌選』（第一輯、唐劍虹、安迪光等編）、『嘎達梅林』（蒙古故事詩集、陳清漳等譯）、『現代歌謠』（第三輯、扶犂編）、『長工歌』（鋼板寫印、海豐第三中學編選）、

『青海民歌』(紫辰整理)、『秦腔音樂』(安波整理)、『東北蹦蹦音樂』(寄明編)、『郿鄠的音樂』(蕭寒編)等。這無疑是今年這方面最豐饒的收成。

其次，民間故事和民間傳說方面，有『寶葫蘆』(馬烽記錄)、『年的故事』(魯山記)、『田螺姑娘』(路季、周季記錄)、『元寶』(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編審部輯)、『金糞筐』(健步編)等。民間美術方面，有『民間剪紙選』(張行選編)、『渤海窗花剪貼選』(渤海人民文工團編選)等。

此外，在外國民間文藝的翻譯、介紹上，有人譯述了烏克蘭的民間故事(胡堪譯的『狐狸婆婆』等)，俄羅斯的寓言(陳立之譯的『三隻脚的熊』)和希臘的古典神話、傳說(周遐壽譯的『希臘的神與英雄』)。這些，有的是爲供給兒童閱讀的，有的原著是用舊觀點編述的。但是這種譯述多少可給我們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一種刺激或參考。說到這裏，我禁不住要附帶提到一件可喜的消息，就是那部絕版多時的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的民間故事詩(『勇敢的約翰』)的中譯本，已經在新的出版機運中再和廣大讀者見面了。想到魯迅先生生前對它那種愛護的熱忱，我們是應該更加珍惜這部名詩的。

## 三

跟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時，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也在進行着研究、論述等工作。現在我們還沒有能够即時寫出完善的有體系的『民間文藝學』或『新人民文藝創作論』等著作，可是我們這方面不斷的努力，至少可以叫人有勇氣去預想那種光輝的遠景。

這一年來，這方面的作品，不管是在雜誌上發表的，或成册出版的，都比前更加繁富了。先就成册出版的舉數一下。好像鍾琴的『越劇』、黃芝岡的『從秧歌到地方戲』、唐因的『談民間歌謠』、鍾紀明的『向民間文藝學習』，羅常培的『北京俗曲指韻』等，是關於民間戲曲、民間歌謠及一般民間文藝的探究或敍說的。好像哈華的『秧歌雜談』、思奇的『鼓詞編寫入門』以及黃寧嬰的『怎樣改進粵劇』，長江日報文藝組編的『關於相聲寫作』等，是談論改造民間文藝或創作新人民文藝的。後一類著作的多量產生，是今年一個顯著的現象。這說明我們學習固有的人民文藝的要求更加普遍了，對于固有的人民文藝的理解和運用能力更加進步了。此外，在外國民間文藝理論的介紹上，我們也有些收穫，好像錫金、曲秉誠翻譯的『俄羅斯人民的口頭文學』，就是一個例子。

其次，說到在雜誌上發表的文字。它的數量實在太多了，我們只能把它大約分做幾個項目，每項舉出一些例子來：

一、論究民間文藝上的某種問題的——好像何其芳的『論民歌』(『人民文學』)、呂驥的『學習民間音樂的幾個問題』(『人民音樂』)、嚴辰的『談談民歌的表現手法』(『人民文學』)、黃芝岡的『論神話故事的史實面』(『北京文藝』)、胡蠻的『論民間美術的風格』(『民間文藝集刊』)、游國恩的『論孔雀東南飛的思想性』(同上)、蔣星煜的『論戲曲中岳飛與神怪迷信的關係』(『戲曲報』)、馬少波的『迷信與神話的本質區別』(『新戲曲』)等。

二、介紹、論述某地方、某種類的民間文藝或民間藝人的——好像葉林的『蘇南松江分區一帶的小調民謠研究』(『人民音樂』)、江文的『土地改革中的農民詩歌』(『皖北文藝』)、劉無恙的『貴州農村的民間藝術』(『貴州文藝』)、李靜慈的『漫談傀儡劇』(『藝術生活』)、紀根垠的『山東茂腔和柳腔的介紹』(『新戲曲』)、程硯秋、杜穎陶的『寒亭的年畫』(『民間文藝集刊』)、郭乃安的『里布的『濰北楊家埠年畫的調查』(『山東文藝』)、劉以明的『湘南花鼓戲介紹十七首對花』(『民間文藝集刊』)、杜前的『農民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的音樂』(『人民音樂』)、程南豪的『贛劇的腔調介紹』——東北皮影』(『東北歌聲』)、王樹的『內蒙民間音樂述略』(同上)、安波(『江西文藝』)、鍾華的『貴州苗族的的『談蒙古的民歌』(『民間文藝集刊』)、李佺民的『貴州苗族的蘆笙』(『人民音樂』)山歌』(同上)、耕狄的『維吾爾族舞蹈、趙紀彝的『雲南圭西山歌舞』(同上)、西北藝術學院文學的起源、形式、特徵』(『新疆文藝部隊』)、張季純的工作組的『民間藝人的生活和創作』(『藝術生活』)、人一的『民間藝人侯洪康『練子嘴藝人謝茂恭』(『西北文藝』)、韓起祥的『我的創作和說書經驗』(『西北文』(『山東文藝』)藝』)等。

三、報告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經過和體驗以及談論學習、改造、創作等問題的——好像王少喦、苗晶的『地方戲曲、民歌調查研究工作介紹』(『山東文藝』)、駱文的『向民間藝術學習』(『人民

戲劇』）、狄耕的『學習維吾爾族舞蹈的經驗』（『西北部隊文藝』）、于大波的『向民間藝人學習的幾點體會』（『東北歌聲』）、匡扶的『大鼓書詞創作上的諸問題』（『西北文藝』）、艾青的『談牛郎織女』（『人民日報』）、劉劍青的『民間小調不適當的套用』（『文藝報』）、劉正平的『修改舊秧歌劇白蛇傳的幾點意見』（『河北文藝』）等。

四、其它——好像馬希斌的『組織藝人創作和培養幹部』（『松江文藝』）、遲俊德的『關於辦民間藝人短訓班』（『松江文藝』）、『井崗山報是怎樣編輯山歌的』（井崗山報社刊小册子）、萬農的『在宣傳工作中的廣西山歌』、（『新華社新聞稿』）以及邱朝曙、陳毓羆輯的『魯迅和民間文藝』（『民間文藝集刊』）等。

看了這些文章的門類和數量，可以約略知道我們文藝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和成績了。我們關於民間文藝問題的研究文字，不但產量上豐富了，而且已經有着相當優秀的篇章，好像何其芳關於民歌和呂驥關於民間音樂的論文，都是提出了並且相當確切地解決了那兩方面的一些重要問題的。對於各地方、各種民間文藝以及民間藝人的介紹、論述，是我們新民間文藝學的一個重要部分。自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以來，一直就有好些文藝工作者在努力着，但是一年來這方面努力的成績更加昭著。首先記述的範圍，一般地擴大了。其次，是有的觀察和分析相當細緻，有的論斷相當精要。至對於學習、改造和創作的意見或經驗報告，由於年來一般社會、文化的進步，由於許多文藝工作者在這些方面實踐的擴大和深入，因此在量上固然增加了，在質上也更加精進了。舉一個例子來說，好像駱文的文章中，那些敘述學習民間藝術的步驟、方法的地方，特別是後面敘述『幾點體會』的地方，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好像井崗山報社同人和廣西各縣中共縣委會或地委會等的苦心組織歌人、鼓勵創作，並巧妙地利用山歌等，不但做法新穎，而且富於政治、文化的意義和價值。因此，述說這種工作情況和經驗的文章，也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 四

我們的新民間文藝學一年來的成就是值得紀述的。我們的新學術史將會給以一個適當的章節。但是，一切學藝活動都要不斷前進。停滯就是死亡。何況我們這方面的成就距離理想還相當遠。現在試就個人所看到的那些缺陷說一說，希望我們的工作者今後能够跨過了它而前進。

首先說搜集、整理方面。一年來在材料的開拓上，某些方面雖然是突進了，却不能因此說，它已經有了普遍的發展。就口頭文學的範圍來看，歌謠的收集是最有成績的，但是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等就比較落後了。已經出版的那些集子都是很單薄的。在一般藝術上，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戲曲和剪紙等是很受注意或者比較受注意的。至於一般的民間圖案、民間建築樣式等却比較少人去收集、整理了。如果我們的工作者能够同時注意到那些比較冷落的部門，那麼，我們的收成必然是要更加豐滿的。

在記錄和整理的方法上，也有些地方值得我們考慮。有些民間故事的記錄者，拿當前的思想或政策去改竄故事的意思和情節，拿現在流行的或個人愛好的文體去改變它固有的敘述，並且大都連一點聲明也沒有。（有的歌謠的記錄者也這樣做，但是比較少數。）記錄民間故事、歌謠等，必須充分忠實於民衆原有的思想和口吻，這是起碼的規條。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爲人民的固有創作（至少優秀的創作），是有它自己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優點和特色的。一般記錄、整理的主要目的，是供給文藝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研究、參考或學習的資料。因此，就必須盡量保存原來的精神和面貌。如果有些地方須得提出意見，也應該用『附記』的形式，而不要任意修改。（至於那些內容不好的作品，我們根本就可以不去記錄或發表它。）這種做法，自然是對一般的記錄說的。那些目的在供給一般民衆和兒童讀物，或者拿民間作品做題材來重新創作的，自然是另一種事情了。總之，一般的民間文學記錄者，是不應該兼作創作者或改文老師的。此外，有的集子，或沒有適當的分類，或沒有必需的注釋，有的從各種書報上轉抄來的材料，却沒有一點聲明，這些都是不好的。又有些集子，對於材料收集、整理的經過和工作心得沒有些敘述，對於那些材料的內容和形式等沒有一些分析、評論，這不但使別的收集者或一般學習者、研究者失掉可貴的參考資料，即對於那些集子的讀者也減少了應有的幫助。

再談到關於某種民間文藝或民間藝人的敘述、民間文藝理論的探究方面。敘述、介紹各地各種民間文藝和民間藝人的文章，已經發表了不少，可是拿它去跟對象的豐富性比較起來，還是相當貧乏的。在我們許多鄉村和城市裏，差不多都可以發現像剪紙、花鼓戲、吆號子那樣的民間藝術，差不多都可以找到像韓起祥或沈冠英那樣的民間藝人。何況除了我們漢民族以外，國內還有幾十種的少數民族呢？他們在這方面，至少跟我們同樣是個『寶島』。我們的記述

者、介紹者是有無窮盡的開拓餘地的。其次，關於這方面文章的寫作，我想也可以商榷一下。有些文章，觀察確實，記述也相當詳細，這是很好的。但是，也有不少寫得很浮泛或草率。這就不能够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了。

在問題的研究上，一般地說，我們還得加倍努力。兩年來，我們的工作者，在這方面也算解決了一些相當重要的問題，好像關於『迷信與神話的區別』、『民間傳說的歷史的看法』等。但是，我們不能說，那些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基本的問題（例如民間文藝的本質、它的特徵、境界及演變的規律等）已經不存在。它正在那裏等待我們勇敢而細心的學者去提出和解決。其次，有些討論問題的文章，大概由於作者一般理論修養的缺乏和鑽研精神的不够，多少不免犯着材料主義或主觀主義的毛病。他們往往在文章裏羅列了許多材料，却沒有什麼新穎精確的解說，論斷，或者不仔細研究資料和相關的各種情況，只憑着一些社會科學上的抽象原理、原則，就大意地下判詞。這種毛病，自然不限於民間文藝學的作者，但是，我們至少希望在這方面能够免除這種不健全的現象。

在批評方面，這一年已經漸漸抬頭了。好像何其芳、艾青等對於那些歪曲民間文學（神話、傳說）的意見，曾經給以適當的糾正。又好像蔡儀對於『中國人民文學史』中某部分見解的批評，也是一個例子。但是，這種工作還是做得很不够（特別是關於搜集、整理的成績方面）。這方面的出版物和論文，已經不斷增加。如果沒有適切的批評，是不能够使它質量提高和給與一般讀者更多益處的。就材料的集子來說，有些編輯得相當不錯的，却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例如『皖北民歌』，在地方出版的歌謠集中，是比較值得推荐的，雖然它也不是沒有某些缺點。）而有些雜湊的集子，却在暢快地銷售。這樣下去，對於我們的新民間文藝學的發展前途是多少會有妨害的。今後我們必須積極地加强批評的工作。

總之，我們新民間文藝學上的工作，現在是有缺陷，正像它有顯著的成績一樣。但是，我們這種新學藝是必然要繁榮的，在不斷的前進中，它將建立起更豐富的成績，也必然會消除掉這些暫時的缺陷。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日北京。

---

（上接第7頁）

（註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一九四九·十·一）。

（註　五）一九五〇·七·四：人民日報。

（註　六）一九五〇·九·廿二：人民日報載外交部發言人聲明。

（註　七）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註　八）同註三第五節。

（註　九）毛主席：『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第八節。

（註　十）同註三第六節。

（註十一）轉引自劉少奇：在亞澳職工會議上的講話。

（註十二）同註七。

（註十三）周恩來：『中蘇友好同盟偉大的一年』。

（註十四）宋慶齡：在接受『加强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金典禮席上答辭（一九五一·九·十九：人民日報）。

（註十五）毛主席：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七日離蘇返國時，在莫斯科車站的演說。

（註十六）維辛斯基：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式上的演說。

（註十七）愛倫堡：在『加强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典禮上的講辭（一九五一·九·十九：人民日報）。

（註十八）毛主席：一九五〇·六·廿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的講話。

（註十九）周恩來：『爲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奮鬥』第二節。

（註二十）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

（註二一）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周恩來部長『關於美國及其僕從國家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的聲明』第一二節。

（註二二）同註廿一，第三節。

（註二三）一九五一·九·三：人民日報。

（註二四）毛主席：『論聯合政府』中論外交的一章。

（註二五）一九四八·七·三〇：新華社社論：『人民解放戰爭兩週年的總結和第三年的任務』。

（註二六）同註十八。

（註二七）同註十九。

（註二八）同註十九。又參閱一九五〇·五·廿二：外交部發言人『就中英建立外交關係談判事發表的談話』。

（註二九）斯大林：一九五一·二·十六：對眞理報記者談話。

（註三十）一九五一·九·十九：人民日報。

（註三一）一九五〇·十二·廿八：人民日報。

（註三二）第二屆世界和平大會，南尼報告。

譯文

# 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㊀

馬克思原著
季羨林 曹葆華譯

本文係馬克思於一八五三年六月十日用英文寫成，發表於同年六月二十五日的『紐約每日論壇』。現在刊印在一九五〇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兩卷本『馬恩選集』內。在這篇光輝的論著裏，馬克思英明地指出：英國在印度煽起社會革命，完全是爲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的。最後，更進一步說明了爲什麼亞洲社會必然要發生根本的革命。

——編者

印度斯坦是亞洲範圍內的意大利喜馬拉雅山相當於阿爾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當於倫巴底平原，德干高原相當於亞平寧山，錫蘭島相當於西西里島。在土地出產方面是同樣種類繁多，在政治構成方面是同樣四分五裂。正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底寶刀壓縮成各個不同的國家集團，我們看到印度斯坦也完全一樣，只要它不在回教徒、莫臥兒或不列顛底壓制之下，那末有多少城市，甚至有多少村莊，就分成多少獨立的和互相敵對的國家。但是，從社會觀點看來，印度斯坦却不是東方底意大利，而是東方底愛爾蘭。意大利和愛爾蘭——一個感官享樂的世界和一個苦難的世界——底這種奇怪的結合，在印度斯坦宗教底古老傳統裏就早已有了。這個宗教是感官縱樂的宗教，同時也是自身磨折的苦行的宗教；是 Lingam 宗教㊁，同時也是 Juggernaut ㊂宗教；是和尙底宗教，同時也是舞女底宗教。

有些人相信印度斯坦底黃金時代，我不贊同他們的意見，可是我也不像伍德爵士㊃一樣，爲了證實自己的看法而援引苦里可汗㊄底權威。但是請拿奧朗則布㊅底時代作例子；或者拿莫臥兒出現在北方和葡萄牙人出現在南方的時代作例子；或者拿回教徒侵入和南印度崩潰的時代作例子；或者，如果你願意，更遠地回返到古代去，看一看婆羅門自己的神話的紀年，他把印度苦難底起源推到更遠的時代，甚至比基督教徒把世界底創始還要推得更遠。

但是，不容懷疑，不列顛人帶給印度斯坦的苦難和以前印度斯坦所遭受的一切苦難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而且也更加嚴重不知道多少。我指的並不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㊆在亞洲專制制度上面所栽植的歐洲專制制度，這兩種專制制度底結合比撒爾塞提廟㊇裏讓我們一看就戰慄的任何可怕的神怪還更可怕。這並不是不列顛殖民地統治底特點，這只是模倣荷蘭殖民地統治而已，而且模倣到這樣的一個程度，我現在只須把爪哇英國總督士丹弗•拉弗爾爵士㊈對於舊荷蘭東印度公司所講的話一字不改地重複一遍，就可以把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活動底特徵描述出來：

『荷蘭東印度公司完全以賺錢爲目的，對其下屬漠不關心和肆無忌憚，比以前任何一個西印度的種植家對其種植園裏的奴隸們都更厲害，因爲這些種植家究竟還付了身價，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則沒有付，它利用整個現存的專制制度機構從土人身上壓榨出最後一個可能貢獻的東西、最後的一點兒勞動力，從而使任所欲爲的半野蠻的政府底禍害大大加劇起來，因爲它用政客們全部慣用的狡猾手段和商人們整個壟斷的利已心腸來操縱這個政府。』

所有的內戰、侵略、革命、征服、饑荒，無論它們接二連三的活動在印度斯坦顯得是怎樣異常複雜、迅速和帶有毁滅性，却只僅僅觸到它的表面而已。英國把印度社會底整個機構摧毁了至今還沒有加以重建的徵兆。失掉了舊世界，而沒有獲得新世界，這給印度人目前的苦難添加了一種特別的憂鬱，並且把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傳統和它全部過去的歷史分隔開來。

從不可追憶的時代起，在亞洲一般講來政府只有三個部：財政部，或國內掠奪部；軍事部，或國外掠奪部；最後是公共工程部。氣候和土地的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穿過阿拉柏、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到亞洲最高高原的廣袤的沙漠區域，便利用運河和水利工程的灌溉成爲東方農業底基礎•像在埃及和印度一

樣，在美索不達米亞、波斯等地也利用氾濫來使土地肥沃；高地的水流被利用來補充作灌溉之用的運河。因爲在西方，例如在佛蘭德和意大利，不是經濟地和集體地使用水就不行，所以私人的經營會自願地聯合起來，但是在東方，因爲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自願地聯合起來，所以就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了。由此便有一切亞洲政府所必須實現的經濟功能、即建立公共工程的功能。這種用人工使土地肥沃的工作，依靠中央政府來進行，一旦灌溉和排水被忽視了，土地立刻就變得無用。這就說明了下列不如此便令人奇怪的事實：我們今天看到大塊的地區荒蕪不毛，它們以前都是耕種得很好的，譬如在巴爾蜜拉㈠，在培特拉㈡，在也門廢墟裏，在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底廣大地區裏就是這樣。這也說明了爲什麼一次破壞性的戰爭就能使一個地方在幾百年內沒有人烟，喪失它的全部文明。

現在，不列顛人在東印度從他們的先驅者那裡接受了經濟部和軍事部，可是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顛的自由競爭原則，自由放任原則㈢來進行的農業便垮台了。但是，在亞洲各個帝國裡，我們通常看到農業在一個政府下垮台，而在另一個政府下卻重新復活起來。在這裡，收穫是決定於好政府或壞政府，正如在歐洲是決定於好年月或壞年月一樣。因此，假如沒有一個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性的環境，即全部亞洲世界紀年裏的一個嶄新的現象，那末無論對農業的壓制和忽視是怎樣地嚴重，這種壓制和忽視也不能看作不列顛侵入者對印度社會的致命的打擊。無論印度過去的政治面貌是怎樣地變化不定，它的社會關係却自極遠的古代到十九世紀最初十年是沒有變動的。手織機和手紡車，產生了無數的紡工和織工，是印度社會構成底樞紐。從不可記憶的時代起，歐洲就得到了印度製造的絕妙的織品，而且是用自己的貴重金屬去換取，於是供給了金匠以原料，而金匠則是印度社會必不可少的成員，因爲印度社會非常愛好裝飾品，甚至最低的階層、那些幾乎是裸體走路的人們，普通都帶上一付金耳墜，頸子上都套着某種金飾品。手指上和脚趾上帶環子也是普遍流行的。婦女和孩子常常帶着一大串金的或銀的臂環和足環，而金㈣和銀的神像則在家屋裏也可以看到。打碎印度的手織機和破壞它的手紡車的，正是不列顛侵入者。英國首先把印度棉織品從歐洲市場上趕走，然後再把棉紗輸入印度斯坦，終於以棉織品充塞了這個棉織品祖國。從一八一八年到一八三六年，從大不列顛輸出到印度去的棉紗上昇的比例是一：五二〇〇。在一八二四年從不列顛輸出到印度去的細棉紗還不到一百萬碼，而在一八三七年就超過了六千四百萬碼。但是，同時達伽（Dacca）的人口却從一五〇、〇〇〇人降到二〇、〇〇〇人。以紗織品著名的印度城市底這種沒落，決不是最壞的後果。不列顛的蒸汽和科學在整個印度斯坦領土上把農業和手工業底結合澈底摧毀了。

這兩種情形——一方面，印度人像一切東方人一樣，把作爲他們農業和商業底首要條件的巨大公共工程交給中央政府去管理，另一方面，他們又散住在全國各地，憑着農業和手工業在家庭裏的結合集聚在各個小的中心，——這兩種情形從最古的時代起便產生了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社會制度——就是所謂的農村公社制度（Village System），這種制度給予這些小單位每一個以它們的獨立的組織和不同的生命。從不列顛下議院關於印度事務的官方報告底下面一段描寫中，可以判斷這個制度底特殊性質：

『從地理上看來，一個鄉村就是一片佔有幾百 或幾千畝耕 地和荒地的地方；從政治上看來，它很像是一個團體或城市。通常它有自己的這些官吏和雇員：Potail或居民首腦，一般地管理鄉村事務，調解居民糾紛，行使警察權力，在村裏收稅，因爲他有個人的影響，對居民底情況和利害關係又了解得很仔細，所以，他最適宜於担任這個職務。Kurnum 記載耕種情況，登記一切同耕種有關的事情。還有Tallier和Totil，前者底任務是蒐集關於犯罪和違法的情報，陪伴和保護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去的人，後者底活動範圍似乎直接只限於本村，他在別的任務之外，還要保護村莊邊界，如果邊界上發生了爭端，就去作證。看守蓄水池和水道的人替農耕分配水量。婆羅門（Brahmin）主管村裏祭神的事情。教師在沙裏教村裏的小孩子唸和寫。還有管曆法的婆羅門或占星家等等。這些官吏和雇員一般地組成管理村莊的機構，可是在國內許多地方這個機構並不這樣龐大，上面所說的許多責任和職務都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在另外一些地方這個機構超出上面所說的人數。從不可追憶的時代起，這個國家底居民就在這種簡單的公社管理形式下生活着。村莊底邊界很少變動；雖然村莊本身有時候被戰爭、饑荒或疾病所損害，甚至弄得荒蕪起來，可是同一的村名、同一的邊界、同一的利益、甚至同一的家族却繼續維持好幾百年。居民對於帝國底崩潰和分裂毫不焦慮；只要村莊始終是完整的，他們就不管它是轉移給哪個勢力或者隸屬於哪個統治者；它內部的經濟始終沒有改變。Potail仍然是居民首腦，仍然作村中的小裁判官或知事、收稅員或收租人。』

這些社會機構底細小的刻板的形式，大部分已經解體了，而且還正在消逝

，這與其說是由於不列顛收稅官和不列顛兵士底粗暴的干涉，倒不如說是受了英國蒸汽機和英國自由貿易底影響。那些家庭公社是奠基在家庭工業上，在手織業，手紡業和用手進行的農業底特殊的結合上，這種結合使它們都能够自給自足。英國的干涉把紡工放在了蘭開夏，把織工放在了孟加拉，或者把印度的紡工和織工都一掃而光了；這種干涉摧毀了這些細小的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因爲它破壞了這些公社底經濟基礎，從而引起了亞洲所經歷過的最大的、說實話也是唯一的社會革命。

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家長制的無害於人的社會組織拆散了，解體了，被投到苦海裏去了，以及它們的個別分子同時又喪失了自己古老的文明形式和祖傳的生存手段，這對人的情感無論怎樣不愉快，我們都不應該忘記：這些淳樸的村莊不管外表上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却始終一直是東方專制制度底堅固基礎；它們把人類精神局限在最窄狹不過的範圍內，使它成爲迷信底馴服的工具，把它當作傳統規則底奴隸，剝奪了它的全部偉大性和歷史首倡性。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人們底野蠻的利己主義，他們黏住在可憐的一小片土地上，泰然自若地看巨大帝國底沒落，看難以形容的殘忍行爲底進行，看大城市居民底被屠殺，他們看這些事情同看自然現象一樣不覺得有什麼奇怪，同時只要任何侵略者肯垂顧他們，他們自己就成爲這個侵略者底無可奈何的俘獲品。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毫不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這種被動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喚起了狂野的無目的的放縱的破壞力量，使嗜殺在印度斯坦成爲了宗教儀式。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細小的公社是被種姓㈠㈢底劃分和奴隸制度所沾汚了；這些村社强迫人服從外在環境，而不把人昇爲環境底主宰；它們把自動發展着的社會狀況轉化成永不變動的自然命運，從而引起野蠻的自然崇拜，這種自然崇拜底蛻化則表現于下列事實：作爲自然主宰的人竟向猴子哈努曼㈠㈣和牝牛撒巴拉㈠㈤虔誠地叩頭。

的確，英國在印度煽起社會革命，完全是爲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在堅持這些利益的方式上是愚蠢的。但是問題並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如果在亞洲社會狀況方面沒有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呢？如果不能，那末不管英國犯了多大的罪，它在引起這個革命上却是歷史底不自覺的工具。

這樣，無論古老世界崩潰的情景對我們個人的情感是怎樣難受，可是從歷史觀點看來，我們有權利同歌德一起高唱：

這痛苦還要折磨我們嗎，
既然它增加了我們的快樂？
無量數的魂靈不是
已經被帖木耳底統治所吞噬了嗎？㈠㈥

附註：

㈠一八五三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研究東方問題。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們發現他們在通信裏討論東方各國歷史發展底基本特點。村社底作用、灌溉底意義、土地私有制起源底特點問題、東方專制制度底基礎、殖民政策在最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發展上的作用和影響，——這些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裏所討論的問題。通信裏所發揮的一些思想詳細地概括在馬克思底一系列關於中國和印度的論文中。在這一時期，太平天國革命正在中國進行着。在印度，哈達起義是在準備過程中，並且於一八五七年爆發了。這樣，研究東方問題，對於馬克思不僅具有理論的興趣，而且也由於革命鬥爭底要求。一八四七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已經揭示出了：從資本主義發展看來以及從母國的產業週期過程看來，印度和中國都是非常重要的。

理論的興趣和革命鬥爭底實際要求，一樣地使馬克思底注意力轉到了印度。

馬克思關於印度的論文甚至在今天也一點沒有喪失它們的意義。以伯恩斯坦爲首的修正派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就提出了殖民地政策有文明化的作用的理論，後來又提出了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有進步作用的理論。他們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斯圖特加的第二國際代表大會上爲自己的觀點辯護。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以後的時期，在一九二八年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第二國際把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列入了自己的正式綱領。這個理論是機會主義者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所辯護的『非殖民地化』理論底眞正基礎，根據這個理論，帝國主義列强彷彿推進了殖民地底發展和工業化。

馬克思關於印度的論文對於這些問題給予了直到今天還有效的答覆；它們揭露了殖民地政策底眞正作用，駁斥了非殖民地化理論和民粹派底觀點。這些論文評價了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展示了英國和印度革命底遠景。

——一九三四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英文版編輯部註

㈡Lingam 宗教：大體說來，印度教有兩大支派：一是濕婆教，一是毘溼紐教。濕婆教崇拜的神是濕婆。在早吠陀還是魯德羅（Rudra），而不是濕婆。魯德羅是破壞力量人格化了的神，他的天然基礎大概是雷電底傷害方面。其後逐漸演化成了濕婆，成爲在印度最受崇拜的神之一。

濕婆的象徵有時候是公牛，但最普通的則是 linga，男根。印度教底神學對這種男根崇拜當然有許多高深玄妙的解釋，但從現代科學立場看來，這只是原始民族宗教形式之一，因爲除了印度以外，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過，或者到現在還有崇拜男根的儀式。在印度教兩大支派之中，信仰濕婆教的多半是下層階級的人。最著名的所謂 Linga-

vats 就是一個好例子。這種人是運羅昆茶人，不是雅利安種，他們住在南印度，說的話也不屬於印歐語系。由於人種的關係，他們是被壓迫的階級，所以反抗意識很强。在印度教底三大神裏面，他們只崇拜濕婆，作爲濕婆底象徵的男根，當然也就是他們崇拜的對象。眞正的 Lingayat 都隨身帶着小銀盒，裏面藏有石頭製的男根，代表他們的信仰。他們最初的目的似乎是反抗婆羅門教底統治和壓迫，想取消一切階級底劃分，所以宣傳：一切隨身帶 linga 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他們禁止童婚，不反對寡婦改嫁，不用火葬，而用土葬，這一切都表示他們對舊勢力的反抗。

——譯者註

㈢ Juggernaut 係由梵文 Jagannatha 演化而來，意云『世界之主』，是毘搜紐別號之一，同時也是印度最著名的廟宇名字。這個廟宇位於比哈和俄力薩省普力城，在孟加拉灣岸上。公元一一〇〇年爲羯陵伽王阿難陀招陀恒伽所建。規模宏偉，周圍有二十呎高的石牆。裏面共有一百二十座廟宇，有些廟宇是供養毘搜紐的，十三座廟是供奉濕婆的。有一座圓錐形的塔高一百九十二呎，上面有毘搜紐底輪和旗。這是印度教的聖地，所以到這裏來朝拜的人非常多。每年六、七月間舉行大廟會，把神像放在車上拉出來遊行，虔誠的人就投身輪下自殺。這個廟宇以賣淫聞名，這是僧侶們在宗教儀式底掩蓋下所進行的。實際上這是一筆收入。這筆收入有一部分作爲貢稅付給英國人。

——譯者註

㈣伍德爵士（Sir Charles Wood），一八〇〇——一八八五年）是英國政治家，自由黨黨員，印度事務部部長。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版編輯部註

㈤苦里可汗（Khuli-Khan，一六八八——一七四七年）是波斯國王，曾從事征服印度的戰爭（一七三八——一七三九年）。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版編輯部註

㈥奧朗則布（Aurung-Zebe，一六一九——一七〇七年）是莫臥兒帝國最後的一個大皇帝（一六五八——一七〇七年）。在他以前，莫臥兒帝國在北印度和中印度還能勉强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出了幾個有統治能力的皇帝。他繼位以後，摩訶剌佗勢力一天天地强大起來，同莫臥兒帝國連年交兵，是促成莫臥兒帝國崩潰的主要原因。

——譯者註

㈦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〇〇年，目的是在進行對印度的壟斷商業。在公司底『商業』活動底掩蓋下，英國資本家征服了印度這個國家，並且統治了幾十年。在一八五七年印度起義之後，該公司被取消了，英國政府着手直接統治印度。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版編輯部註

㈧撒爾塞提廟（The Temple of Salsette）是一座在石頭裏刻成的石洞廟，位於印度孟買區的撒爾塞提島上，裏面有無數的石頭神像。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版編輯部註

㈨拉弗爾爵士（Sir Thomas Stanford Raffles）一七八一——一八二六年）是不列顛殖民事務方面的人物，爪哇與蘇門答臘底總督，兩卷爪哇史底作者。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版編輯部註

㈩巴爾密拉（Palmyra）是古代商業城，在大馬士革與幼發拉底河中游之間。古代亞述王提革拉皮勒塞一世已經提到過這座城。一度爲羅馬殖民地，曾繁榮過一個時期。紀元後二七二年爲奧雷良所破壞，在八世紀又爲阿拉伯人所破壞，遂成廢墟。在十七世紀遺址爲人所發現，幾百年來供旅人憑弔。

——譯者註

㈠㈠培特拉（Petra）是阿拉伯奈伯特王國古都，在窪地阿拉伯山內石峪中，爲古代南敘利亞商隊要衝。一八一二年被發現。在廢墟中有極宏偉的石墓、廟宇、戲場等等建築。建築形式是希臘、羅馬和東方藝術底混合物。

——譯者註

㈠㈡這裏原文是 laissez-faire 與 laissey-aller，直譯是『讓他作』與『讓他走』，引申的意思是職業自由和商業自由。這是自由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底公式，他們主張自由貿易，反對國家干涉經濟關係。

——譯者註

㈠㈢種姓：以前有人譯爲階級，又有人音譯爲卡斯時。我們根據中國的舊譯譯爲種姓。這在印度是近於階級制度的一種制度，但與我們現在所謂階級又不盡相同。最初有四個主要的種姓：（一）婆羅門（僧侶），（二）剎帝利（貴族），（三）吠舍（平民），（四）首陀羅（奴隸）。前三個是所謂再生族，第四個是所謂一生族。這四個種姓底劃分來源非常早，在梨俱吠陀時代的末期已露萌芽。梨俱吠陀第十卷原人歌說：婆羅門是從原人頭上生出來的，剎帝利是從原人肩上生出來的，吠舍是從原人腿上生出來的，首陀羅是從原人脚上生出來的。種姓間甚本上不許通婚，但也難免有通婚的事情發生，於是就產生了所謂混合種姓。印度的許多法典都苦心孤詣地替這些混合種姓製訂名稱，譬如一個婆羅門男人同一個吠舍女人結婚生的孩子叫做安巴休他人，一個婆羅門男人同一個首陀羅女人結婚生的孩子叫做尼霞打人，依此類推，混合種姓就多了起來。於是，印度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也就變本加厲了。這現象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下等種姓不能走別人走的路，不能入學校，不能到公共泉水那裏去取水，不能同別人接觸。印度的『不可接觸的』種姓是舉世聞名的。

——譯者註

㈠㈣哈努曼（Hanuman）：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羅摩衍那裏面的一個猴子，它幫助羅摩打敗了錫蘭島上的妖怪，奪回愛人。羅摩後來被尊爲毘搜紐神底化身，哈努曼也就成了神猴。

——譯者註

㈠㈤撒巴拉（Sabbla）：印度教裏的神牛，財富與幸福底保持者，通常被尊爲土地與肥沃之神。

——一九三六年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英文版編輯部註

㈠㈥引自歌德詩篇『東西詩集』(West-östlicher Diwan)。『給蘇萊卡』(An Suleaka)。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英文版編輯部註

#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和軍隊的理論

蘇·赫魯斯多夫上校作
曹汀譯

在這篇論文裏，作者對於戰爭理論的基本原則，作了科學的分析，並對資產階級戰爭論的反動觀點，予以有力的批判。此外，作者又明確地闡述了蘇維埃軍隊的三個特點，並聯系到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的歷史意義。最後，作者更就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來說明帝國主義時代戰爭的規律性及其性質。本文是一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優秀作品，希讀者注意。

——編者

戰爭是一種複雜而矛盾的現象。它們通過階級社會底全部歷史而給巨大影響於許多民族和國家底社會經濟生活，停滯或者加速社會發展底進程。

有關闡明戰爭本質及其起因的問題，自古以來就是許多哲學家、政治家和軍事思想家研究的對象。但是祇有馬克思主義底創始者才在歷史上第一次使對於戰爭現象的研究工作具有了鞏固的科學基礎。資產階級理論家宣傳說什麼戰爭將永遠存在而不可消滅，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抑和他們相反，指出戰爭是歷史的現象，是在人類社會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發生的。他們確定了戰爭依賴於物質生產和社會階級結構的這一原則。他們證明：生產方式對於作戰方法也具有決定的影響。恩格斯曾寫道：『任何東西都沒有像軍隊和艦隊那樣依賴於經濟條件。武裝、編制、組織、戰術和戰略首先依存於某一時代所達到的生產程度和交通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地確定了戰爭在歷史上過渡的性質，指出：過去曾有一個時期，戰爭不曾存在，而將來也要有一個時期，戰爭將不再發生。

在原始共產社會時期，沒有階級，沒有剝削，也沒有國家，因此也不知道有戰爭，也就是不知道有爲了奴役別人，爲了某種政治目的而進行的一種有組織的武裝鬥爭。在個別的氏族和種族之間也曾有過武裝衝突，但那是偶而爲了爭奪更好的狩獵地和牧畜場，或者爲了爭奪生存的土地而發生的。這樣的衝突確切地講不能叫做戰爭。

武裝衝突祇有在原始共產社會分裂，由於社會分工而出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隨之發生並開始形成階級的時期，才帶有戰爭底性質。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戰爭便成了剝削者獲財致富的手段，取得奴隸的手段。私有制和階級底產生結果就使得戰爭成爲代表壓迫者利益的國家底正規的作用，成爲壓迫者加强並擴大其統治的手段，强掠其他民族的源泉。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戰爭就其本質來說是某一階級以暴力手段來實行的政治底繼續。統治階級及其政府以各種各樣的手段——經濟的、思想的、外交的等等——來實現其政治目的。如果這些手段還不足以達到目的的話，鬥爭的階級和國家就訴諸暴力的、武裝的鬥爭方法——就訴諸戰爭。『一切戰爭與它從而產生的政治制度是密切聯系着的。某一國家，這一國家內的某一階級在戰爭前長期所執行的政治也正是這一階級在戰時所必然而不可避免地繼續的那一政治，祇是行動形式改變而巳』（『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三三三頁）。

不過如果認爲列寧所說『戰爭是政治底繼續』的這一原則與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和政治的關係所持的意見毫無二致，那當然是不對的。這一原則本質上正是和這些意見對立的。克勞塞維茨是反動的普魯士貴族底思想家，他把政治與經濟分開，從其中抽去了階級的內容，把政治說成是全社會利益底表現。這樣解釋政治是有其作用的，就是要掩飾德意志王侯公卿們所進行的掠奪性戰爭底

階級內容，把這些戰爭描寫成爲全民政治底工具。

列寧把戰爭解釋爲以暴力手段來進行的政治底繼續，他這一理解是以揭示政治本身底階級本質爲其基礎的。在政治中表現着在生產方式中佔據不同地位的各階級底根本的經濟利益。列寧說，政治是經濟底最集中的表現，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在每一一定的社會裏，統治階級底政治就是統治的政治。列寧寫道：『統治的階級也在戰爭中決定政治』（『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九二頁）。正是因爲如此，所以研究政治才能够使我們弄清戰爭底性質，它底階級內容，才能够確定：那些階級底物質的利益引起了某一次戰爭。

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的理論是以對社會發展規律的了解爲其基礎的，它是唯一科學的理論，正確地解答了戰爭發生和存在的問題。它揭開了資產階級社會學者和軍事家用以掩蓋戰爭的外衣，闡明了政治和戰爭底階級性。馬克思列寧主義證明：一切戰爭底起因都孕育在矛盾的生產方式之中，而某一國家底社會和國家制度以及國際間政治關係底性質，就是由這一生產方式來決定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確定了戰爭和分爲對立階級的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的關係，確定了戰爭和階級及國家底政治的關係，因此就堅決地駁斥把戰爭視爲僅僅是對外政策底繼續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底觀點。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在階級和國家所施行的對內和對外政策之間有一種不可分離的、有機的聯系。打算把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對立的一切企圖都必然要得到不正確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結論。一個國家對外政策底性質是與國內統治階級底政治路線直接有關的。列寧指出：『戰爭底性質及其成敗大大有賴於參戰國家底內部制度，戰爭是某一國家所施行的對內政策底反映』（『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三頁）。

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戰爭是以暴力手段來進行的政治底繼續的這一定義在把戰爭分爲正義和非正義的這一原則中具體化了。這一原則以科學的精確性闡明了現代以及過去戰爭底政治性質。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戰爭有兩種：

『（一）正義的，非掠奪性的，解放的戰爭，其目的或是在保衛人民抵禦外來侵犯及奴役人民的企圖，或是在把人民從資本主義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或是在把殖民地和附屬國從帝國主義者壓迫下解放出來。

（二）非正義的，掠奪性的戰爭，其目的是在侵略和奴役別的國家，奴役別國人民』（『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版中文本，第二〇九頁）。

列寧和斯大林指出，戰爭底性質和目的可隨着戰爭發展時的政治情況底變化而根本變化。歷史上就有一些例子，說明正義的戰爭變爲非正義的戰爭，以及相反地非正義的戰爭變爲正義的戰爭。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便是戰爭由正義變爲非正義的明顯例子。列寧寫道：『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基本原則就是在於說明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界限是有條件的，可以變動的，沒有任何一種現象在某種條件下不能够變爲它底對立物。民族戰爭可以變爲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反之亦然。例如，法蘭西大革命時的戰爭開始時是民族的戰爭，而且也曾經是這樣。這些戰爭是革命的，因爲它保衛偉大的革命反對反革命王朝底聯軍。但是當拿破崙建立法蘭西帝國以奴役歐洲一系列建國很早的、能够生存的大的民族國家的時候，法蘭西民族戰爭就變成帝國主義者的戰爭了，而後者又產生民族解放戰爭來反對拿破崙底帝國主義』（『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八一頁）。

通過奴隸、封建和資本主義社會全部歷史最顯著的各種正義的、解放的戰爭之一便是被剝削者反對剝削者的階級鬥爭，這種鬥爭在階級矛盾最尖銳化的時期便採取武裝起義和國內戰爭底形式。在這些戰爭中腐朽的社會關係被消滅了，舊的反革命的制度被破壞了。在帝國主義時期，這些戰爭就使被壓迫的人民擺脫資本主義的奴役。

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布爾什維克駁斥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底思想，他們反對一切戰爭，因而認爲勞動者註定要永遠作奴隸。布爾什維克反對剝削階級爲了加强其統治、掠奪廣大羣衆以及壓迫其他民族而進行的戰爭。布爾什維克始終反對以暴力加於被壓迫階級和民族，而號召他們起來作最堅決的鬥爭以反對掠奪性的戰爭直到進行革命和推翻資本家底政權爲止。但布爾什維克始終在原則上贊成革命的階級和進步的社會力量對反動的階級及其政治機構施以暴力，因爲如同馬克思所指示的，暴力是一切孕育於舊社會的新社會底催生婆。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爲：被壓迫階級對壓迫者進行戰爭是合法的、進步的、正義的和必要的，但是認爲：反對人民和被壓迫階級的戰爭卻是野蠻的、暴戾的。『社會主義者永遠站在被壓迫者底方面，因而他們不能够反對那種目的在於進行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鬥爭以反對壓迫的戰爭』（『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二八四頁）。

把戰爭分爲正義的和非正義的這一列寧主義底原則是共產黨正確提出在戰爭中保衛祖國的這一問題的理論基礎。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衛『祖國』是出賣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事業，反之，正義的解放戰爭卻要求廣大羣衆積極參加國防事業。

『承認保衛祖國，這就是承認戰爭底合法性和正義性……如果剝削階級爲了加強其階級統治而進行戰爭，那末這是一種罪惡的戰爭，在這樣的戰爭中「主張保衛祖國」，那就是醜惡，那就是出賣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九九頁）。列寧關於在正義戰爭中必須保衛祖國的這一指示是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在它們反對反動的世界主義思想的鬥爭中的直接的行動指南，這種反動的思想宣佈祖國和民族底概念『已經陳腐了』，而爲確定英美世界統治掃清道路。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戰爭的理論底某些基本原則就是這樣，這一理論是唯一科學的理論。

剝削階級底思想家在戰爭底問題上站在完全相反的和顯然矛盾的立場上。資產階級歷史家、哲學家和軍事理論家由於他們階級的局限性，從來就沒有能夠揭示和說明戰爭及其存在底原因底眞正本質。爲了討好他們帝國主義的上司，他們妄圖證明：戰爭在各民族和國家底生活中是一種自然的、永恒的現象。

在資產階級文獻中傳播最廣的就是一種反動的生物學的戰爭論。這一理論底代表者們欺騙地利用被他們庸俗化了的達爾文主義，斷言：戰爭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底產物，說什麼在人類社會中有所謂生存競爭法則，而戰爭就是這一法則最尖銳的表現形式。

生物學的戰爭論底政治思想就在於說明強盜的戰爭是正當的、永存的，對勞動者隱藏這些戰爭底起源和原因而企圖由此使羣衆不去參加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的階級鬥爭。

生物學的戰爭論底變種就是臭名遠揚的種族論，這是施行侵略的對外政策、奮力爭取世界統治的帝國主義國家底思想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法西斯德國在種族論底招牌下準備和進行的。希特勒匪幫宣稱日爾曼人是『優秀種族』而斥責其他民族爲『劣等種族』，好像這個『優秀種族』就是天生來要統治其他民族的。他們用毫無忌憚的暴力手段，不惜絕滅數百萬人，首先是斯拉夫人，企圖實現他們建立世界統治的那種夢想的計劃。可是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吃人生番們遭到了完全的失敗。

目前僭望世界霸權的美英反動統治者也開始用英美式的種族論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說什麼操英語的民族是負有使命來統治全世界的。毋庸置疑，美英帝國主義連同它們底種族論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德意志帝國主義所遭受的同樣命運。

資產階級御用學者們爲了證明帝國主義掠奪是合理的，目前也在企圖復活馬爾薩斯門徒們底荒誕觀點，這些門徒們把戰爭視爲『德行』之一，因爲戰爭可以減少『過剩的人口』，由此好像就可以恢復人口數量和現有生活資料之間的平衡。現在美國吃人生番佛格特把馬爾薩斯派底反動思想運用於美國侵略政策底目的和任務，要求在新的強盜戰爭中屠殺千百萬人民。

所以說，一切資產階級的戰爭理論底基礎都在於努力確立戰爭底不可避免和永久存在的理論，企圖證明掠奪性的戰爭和資產階級國家底反動政策是合理的，掩飾帝國主義戰爭底掠奪性，欺騙勞動者，把他們變成奴隸和砲灰，誘使人民羣衆不去參加跟產生戰爭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底鬥爭。

祇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給予有關戰爭起源及其本質的問題以唯一正確的、科學的解答；祇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指給我們走向完全消滅戰爭的正確的道路——消滅資本主義及取得全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

進行戰爭的主要工具就是軍隊，它是國家最重要的機構，是和國家同時產生的。

資本主義國家底軍隊是用以鎮壓本國勞動人民、掠奪及奴役其他國家人民的，但是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和軍事思想家卻想着掩飾和僞裝這種軍隊底階級本質，而虛僞地斷言：說什麼軍隊是超乎政治之外的，負有完成『全民』任務的使命的，說什麼軍隊是整個民族底武裝力量，而不是維持剝削者政權的工具。

階級社會發展底歷史證明：統治的剝削階級一直是把軍隊當作強迫實施本國對內對外政策的工具。列寧指示我們：資本主義社會底軍隊『是維持舊制度的鐵拳，是保護資產階級秩序、支持資本家政權、保持和培養勞動者對於資本家的馴順和服從的最堅強的堡壘』（『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七八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意——目前之所爲，便供給我們不少彰明較著的事實，說明他們把軍隊當作鎮壓工人運動的工具，這些行爲顯著地證明了列寧這些指示的正確性。

軍隊也被剝削階級用來侵佔他國底領土。

（未完）

# 評粟著『新財政學教程』

新潮書店出版　共二七三頁

趙靖

## 書評

鄒可同志認爲本書『雖然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但其中內容有許多原則性的錯誤。』（見本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其實，本書的壞處，還遠不止此。從其整個體系來說，這本書乃是一個東拚西湊、馬列主義其形而資產階級理論其實的混合的怪物；從其內容來說，不但有很多不可容忍的錯誤，而且內容貧乏而重複；許多資產階級財政學的論點，都毫無批判地保留下來。其所引用的資料，更有不合實際情形的地方。總之，這是一本『粗製濫造』的作品。

要想詳細指出本書的每一錯誤，那是一時寫不完的，以下，只就其中最主要的，指出一些來。

第一、不成體系。著者是以打破資產階級財政學的『四分法』，創建財政學的新體系自任的，但他所創建的體系，却是一個雜亂無章，不成體系的『體系』。

全書分作上下兩篇，上篇題爲『論財政與財政學』，其性質和內容，都只是通常一個緒論所應包括的，著者把它當作全書的兩大構成部分之一，其分配比例，已經很不恰當。下篇論述現代各國的財政制度，而在資本主義財政制度，社會主義財政制度和新民主主義財政制度之前，加上『財政制度的基本概念』一章（第五章），究竟是什麼用意呢？難道在三種具體的財政制度之外，還有一種『抽象的』財政制度，須加討論嗎？著者在『財政學的理論體系』一節（第二章第四節），也曾說到，『例如在三種不同的財政制度之下，雖說都有外貌相類似的財政現象如租稅、公債和預算制度等，但這些東西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之中，各有其不同的性質、作用和任務，各有其不同的發展規律。』（第三九頁）既然如此，爲什麼却要在討論這些『不同的性質、作用和任務』，『不同的發展規律』之前，先把這些外貌相類似的財政現象孤立來看呢？這恰是資產階級財政學所慣用的形而上學的方法。

由於這種錯誤的安排，著者在『財政制度的基本概念』一章中，就只能搬弄一些資產階級財政學者對公共收入和支出的分類方法，或把各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的預算收支分類，毫無意義地列舉在一起，實際上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在同一章的第五節，討論『收支適合與公債的意義』。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發行公債誠然是爲了『收支適合』，但在社會主義國家和新民主主義國家，除了開國之初和少數戰時年份外，赤字預算根本就不存在，那裏還有什麼『收支適合』論之可言？著者在本節中，所討論的也完全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債，既是這樣，爲甚麼不把它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債及其本質』一節（第六章第四節）中去討論呢？

著者在自序和第二章第四節，差不多用完全同樣的語句，批判了資產階級財政學的四分法，但在下篇各章中，著者在基本上並不能擺脫四分法的束縛。其所不同的，是：資產階級財政學先把財政現象四分，然後再在收入、支出、公債、預算等標題下，討論各種社會制度下的個別財政現象（有的則祇討論資本主義各國的財政現象）；本書著者則是先區分各種不同的財政制度，然後再把每種財政制度四分。四分法的形式是改變了，但它的基本精神，在本書中仍被保留了下來。

實際上，四分法的錯誤，主要的還不在它的形式，而是在它破壞了財政現象的統一性以及不能說明各種財政現象的相對重要性。倘把收入、支出和預算分開來討論，預算離了收支，所剩下的便祇有預算的種類、歷史以及編製、審議和執行程序等行政制度及技術問題，完全成了沒有『內容』的『形式』了。

租稅雖是公共收入的一種，但就重要性來說，其他收入是絕對不能與它相比擬的。把租稅放在公共收入項下來討論，決不能充分地顯示出租稅的重要性，這一點，甚至連資產階級的財政學者，也多半是知道了。蘇聯的一般財政學書籍，多把收入、支出包括在預算論之內，而以預算、稅制和國家信用作爲財

政制度的三個主要環節，這種編排方式，是值得取法的。

關於戰爭和經濟危機，在帝國主義國家的財政中，有着頭等重要的意義，研究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而不把戰時財政和經濟危機時期的財政問題放在適當的地方，是決不能揭露出現代資本主義財政的眞相的。著者雖然在書中的某些地方也偶然提及戰爭或經濟危機與財政的關係，但因囿於四分法，始終沒有把這兩個問題提出來加以討論，對帝國主義財政的特徵，認識得實在太不够了。

財政現象與國家的出現一同開始，資本主義的財政制度，開始是建立在封建財政的廢墟上的，前資本主義的財政，與現代國家的財政，有着相當的歷史連續性。著者既然知道財政學是一種歷史的科學，但全書只討論現代各國的財政制度而不討論前資本主義的財政制度，這種體系，怎能符合於歷史的科學的要求呢？

第二、內容錯誤。鄒可同志已經指出本書的一些原則性的錯誤，例如把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說成五種經濟形態之外的一種獨特的社會經濟形態，又把『中小資本家佔有其私人資本』說成是實際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此外，著者在書中（第二十頁）還有下面這幾句話：『最後，我們應該知道，無論在何種社會經濟形態之下，國家的收入總是取之於直接生產者的剩餘勞動與剩餘生產品的。』照這樣說來，連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收入，也是從直接生產者的剩餘勞動而來的了，這是根本錯誤的。

第三、前後重複。作爲一本財政學的教程，這本書的內容，已經貧乏得可憐，但就在這樣貧乏的內容之中，還有很多地方是重複的。例如自序和第二章第四節，內容差不多是完全一樣的，其中好多地方，甚至連詞句都完全相同。又如第五章『財政制度的基本概念』和第六章『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制度』，內容也很多雷同。書中所引用的別人的語句，也往往把同一句話引用好幾次，並且是用來說明同一問題。如把這些重複的地方删去，這本書無疑地會減少很大的一部分。這種浪費重複的現象，在今天是很不應該有的。

第四、無批判地保留了資產階級財政學的觀點。本書雖名爲『新』財政學教程，實則很多資產階級財政學中的說法和內容，都被著者毫無批判地保留了下來。例如第一章第一節有很長的一段，討論公經濟和私經濟之分，第五章第五節談到公債與私債之分，其內容都完全是資產階級財政學所常用的那一套。如『公法人生命悠久，故在經費的支出方面，往往出於百年大計，規模遠大，而不斤斤計較目前的利益。』（第五頁）『國家理財的目的，……但求收支適合，而不在追求贏餘，……反之，私人理財的目的，則除收支平衡外，還要追求贏餘，多多益善。』（第六頁）『私人間的債務關係，受法律支配。……至於公債的債權者對於債務者（即國家）却沒有强制的力量。』（第一一五——一一六頁）以及『私人借債須以相當的抵押品爲担保，但國家舉債，其担保品即爲整個國家的財富，……。』（一一六頁）等等。我們要問問著者，既然本書的目的是要討論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下財政現象的不同的性質、作用、任務和規律，這些庸俗淺薄，掩飾階級矛盾的資產階級財政學『理論』，究竟與上述目的有那一點相合呢？

第五、材料不合實際情形。著者在『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收支平衡與公債政策』一節（第八章第四節），講到新中國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時說：『公債發行總額爲二萬萬分，……截至一九五〇年六月爲止，此項公債的推銷任務大體完成。』（二四六頁）實際上一九五〇年祇發行了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第一期一萬萬分，該年六月所完成的，也只是這第一期的推銷任務，著者竟說是發行總額的推銷任務大體完成，不是驚人的疏忽，就是驚人的無知！

以上幾點，祇是本書缺點中的犖犖大者。此外，著者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制度』一章（第七章），根本沒有談到蘇聯的銀行和儲蓄制度，這表示著者對蘇聯財政制度可包括的各個環節，知道得很是不够。又如書中第五八——五九頁，竟把英國工黨道爾頓（H. Dalton）的財政措施加以宣揚，說是怎樣對貧民有利。雖然後面也說到這是英國工黨政府的小恩小惠，但是批判少而介紹多，極容易給讀者一個模糊的認識。要說明工黨政府的階級本質，爲什麼不把它的擴軍預算，削減醫藥保險費用以及凍結工資的種種措施，多加介紹一些呢？

爲了揭露資本主義財政制度的階級剝削的本質，爲了配合新中國建設的需要，特別是爲了解決目前財政學參攷書籍缺乏的困難，關於新財政學教科書的著作，是十分必要的。創建新財政學體系的嘗試，更是值得歡迎的。但是任何寫作的先決條件，必須是一種老老實實對人民認眞負責的態度！在新中國的學術園地裏，我們決不容許投機取巧，東抄西襲的作品，掛着馬列主義的招牌，但實行其資產階級庸俗理論的走私。新財政理論在中國誠然是一個新的課題，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有蘇聯先進國家的經驗，解放以後關于蘇聯財政的理論及其實踐的介紹也已不少，而出版界依然充斥着這種粗製濫造不負責任的所謂『著作』，實在是使我們不勝遺憾的。

新書介紹

# 介紹『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

蔣學模

恩格斯著　曹　汀譯　何思敬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三三頁

恩格斯的遺著『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的中文譯本，已經出版了。據本書譯者在再版序言中的說明，本書曾於一九四〇年在延安出過單行本，由八路軍軍政雜誌社出版，所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六月的初版，實際上已經是本書的再版了。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廣大讀者來講，恩格斯的這一著作，大多還是初次相見。對這一經典著作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還是需要的。

本書是恩格斯的一篇未完成的遺稿，寫於一八八七——一八八八年。原來的標題是『德意志帝國建設之際的暴力與經濟』，目前的書名『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是根據俄文馬恩全集中的標題而來的。而這兩個書名，恰當地提出了本書的主要內容。

按本書所處理的歷史事實來講，本書是恩格斯在一八五一——一八五二年所寫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的續篇。在『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那部著作中，恩格斯論述了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在本書中，恩格斯則論述了一八四八年以後德意志經濟政治的變遷，論述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產生。

但我們知道，馬、恩、列、斯關於歷史事件的任何著作，它的意義決不僅限於分析歷史事件本身，而是貫串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的原理，包含着指導革命的精闢的戰略思想和策略思想的。在『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書中，恩格斯在分析一八四八年西歐各國革命的一般經驗和德國革命的特殊經驗時，天才地闡明了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戰略和策略。同樣的，在我們目前所介紹的這一本書中，恩格斯的分析，也決不僅僅限於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形成這一歷史事實的本身，而是在這樣的分析中，生動而深刻地揭明了政治暴力與經濟的關係。有人認爲恩格斯的原意，是要在這部文稿中，從對德意志帝國形成這一歷史事實的分析中，來證明他在『反杜林論』一書『暴力論』那幾章裏所展開的理論。這一個推斷，從恩格斯自己爲這部文稿所寫的那幾句序言來看，是可以相信的。因此，俄文馬恩全集中將書名改爲『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誰都知道，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德意志帝國的統一，是在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之下完成的。俾斯麥鐵血政策的暫時成功，一向爲淺見的歷史家和唯心論者所津津樂道，被引用來企圖證明『英雄創造歷史』和『政治決定經濟』這種錯誤的觀點。現代法西斯『理論家』，更企圖用俾斯麥暴力政治在十九世紀德國的暫時成功，來證明瀕於垂死階段的帝國主義國家，也可以用暴力來任意摧毀世界上的進步力量，以挽救帝國主義必然死亡的命運。

恩格斯在這本書上，從對當時德意志諸邦經濟發展的深刻分析出發，說明『德意志底工商業已發展到這樣的高度，德意志底那種佈滿世界市場的商會網又如此擴大並且如此緻密，所以國內的小邦制度以及國外的無權和無保障的地位早已不堪忍受了。』自由資產階級迫切地需要一個統一的民族市場，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來保障他們在國外市場上的利益。德意志的統一，已成爲經濟的必要。正是在這樣的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俾斯麥的鐵血政策，才可能獲得暫時的成功。

恩格斯在本書的序言中預斷了俾斯麥的鐵血政策『最後必須覆滅』。歷史的發展完全證明了恩格斯這一英明的預言。二十世紀開始以來，爲壟斷資本家服務的德國黷武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會奉行過俾斯麥的鐵血政策，結果，都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因爲二十世紀德國的鐵血政策，已不再代表自由資產階級爲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這樣一個歷史要求，而只代表壟斷資本家掠奪殖

民地、商品市場和投資範圍的貪婪野心。二十世紀德國所處的時代，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的上昇階段，而是資本主義的腐朽階段或垂死階段，已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二十世紀德國的工人階級，已經不是政治上尚未充分醒覺和缺乏組織的力量，而已經成爲一支有高度政治自覺和有組織的力量。這樣，鐵血政策的繼續，就必然要遭到不可避免的覆滅了。

恩格斯在分析德意志帝國的形成時，用具體的歷史事實闡明了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證明了他在『暴力論』中早已達到的結論，即：『第一、一切政治權力，最初總是根據於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之上，隨着社會成員因原始公社的崩潰而轉爲私有生產者，這種權力，也發展起來，並且因此和那些執行全社會職能的人們，更加脫離開來；第二，在政治權力對社會獨立起來並且從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以後，它就可以按兩個方向去行動。它或是按照合乎規律性的經濟發展的意圖及方向去行動，那時在這兩個因素之間，就不會發生什麼衝突，而經濟發展的本身，也更迅速地前進。或是它和經濟的發展相反地去行動，那時，政治權力除少數例外，總是爲經濟的發展所擊敗。』（見三聯版，吳理屏譯『反杜林論』第二編第四章）

恩格斯既然從最根本的經濟基礎和階級的分析上闡明了歷史發展的動向，因此，這本書就變成了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歷史的示範著作。對於史學工作者來說，恩格斯的這一經典著作，是特別須得加以細細研究的。

在本書的後面，譯者曹汀翻譯了『暴力論』第二章（譯者在附錄的小註中說是第三章，那是不對的）的大部份作爲本書的附錄。我對於這個附錄有一點小意見。據我的了解，恩格斯所指的『暴力』，是指廣義的政治暴力。在恩格斯的書中，暴力與經濟的關係，實際上就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暴力論』第二章主要地只是闡明了這樣一個命題，即：暴力的工具——武器及軍隊——以及軍隊的組織方法和作戰方法，也都是依賴於物質的條件即經濟的條件的。至於政治暴力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理論，主要的見於『暴力論』第一章和第三章。所以我覺得附錄部份還可以擴大一些，把『暴力論』第一章及第三章中結論性的文字多摘錄幾段，這樣或許可以更完全一些。

* * * * *

## 學術簡訊(二)

### 蘇聯學術界批評『歷史唯物論』一書

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出版的『歷史唯物論』一書，是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集體編著，由康斯坦丁諾夫教授主編。蘇聯哲學家歐庫洛夫曾對該書加以批評，刊載於本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文學報』，已由田森譯出，在本刊第四卷第三期發表。八月三日蘇聯『眞理報』發表車斯諾柯夫、莫洛德錯夫、普拉特柯夫斯基三人合寫的一篇專文，題爲『爭取一本完善的歷史唯物論教本』，對這本『歷史唯物論』加以批評。

車斯諾柯夫三人合寫的這篇專文指出，此書的優點是：『詳細地敍述了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們關於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的思想，並引述了大量的實際材料；書中以可觀的篇幅評述了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蘇維埃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書中說明了資本主義體系矛盾的日益尖銳，揭穿了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性，批評了現代資產階級的社會學』。『整個說來，此書在研究歷史唯物論時是有幫助的』。

但是，『此書在結構上以及在歷史唯物論個別問題的解釋上存在着許多重大的缺點。』

該文指出：此書結構方面的重要缺點是作者們沒有做到邏輯與歷史的正確結合以及各章與各篇之間的有機聯系。使人讀後，會覺得此書『是由不同作者的一些個別獨立論文編成的，它倒像一本論文集，而不是一本統一完整的著作。』例如該書把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問題分成了兩章，同樣，把社會意識的同一個問題也分成了兩章，並且兩章的內容也沒有與前面幾章直接聯貫起來；把『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一章與論述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性的幾章脫離；書的分量雖然很大，但却沒有一章講下層基礎與上層建築問題；沒有對語言這樣的社會現象作馬列主義的分析等等。

在個別問題的解釋方面，此書的重要缺點是：在論述歷史唯物論的黨性、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哲學與政治、歷史唯物論對共產黨實踐活動的意義這些原則時，沒有詳舉具體的材料；在論述社會主義國家時，也沒有說明蘇維埃國家在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在『社會意識及其形式』一章裏，僅祇一般地敍述了理論原則，在有關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幾章中，沒有闡明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戰略和策略的學說，沒有解釋現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問題，沒有分析兩個體系的鬥爭問題；對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問題，未作充分的說明；對於社會主義發展的最重要的規律性，未作理論的分析，對於現代各國共產黨影響的增長，未作應有的闡述；對於第二次世界戰爭後世界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偉大勝利，也反映不够；對於人民民主制度更未作全面的分析；尤其嚴重的是，此書往往以記述歷史事件的方法代替了對社會現象的分析。

# 學術論文提要

這一欄的增闢，主要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每個提要，只能包括各篇論文的中心思想，以便讀者參考。——編者

## 讀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的四篇著作

李達

本文所指的四篇著作，是：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三、『中國的紅色政權爲甚麼能夠存在』，四、『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對這四篇著作，作者首先做了扼要的分析，特別說明毛主席當時爲什麼要發表這幾篇著作，以及發表後對革命事業起了什麼偉大的作用。

最後，作者做了一個結論，說：

『從這四個文獻當中，我們很淸晰地可以看到，在革命的當年，毛澤東思想即在不斷地勝利中逐漸完成。顯然地，「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的統一戰線的理論。「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確定了農民階級是中國工人階級最可靠的、最廣大的同盟軍，建立了工農聯盟的理論基礎。「中國的紅色政權爲甚麼能夠存在」，說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人民革命，祇有進行武裝鬥爭，才能爭取民族的與社會的解放；指出了武裝革命祇有先在農村建立工農政權和革命根據地，然後奪取反革命所佔據的都市。「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指示了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方針。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而這三個主要的法寶，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個主要的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的偉大結晶。』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八、三〇）

## 毛澤東思想教導着我

柳青

本文作者記述他和農民羣衆結合的過程和在創作實踐中對於毛澤東思想的體會。

作者首先指出，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教育和鼓舞了他，當時正値作者思想鬥爭最痛苦的時候，受這偉大文獻的感召，使他堅決改造自己，並且解決了一個基本問題：階級觀點和表現在作品裏的思想感情問題。

毛主席的這篇『考察報告』，不但是政治文件，而且是最好的藝術作品。作者最近重讀這篇報告，使他對表現在作品裏的立場、觀點，有了更深的認識。報告中具體舉出十四件大事，是爲了主張什麼和反對什麼，而我們寫文藝作品也是這樣。作者又批評自己的小說『種穀記』的缺點。

作者最後總說一句：作家要以正確的階級觀點與思想感情進行創作活動，除了毛主席所指定的這條路，再沒有其他任何捷徑。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九、一）

## 讀『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艾思奇

對於毛主席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一篇文章，本文作者特別指出它的重要意義是在於『不僅肯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中所指出的那些普遍眞理，而且由於它奠定了革命軍隊中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因此，就在如何建立人民自己的革命武裝這個問題上，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得到了新的充實和發展。』

作者特別指出：毛主席對於黨內的各種錯誤思想，曾詳盡地揭發了它的階級根源，使我們能夠淸楚地看出並進而作有效的鬥爭。

最後，作者提到：『如果沒有黨內的無產階級

——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這個勝利，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設想的。』但是許多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及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今天也仍然部分地存在着，作者認爲應該予以肅清，『並在這樣的基礎上進一步整頓黨的組織。』

（『學習』四卷十一期）

## 論學習中國共產黨史的意義和方法

華　崗

作者首先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利益的，而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和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分的。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首先就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歷史和中國民族的解放歷史。』同時，也是『中國人民科學的最高峯——毛澤東思想產生與成長的歷史。』今日我們所以要學習中國共產黨史，就是要吸取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並利用已有的有利條件，引導革命繼續前進，更好地從事各種建設，更好地爲人民服務。

其次，作者指出了黨史的基本精神，包括四點，即（一）分清敵友與明辯是非。（二）汲取革命經驗，繼承光榮傳統，保衞革命果實，發展革命勝利。（三）黨史並指出了一條眞理，就是要把革命領導成功和辦好建設事業，必須信任人民和依靠人民力量。（四）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眞理，修正錯誤。

最後，談到學習黨史的幾個主要方法：（一）要從革命史實學習中，提高到革命理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解釋和解決每個重要時期的實際問題，從而把握革命發展規律和提高思想水準。（二）學習時，先細心閱讀指定文件，提出中心問題，貫通三十年黨史，運用思考，加以系統研究。（三）學習時，必須切實聯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四）有較高閱讀能力的人，應以自學爲主，座談討論爲輔；閱讀能力較低的人，以講解爲主。（五）要有計劃、有步驟、把握重點和關鍵。

（『文史哲』一卷三期）

## 斯大林同志論中國革命發展的道路

阿・弗・高爾尼洛夫著
徐　堅等譯

作者告訴我們：斯大林對於中國革命問題，一向是很關心的。而在他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著作中，首先闡明的，就是中國革命的原因，並且指出了它的特點。這特點包括有：（一）是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性質，（二）主導作用，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共政黨手中，（三）獲得了新勝利的偉大蘇聯的存在，（四）中國革命軍隊之存在等。

斯大林並且精心地研究了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分析了階級力量的對比，指出了革命的方向。有如作者所說：『斯大林同志關於中國革命底戰略與策略的英明忠告和指導，照耀着中國共產黨走向勝利的道路。』

作者特別指出：蘇聯對於中國的友誼和援助，保證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這也是斯大林所再三强調的。

作者在結語中，特別有信心地說：『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在過去和現在都應用於中國具體情況的中國共產黨，使我們確有信心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站在發展和進步的正確的道路之上的。』

（『科學集刊』第一集）

## 關於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改良主義

黎　澍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改良主義者是代表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他們一方面不滿意反動統治，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他們不敢和反動統治勢力進行鬥爭，結果成了反動陣營中的走卒，反革命的工具。

作者分析改良主義者的特點說：他們拒絕從本質上看問題。否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同時，善於承認現狀。革命勝利前，反對革命。革命勝利後，阻止革命的繼續深入。

改良主義者，無疑地是錯誤的，而今日無產階級所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更做了有力地證明。今日革命既已勝利，改良主義方法是否可以採用呢？作者的答覆是否定的。因爲如果採用改良主義方法來領導工作，『一定產生放鬆和縱容敵人的作用』。可是改良主義的殘餘影響，一直到今天，也還在某些人的思想意識中存在着。作者强調指出：『肅清這種影響是對國家建設具備重大意義的。』

（『學習』四卷十一期）

## 論人民經濟發展的規律性

陶大鏞

在這篇論文裏，作者首先指出：人民經濟的發展規律，是與舊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已不是盲目的，而是被人們自覺地掌握和運用着的；第二，它已不是剝削的，而是與廣

大勞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相一致的。

接着，作者根據具體的事實，指出了人民經濟發展的五個規律：（一）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下，穩步走向計劃化的道路。（二）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日益壯大及其領導作用的日益强化和鞏固。（三）從個體經營一步步地趨向於集體經營。（四）全國各地普遍開展愛國主義生產競賽，廣大勞動人民發揮生產積極性和高度的智慧和創造性，促使社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飛躍上升。（五）勞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作者的結論是：『人民經濟的發展，必然會走向勝利，並且會穩步地從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最後再走向共產主義去！』

（『光明日報』，一九五一·九·八、九）

## 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法制底建立與發展

林景仁

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對於反動統治階級的法制、法律，就開始着手摧毀，而新的、人民的、革命的法制，也隨着建立和發展起來了。

這新的人民的法制，是在怎樣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呢？作者扼要地指出：『是馬列主義法學觀在現階段中國政治法權建設上的具體運用，它是遵循着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新民主主義的各種政策；遵循着對於中國人民各種革命鬥爭經驗，特別是人民司法工作經驗的總結而發展起來的。』

新法制的基本指導原則，是『最完滿地、最集中地反映中國現實和最正確地指導中國革命的毛澤東思想。』是從現實生活的實際出發的，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

在『總結』中，作者特別提到：『人民民主法制是過渡形式的法制，它創造着實現人民民主主義建設的條件。』這是說：當我們已經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這人民民主法制就過渡到社會主義法制了。

（『科學集刊』第一集）

## 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傑出貢獻

П·尤金著
富瀾譯

全文論述了斯大林『馬克斯主義與語言學』對一切社會科學的重大意義及其對馬列主義的偉大貢獻。

首先，作者闡明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獲得勝利後，各種民族語言如何溶合爲一種共同的國際語言的過程。

其次，作者解釋了斯大林對基礎與上層建築所下定義的意義，並批評了蘇聯刊物中對經濟基礎二種錯誤的解說。接着就斯大斯對二者的辯證關係所作的分析加以發揮。作者着重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所起的巨大變化，指出它爲勞動者服務，它反過來影響基礎，通過基礎以增大生產力。

最後，作者又闡述了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在社會主義中，質變不經過突變來實現，因此，共產主義的實現不必經過突變，不帶社會革命性質，而是自覺地逐步實現的。

（『學習譯叢』第四輯）

## 列寧是怎樣分析統計資料的

卡茲洛夫著
趙克成譯

本文作者從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根據具體的事例，說明列寧和斯大林分析統計資料的原則和方法。

首先，從原則上指出，列寧和斯大林對於統計資料的分析，不注重絕對數字，而注重在『數字所說明的關係』。

對於統計資料的引用，作者指出必須從這些資料的精確性、全面性和是否合於分析三方面來予以估計。同時，進行實際的分析，必需經過一定的步驟，那就是要把所研究的對象分成許多構成部分，再加以全面的說明。

（『計劃經濟』二八、二九期）

## 科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И·孔恩著
高銘、韓盧銳譯

本文作者首先肯定科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同時又解釋了這一社會意識形態的本質。

作者認定自然科學不是上層建築，是沒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學對各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在階級社會裏，由於科學掌握在統治階級手裏，因此階級影響了自然科學。

其次，作者認爲就內容與社會職能來說，社會科學是與自然科學不同的，它直接反映了階級鬥爭，是一定階級的工具，因此它是有階級性的，其內容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它是上層建築。

最後，作者列舉了蘇聯在各個不同時期中關於科學的發展與繁榮的事實，並談到蘇聯如何貫澈了

科學的人民性：科學如何爲人民服務，如何實現了理論、實踐、政治任務三者完全的一致，如何與國民經濟、社會主義的生產聯系起來，學者與生產者如何結合如何相互提高等。末了，還談到社會科學在蘇聯所獲得的成就。

（『學習譯叢』第四輯）

## 東方史學家的目前任務

蘇聯『歷史問題』社論

本文首先叙述了目前在東方所發生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其次作者指出蘇維埃東方史學家的目前任務，主要包括以下各項：

一、東方各國的近代史，特別是現代史的深刻研究，亞洲反帝解放運動的研究，和東方人民生活上所已發生的巨大變化的研究。

二、對東方民主主義國家的現代局勢、首先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越南、蒙古、朝鮮的現代局勢，應予以特別注意。

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對中國共產黨史的研究，對成爲最強大的和平堡壘的、中蘇友好史的研究。

四、對美國史料編纂的僞造予以適當反駁。

五、創造尙未研究過的歷史，尤其創造像朝鮮和越南那樣國家的現代史。

六、在許多近代歷史的主題研究中，應該表示出一點：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史。

（余元盦譯，『科學通報』，二卷八期）

## 從討論武訓問題我們學到些什麼

錢俊瑞

本文首先確定了武訓是爲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十分兇惡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同時他又是實行西太后的反革命殘餘的最忠實的走狗。

其次，指出過去中外反動派所以表揚武訓，目的是爲了借武訓這個死奴才，企圖滅人民志氣，保持自己的反動統治。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也曾鼓吹和歌頌過武訓，這是因爲改良派的教育思想，是『超階級』『超政治』的。有人提出：對武訓的一概抹煞，是不是等於對舊中國的教育工作者也一概抹煞呢？作者的答復是否定的。因爲在舊中國教育界服務過的人，也有好幾種，不能一概抹煞。

最後，對於說陶行知也是武訓那樣的反動派者，作者首先加以駁斥。因爲陶行知的後期，在政治上是屬於革命派，堅決主張實行民主。同時，陶行知所辦的學校，是民主的、科學的教育，在他後期所辦的教育，是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教育，是接近工農羣衆的教育。這一切又怎能和武訓同日而語呢？至於陶行知爲什麼狂熱地歌頌武訓？作者的分析是『主要地就因爲他的教育思想基本上還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範疇，而不屬於共產主義思想的範疇的緣故。』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八•二七•）

## 克服藝術工作者忽視政治與思想懶惰的傾向

邵宇

本文首先指出某些藝術工作者有過份強調『提高技巧』的單純技術觀點，有忽視目前羣衆政治鬥爭忽視政治的傾向。指出這種傾向的危害性與錯誤，並提出應該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掌握與提高藝術技巧。

作者提到以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來衡量藝術作品時，將自己的二幅招貼畫及他人的二幅畫爲例，說明強調『技巧』而犯了政治性的錯誤，因而提出『政治標準第一』。

關於怎樣體驗生活，作者說：『必須要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來指導我們的生活，和正確的認識生活』，盲目的下鄉與下廠是無益的。

該文的結論說，人民藝術家對政治、思想和藝術的關係，應有『政治與藝術統一』的看法，並提出美術界應該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來克服有害的忽視政治的傾向。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九•十二）

## 蘇聯科學院出版介紹我國專刊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介紹新中國的專刊『科學年刊』第二卷現已出版。專刊內容包括經濟學博士馬斯連尼的『偉大變革的年代』，叙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民經濟的基本變化。歷史科學博士阿瓦林的論文，題爲『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勝利的組織者』。葉費英夫教授的歷史論文『蘇聯——中國人民的良友』，叙述了一九一八年以來中蘇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經濟學碩士伯雷維爾泰洛的論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國家』，分析了新中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愛德黎的關於一九五〇年中國文藝動態的文章，叙述了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學的特色。專刊還刊載了科學工作者科瓦列夫所撰介紹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的文章，和阿斯塔非耶夫所撰討論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文章。

# 國外期刊重要學術論文介紹

本欄介紹的國外期刊，祇能限於最近收到的各期。由於篇幅的限制，對於各期的重要學術論文，祇能作簡單的介紹。

——編者

## 蘇聯·『哲學問題』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二、三期

本期發表了斯契潘涅的『社會主義基礎的鞏固和發展是建成共產主義的條件』一文，對蘇聯共產主義建設進行了全面的科學分析。文中叙述了蘇聯正在進行着宏大的共產主義建設。指出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從社會主義轉變到共產主義所要求的，並不是創立另外一個生產方式，而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全部基礎的鞏固和發展。列寧所謂只有當社會主義完全鞏固時更高級社會才能發展的原理，已經得到光輝的證明了。創設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必要條件，是在工農業方面掌握高級的技術。共產主義技術基礎的構成部分是勞動的綜合機械化，工業生產的自動裝備化，多數經濟部門的化學化，全國電氣化和生產過程中種種新式動力的應用。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先進工農已經使具有高度生產率的體力勞動和具有創造性的智力勞動協調地結合起來。創造性的勞動在蘇聯已成爲普遍的、典型的勞動，而成爲一種習性了。蘇聯文化的發展，也和共產主義物質基礎的創造密切聯繫着。資本主義在蘇維埃人意識中的遺毒正在根絕着，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通過自由的和創造性的討論，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在蘇維埃科學一切部門中的遺毒也正在肅清着。鞏固的哲學基礎——構成共產主義理論基礎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逐漸地、一步一步地在蘇維埃科學一切部門中都建立起來了。論文的結論說，二十世紀初誕生的布爾什維克黨，宣佈了共產主義勝利的必然性。二十世紀中葉共產主義制度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開拓了完全的、澈底的解放人類的歷史道路，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鞏固地確立起來。二十世紀的後半紀將使全世界獲得共產主義的新勝利。

該刊第三期揭載了爲紀念斯大林同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發表一週年而寫的社論，題目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底偉大典範』，文中說，『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是布爾什維克黨思想生活中的大事。斯大林同志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科學發展，時刻寄以關懷的心情，把我們的科學提高到足以實現共產主義鬥爭任務的水平。聯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個人對米丘林生物學、巴夫洛夫生理學、哲學及其他文化部門給以全面的幫助。語言學在蘇維埃科學發展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爲語言是人們的交際手段，是社會鬥爭和建設的工具，所以語言學中的一切混亂狀態，都要對認識自然和社會規律發生不良的影響。斯大林同志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語言及其在社會的地位的原則性指示出發，揭發馬爾語言學的錯誤原理，解決了語言的基本問題，創立了馬列主義的語言學基礎。這個著作武裝了蘇維埃哲學家以及全體理論工作者，爲堅決提高科學工作而鬥爭。

另外，還發表了科學院院士阿列肯特羅夫的『斯大林同志在共語言學著作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一文，叙述了斯大林同志天才的下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科學底定義：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是關于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

作者總結了共產主義黨的偉大的歷史經驗，指示了世界工人運動鬥爭的方向。並叙明馬克思主義是一切進步人類鬥爭的標幟，也是一切國家進步人們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最後，斯大林同志號召蘇聯人民，爲了從社會主義穩步地走向共產主義，我們必須爲反對一切帝國主義陰謀而鬥爭。

## 蘇聯·『經濟問題』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七期

本期發表了『斯大林同志在語言學問題方面的

著作對於經濟科學發展的意義』。作者K•奧斯特羅維強諾夫說，斯大林同志對語言學問題的天才著作，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傑出的貢獻。這些著作對發展社會科學，也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具有重大意義。斯大林同志有關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所提出並加以論證的新結論和原理，充實了經濟理論，把經濟理論提到高級的階段。斯大林同志在這些著作中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有關生產力、基礎與上層建築物、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和由社會主義轉變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規律等學說。斯大林對語言問題天才的解決，有助於更深刻地了解生產力、尤其是勞動工具、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作者詳細分析了基礎與上層建築物的關係，語言的作用，政治經濟學在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任務等重要問題，而於結論中說，斯大林的著作對發展經濟科學有着傑出的貢獻，這些著作推動經濟學家密切地聯系理論和實踐，創造性地解決蘇聯經濟和外國經濟的種種問題，組織學術討論會，開展科學工作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從而就使蘇維埃經濟科學提高到這樣的水平：即能夠解決富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達成共產主義事業對它所提出的任務。

在同一期上，還發表了B•馬斯列尼科夫的『論列寧天才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作者指出列寧寫『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一九一六年春天完成的，距今三十五年，愈加證明了列寧的科學預見。列寧早已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是說，它在這時已變成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這當然不是說資本主義不必經過無產階級革命而會自行死亡。列寧教導我們說：不經過工人階級革命是無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因此，列寧在書中證明，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底前夜。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就終止其成長，已變為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作者有力地指明該書為工人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思想鬥爭武器。

## 蘇聯•『國家與法律』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七期

本期所發表的重要論著，有法學博士費•墨•契希克伐則的『論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本文從歷史背景闡釋斯大林的著述如何實際地及時地解決了當時重大的經濟、外交、文化諸關鍵性問題，以及這些著作在歷史發展中起了怎樣偉大的作用。

法學候補博士斯•費。摩洛德善夫在『防止戰爭，爭取締結和平公約』一文中，首先扼要地敘述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的爭取和平鞏固國際合作的政策以及美英集團陰謀發動戰爭的政策，並着重地指出和平理事會的偉大成就，更從和平理事會與聯合國之比較中，說明兩者在本質上的不同，從而指出和大在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意義及其巨大的實際力量。

法學候補博士斯•勒•齊弗斯在『歐洲人民民主國家法院組織之社會主義原則』一文中，從人民民主國家制度的本質，指明國家機構的性質及其作用。作者認為，作為國家機構之一的法院，其主要作用在於保衞國家與社會組織，維護公民權利與合法權益。

作者特別指出：人民民主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充分民主的。為使審判制度發揮充分的民主，通常必須採取法官民選制度或陪審員制度。這兩種制度在歐洲人民民主國家中，都已經採用了。此外，人民可以罷免法官，這樣便加強了人民對司法工作的控制與監督。

另外，法學候補博士費•依•李粟夫斯基發表了『舒曼計劃——美帝的侵略工具』一文揭穿美帝奴役西歐進而統治世界的反動陰謀。

## 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六期

本期的社論『新高潮中的蘇維埃文學』，是一篇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指導性論文，它不僅是文藝工作者的指南，而且也是一切學術工作者應該學習的論文。本文總結了五年來蘇維埃文學的發展，廣泛地論證了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傳統和革新，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等問題。它敘述了五年來蘇維埃文學的成就，戰後有一百五十多部優秀作品，獲得了斯大林獎金，這是由於人民大衆是眞正的歷史創造者，在蘇維埃政權下，人民大衆偉大的創造性發揚起來了。蘇維埃作家積極地解決蘇維埃社會中所發生的問題，把蘇維埃社會眞正發展動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新的運動、新的式樣、新的辯證法規律性表現在文藝工作中了。社論指出蘇維埃作家的成就應歸功於列寧斯大林黨所指引的正確道路：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基本方法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方法。蘇維埃文學與那些認為文藝沒有任何實踐意義的反動理論鬥爭，並與世界主義、民族主義鬥爭。蘇聯作家知道蘇聯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是建立在吸收並且批判地改造過去文化的基礎上的。但他們不僅是過去偉大藝術的繼承者，而且是大胆的革新者。蘇聯人民的藝術趣味和要求提高到三十年前所不敢幻想的那種高度。文學的任務不祇是要達到這樣的水平，而且要把它提得更高。社論的結論說，為共產主義而增加精神生活的食糧，是每一個蘇維埃作家的光榮義

務。

## 美國·『群衆與主流』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七期

本期發表了一篇重要的社論，題爲『維護自由』。該文首先指出：所謂『自由美國』，實際上已變成美國人民的監獄。一七七六年，在『費拉得爾菲亞獨立堂』內掛起的『自由鐘』，上面刻着『向全國及全體居民宣佈自由』的辭句，現在已經變成了死的文字。

社論指出：『帝國主義者既然有一個無理性的計劃，就必須禁止理性的呼聲。他們既然要把國家領到毀滅的地步，就必須不斷地打擊愛國的公民。他們的政策既然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就必須向人民施展恐怖手段，用希特勒反共的謊話來毒害人民』。

最後，向美國讀者號召：『我們只有站穩立場，只有與人民中最堅決的份子團結合作，來爭取和平與文明自由，才算是忠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在獨立堂內那些慶祝自由的人所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

## 英國·『現代季刊』雜誌

一九五一年 第二期

本期載有費佛的『馬爾薩斯與馬爾薩斯主義』一文，是值得注意的。

作者首先指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雖然早已破產了，可是，馬爾薩斯的思想，一直到今天還沒有消滅，反而出現了新馬爾薩斯主義，其最近的代表人物爲瓦哥特。

瓦哥特在其『生存之路』一書中，比馬爾薩斯更進一步，認爲糧食增加率是有極限的，超過這個極限，就不能再有增加。如果說，從馬爾薩斯到現在，這一百五十年中間，還沒有發生過因糧食缺乏而限制了人口增加的現象，那末，終有一天會發生的。與其將來如此，就不如及早設法避免。怎樣避免呢？瓦哥特認爲應該『用賣淫、溺嬰、移民、殖民等辦法來減少危險』。他更喪心病狂地歌頌戰爭、瘟疫和饑饉，認爲這都是限制人口過剩的重要因素。

費佛在本文中嚴予駁斥，以充分的事實，證明瓦哥特的理論是毫無科學根據的。

作者特別指出：無論過去和現在，馬爾薩斯主義者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企圖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罪惡和災難曲解爲自然現象，把帝國主義政策所造成的糧荒現象曲解爲自然規律，而爲資本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辯護，這正是馬爾薩斯主義復活的社會基礎。

按照作者的意見，要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現象和相對的人口過剩現象，要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全世界都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人類才能保證有充分的生活資料。

### 訂　正

本刊四卷五期第十二頁上欄第十二行『……貪汚日本的借欵』應爲『……貪得日本的借欵』。同頁下欄第十七行『如是之廣！』一句下漏去一雙引號。第十三頁上欄第四行『美國一方面在暗使……』『在』字係誤植，應刪去。第十五頁上欄第六行『美國不得採取蘇聯對日……』『蘇聯』應爲『聯蘇』。特此訂正。

---

## 俄羅斯共和國各教育學院
## 科學研究工作情況

今年七月中旬，俄羅斯共和國教育部召開了全國教育學院和師範學院的校長會議。會上除檢討這些學院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生物學、教育學等課教學工作和各科幹部培養工作中的缺點以外，還交換了各教育學院科學研究工作的情況。

根據報告，在一九五〇年內，俄羅斯共和國各教育學院和師範學院差不多研究了五千個題目。全體教師都參加了科學研究活動。發表了大量的專著、教科書、學術叢刊、學術論文和有關教學法的論文。各教育學院還根據斯大林的語言學說和巴甫洛夫生理學問題會議的決定，在科學研究方面進行了巨大的改革工作。

## 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 編纂古代俄語辭典

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計劃編纂一部古代俄語辭典。這部辭典將收入十一世紀至十七世紀的俄語中最有用的辭彙，對於辭義的解釋，將摘引各時代的俄文原作作爲例證。

全部辭典預定爲六卷。現在已着手進行第一卷的編纂工作，預計明年出版。編纂工作的領導人是哲學博士阿·葉夫金耶娃，參與工作者有維·維諾格拉多夫院士、斯·奧布諾爾斯基院士、維·阿德里安諾瓦——別列茨通訊院士等人。

# 新學術小叢書

## 學習『實踐論』第一輯　定價三千二百元

## 學習『實踐論』第二輯　定價四千元

本書第一輯包括：毛主席的『實踐論』全文，李達、王學文、郭大力、王亞南、馮友蘭等學習『實踐論』的心得，和對『實踐論』內容的發揮。書末並附有『實踐論』學習提綱。第二輯包括李達、謝覺哉、潘梓年、何思敬、華崗、王思華和北大哲學系等所寫的關於學習『實踐論』的方法、學習『實踐論』如何與具體工作相結合以及運用『實踐論』批判舊哲學等。是學習『實踐論』必備的參考書。

## 中國新文學史研究

李何林等著　定價六千六百元

本書首載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所共同草擬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接着，就中國新文學發展的階段，分爲下列各篇：1、五四時代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2、一九二三年『中國青年』幾個作者的文學主張，3、左聯成立前後十年的新文學，4、中國文藝第一次和兵農的結合，5、由『七七』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新文學。由李何林、張畢來、丁易分別執筆。書末並附有郭沫若、茅盾、周揚在文代大會對近十年文藝運動情況的總結報告。本書是學習中國新文學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 關於人民民主建政

本社編　定價四千元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權最好的、基本的組織形式。必須大家正確地認識和掌握了這種制度，才能完成人民民主政權的建設工作。本書內容包括有關人民民主建政的重要論著、文件和法令，是學習人民民主政制的重要參考資料。

## 美帝國主義的政治與經濟

張志讓　陳翰笙　沈志遠等著

定價三千二百元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 新建設 月刊

第五卷　第一期

負責人　費青

編輯委員（以姓名筆畫爲序）

千家駒　向達　*沈志遠
*吳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聞家駟　雷潔瓊
樊弘　*鄭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鍾潛九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爲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六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定價每册四千元

訂閱：

三個月三期　一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二萬四千元

全年十二期　四萬八千元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册四千元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二一九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預訂處：各地新華書店